

炎黄春秋



1961年10月，沈鸿(中)随周恩来，陪都视察三门峡水闸机房

延安时代的清廉与民主风尚
沈鸿：从小业主到共和国部长
王明错误路线纠正始末
李维汉“残年惜晚晴”
驻旅顺口苏军提前撤退内幕
参加拟定“863”计划的老科学家王大珩
一个战犯夫人的悲喜人生



李维汉

6
96

庆祝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五周年

学人，不增其美
 毁人，不益其恶

丙子春 萧克

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五周年

对人对事对历史应坚
 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杨尚昆

一九九六年四月

炎黄风雨春秋笔
 务实求真敢放言
 不事浮华不媚俗
 一泓清鉴醒民魂

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
 九六年春 凌志

主笔 颂炎黄
 秉笔 写春秋

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

一九九六年

凌志

炎 黄 春 秋

1996/6 (总第51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11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00元

目 录

时代风

- ②延安时代的清廉与民主风尚..... 杨闻宇 张祖煦

春秋笔

- ⑥王明错误路线纠正始末..... 曹 英
⑫抗日劲旅第十九路军的兴与亡..... 陈光明
⑳驻旅顺苏联红军提前撤退内幕..... 周金明
㉒傅崇碧谈“杨余傅事件”..... 舒 云

英杰谱

- ㉔内蒙古·乌兰夫·周恩来..... 郝玉峰
⑳沈鸿:从小业主到共和国部长..... 曹进堂
㉖朱德和他的女儿朱敏..... 王基高

殒星篇

- ④①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温济泽
④④从文坛女将到总理秘书..... 刘小清
④⑦周恩来要我经商..... 肖 林

赤子心

- ④⑧曾加拟定“863”计划的老科学家王大珩..... 马京生
⑤①美国总统奖获得者中国青年科学家邓兴旺..... 陈 浜

民族园

- ⑤⑥十一世班禅大师应化现身追记..... 王 尧

人海浪

- ⑥②蒋介石的身边人 共产党的好朋友..... 王光远
⑥③一个战犯夫人的慈善人生..... 李占恒

遗闻录

- ⑥⑥蒋军在台湾的一次特大坠机事件..... 徐 刚
⑥⑧三位名教授掩护我脱险..... 裴毓荪

古镜台

- ⑦⑦清代名臣孙嘉淦和他的《三习一弊疏》..... 李文林

古今谈

- ⑦③瓷殇——中国古陶瓷市场的忧思..... 段向群

文荟园

- ⑦⑥ 国 外 的 吴 冠 中..... 刘宏伟
⑦⑧《东周列国志》:三百年磋磨成名著..... 罗静文
⑧①解放区最早出版的画报..... 梁小珍

延安时代的

清廉与民主风尚

● 杨闻宇 张祖煦

一

待客开水不装烟，
领得衣被用三年。
发动男耕和女织，
广辟草莱增良田。

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写的一首小诗。

一位美国人来到延安，在延河边散步，见一个青年挑着一担马草从小路上走来，后边跟着个戴一顶旧草帽的老头，也背着一大捆马草。走到跟前，美国人愣住了：“啊！这不是林主席吗？”他激动地张开双臂，放开嗓门喊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这位美国人目光敏锐，窥得了中国“兴国之光”的真髓。

一年冬天到了，警卫战士穿上新发下来的絮着羊毛的大衣，周恩来却仍然穿着旧棉袄。训练中，战士们的衣服经常被磨破，当时也没有线补。一天，周恩来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堆棉花，坐在纺车旁纺线。警卫员魏玉秀就跟周恩来学纺线，很快把一堆棉花纺完了。周恩来把纺出

来的线分给战士们缝补衣服。晚上周恩来睡觉后，小魏发现那件破旧棉衣里的棉花不知什么时候被掏空了，棉袄变成了夹衣。魏玉秀不禁心头一酸，眼泪直往外流。那天晚上，魏玉秀把自己大衣里的羊毛掏了出来，悄悄絮在了周恩来的那件棉衣里。

攻打榆林，彭德怀的厚底布鞋张开了嘴，两个脚趾露了出来，警卫员几次提出要领双新的，他都不许，还风趣地说：“这鞋通风凉快，穿上它不长脚气，才舒服哩！”

有一次，旅长王震到前沿阵地视察，正巧碰上炊事员送来午饭，他饥肠辘辘，饿得发抖的手抓起一个馒头就往嘴里塞，炊事员火了，抽了他一扁担，王震一边揉着打疼的屁股一边表白：“雷都不打吃饭人。你别打嘛，我是王震。”炊事员吓坏了，忙说：“旅长你咋不早说呀！”嚼着馒头的王震苦笑说：“说早了，我怕你又要忙着给我弄好吃的。”

日常生活中，毛泽东每天也是三钱盐、五钱油、吃小米，人显得很消瘦。

1939年冬的一天下午，留守兵

团负责人萧劲光看见毛泽东正躺在炕上批阅文件。他以为毛泽东病了。毛泽东笑着指了指火墙旁正烘烤着的湿棉裤说：“江青她爱干净，把我唯一的一条棉裤洗了，我哪里起得了床哟，起来我就会光屁股。”

萧劲光马上要警卫员到留守兵团领一床棉被、一套新棉衣给毛泽东。

“我现在若要特殊，人家群众就会不相信你，他们就会说你不是真革命者，是蒋介石，是皇帝。”毛泽东拒绝了。

艰苦朴素与辛勤工作是延安窑洞里四射出来的最鲜亮的灯光，无声无息，却又无远弗及，最能够照亮人们的襟怀。斯诺先生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延安，我看到了毛泽东住在极其简朴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系着断了腿的眼镜……从革命家这些简朴的生活中，斯诺发现了被称之为“东方魔力”的伟大革命力量。

1941年6月3日下午，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正在进行之际，阴雨

天空突然电光闪闪，一声巨响，雷电击死了代县长李彩荣。几天后，市场逢集，一位被雷电击死了毛驴的农民扯着嗓子说：“老天爷不长眼，让雷打死毛泽东才好哩！”

有人向毛泽东建议逮捕这位胡说八道的农民。毛泽东听完这话，翻来覆去想了一阵，他终于平静下来，指示有关部门：不要难为这位农民，要调查出“骂”的原因。经过了解，原来是群众对征粮负担重很有意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随着公粮数量的增加，群众负担在逐年加重：

1938年，征收公粮1万石；

1939年，征收公粮5万石；

1940年，征收公粮9万石；

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

问题摆出来了，毛泽东如释重负地说道：“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

中国有句古语：“不祥在于恶闻己过。”毛泽东对这桩逆耳之言的处置，体现了一个领导者豁达大度、以天下为怀的民主作风，反映出他“心与民为一”的革命本色。古往今来，有几个当政者能从骂声中深刻反省、寻觅出自己本身的失误呢？！

二

建国初期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延安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最佳状态，原因是社会风气好。在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



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同邻居一起吃饭

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样的风气显示着革命根据地有一种健康的向上的心理深层结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潜伏、蕴藏着不可估量的生机和动力。

作为一方“净土”，关键是第一条：没有贪官污吏。其所以没有贪官污吏，因为实行廉洁政治、建立廉洁政府，是当时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时，中央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使党内民主生活经常化，保证了党内的民主监督，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

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提出什么“全国党化”的口号。有一篇文章介绍，抗战时期，“蒋介石自任27要职，兼职在1000以上”，究竟兼了些什么职？这个权力最大、职务最高的人物，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提出在延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参政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

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认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实行“三三制”，加强了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强化了边区参议会、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政府政务公开，民主监督机制得以正常运行，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

1941年11月6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隆重开幕，毛泽东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党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开动脑筋，争献抗日救国大计。

毛泽东的诚意打动了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这位目光有神、个头矮小、拄着拐杖的老人，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列为81号议案。内容是：“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为：在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态

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量入为出，制订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参议会通过了这一提案。而后，边区精兵简政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这一提案的实施，对于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李鼎铭，比毛泽东年长12岁。经毛泽东提议，他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李举家搬迁延安，并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一天黄昏，毛泽东亲热地将他接进杨家岭的窑洞里，询问搬家情况。谈到家业，毛泽东说：“留一点吧。”他说：“一点不留。”毛泽东哈哈大笑：“你真是开明人士！”

桂林人梁漱溟，比毛泽东早生了70天。1911年加入同盟会，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对传统文化造诣颇深，也很有感情。

抗战全面爆发，认为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梁漱溟，特地来到延安讨教。

他与毛泽东头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6时延续到次日凌晨。梁开门见山，谈的是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最后落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井然有序。两人有所争论，欲罢而不能，又谈了一个通宵。

48年后，毛泽东辞世已经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回顾延安窑洞里的灯下夜话，仍然心绪激动：“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

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与非党人士“肝胆相照”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敢于实行、善于实行民主政治，是真理在握、对未来与前景充满信心的表现。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华侨实业家，早年参加同盟会，以自己的积蓄资助孙中山奔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陈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11字提案。邹韬奋称这11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40年3月，66岁的陈先生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祖国。5月底，陈嘉庚到了延安。

谁也想不到，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毛泽东给陈嘉庚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到新加坡后一次演讲中说：“我到陕北延安，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犹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处设在一座窑洞里，布置很简单。……有一次我看见他的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即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见客，及至回了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毛主席曾单独请我吃饭，是白饭、咸菜，配一味鸡汤。毛主席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有一次，我们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闲谈南洋的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座位满了，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了。毛主席向他

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这真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中没法见到的现象。”

陈嘉庚老人对重庆和延安两地进行了深入考察，他以国家、民族的未来、前途为着眼点，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下午一时半乘飞机到达延安。作为著名的老教育家，又曾经是同盟会会员，毛泽东特意在光线充足的会客室里接待黄炎培一行。壁上几幅画，有一幅是一位当代画家画的酒壶并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
天寒且饮两三杯。

画家在请黄炎培题词时，黄炎培忽然想起一个谣传：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过脚。针对这个传言，他题写了这首七绝以示讽喻。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陕北延安中共领袖的客厅里！黄炎培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周身，他敞开心扉，三天中和毛泽东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成了他自认为一生中的一个巨大转折。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黄炎培到他家中作客。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城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

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支配。”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有效的。”

在延安民主的旗帜下,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观照延安、参与政事、重温历史,对共产党人的政权建设大有裨益,为新中国的雏形补充了新鲜血液。

在中共“七大”会上,有人批评彭德怀1940年组织的“百团大战”是刚愎自用,自作主张。彭德怀心里很不高兴。

会后,毛泽东找彭德怀谈心:“我先给你做检讨,造成这个样子,后果、责任全在我。有些同志昏了头,提了很多错误的意见。我当时就对一些同志讲,你们这是帮倒忙,这样讲下去,老彭会骂娘的。虽然没有得到立即制止,但有一条我是坚持了,就是不写结论,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

毛泽东又明确地告诉彭总:“如果将来有人再提出此事,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第一,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二,毛泽东同志同意了,而且还有电报为证。”

毛泽东和他的战将之间此时此地的坦诚相见是真诚的,足可传为政坛上的千秋佳话。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曾带着十几辆满载军用物资的车队奔赴延安支援八路军抗战,受到中共中央热情接待,毛泽东夸奖卫氏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而且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此行对卫立煌产生极大的影响。1955年3月,他将自己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其中写道: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遭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竟向部下谗御

责任,谤为亲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倒行逆施、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斯诺是1936年7月进入保安的,这位31岁的美国青年,在陕北待了4个月,他忠实报道中国红色区域的政治主张、精神风貌及日常生活的40万言的《红星照耀中国》,三周内销售12000册,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籍。

在那么遥远的岁月里,在那样偏僻闭塞的山沟中,一个大洋彼岸的年轻记者,为什么能从尘封已久的东方土地上采摘到如此光芒四射的有活力的“珍珠”呢?这只能归结于珍珠本身所蕴含着的巨大光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珍珠有芒,照亮四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的民主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挫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的长期艰苦的斗争中磨练而成的强大武器,也是行将运载中华民族跨入21世纪的重要法宝。

(责任编辑:刘家驹)



黄炎培(右二)等访问延安,右一为毛泽东

王明错误路线纠正始末

● 曹英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25—826页）

在这期间，中共党内发生的几次重大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包括1927年上半年发生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和1927年到1934年先后发生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都是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和支持的，这些错误的理论根源都来自这个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陈独秀右倾错误曾招致了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前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错误，曾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了90%以上。

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倾错误相反，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是主张对国民党“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因而导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产生。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强迫实行180度的大转变，主张对工农以外的社会成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也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层，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又实行180度的转变，主张对国民党“只要联合，不要斗争”。这就导致1937年底到1938年9月王明由“左”变右的右倾投降主义，即新的陈独秀主义的产生，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主张对国民党要“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在10个月内受到严重干扰，使中国革命事业又一次受到了部分的但是严重的损失。本文只打算论述毛泽东是怎样反对和纠正王明的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错误的。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艰苦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时候，迭遭瞿秋白中央、李立三中央“左”倾路线的干扰，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的王明中央，更使毛泽东的革命道路遭到严重挫折。

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极力推行与共产国际、苏联相一致的“左”的路线，导致中共在白区和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严重丧失。

毛泽东由于坚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路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再遭到王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打击。先是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当时的苏区中央局，指责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为“狭隘的经验论”，在土地改革和查田运动推行的政策、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被指斥为“富农路线”；批评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是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于是被撤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接着，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职务也被实际撤免，只是被任命为毛并不感兴趣，也不擅长的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

1932年3月中旬，由于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力邀出山，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随林彪统领红一军团行动。但在具体作战方针上，毛、周与苏区中央局后方其他多数成员发生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决定毛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这样，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止，毛泽东被抛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最重要的前线之外，无奈地处于一种赋闲状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又重新回到所熟悉的军事领导岗位，率领红军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到达陕北，找到了革命的落脚点，使中国革命又出现新的曙光。同时，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军阀主义错误，使一、二、四方面军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统帅地位终于确立。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起具体领导军事、政治工作，也由此开始了毛泽东领军、张闻天主政的毛张体制时期。

毛、张体制始于遵义会议，一直持续到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结束，毛泽东的政治（党）领袖地位已为共产国际所确认，已在党内为全党绝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支持毛泽东的决策，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毛也很赞赏张闻天的工作方式和宽阔胸怀。

在中央最高层，毛泽东继续维

持同张闻天、博古、凯丰、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

毛泽东在1936年9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基本规定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必须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1937年8月22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作军事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说：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长征过后，由瓦窑堡会议，中经西安事变，到洛川会议，以毛泽东为



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本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策略的转变，表明这一代中共中央已在政治、思想上成熟。

抗日形势如火如荼，王明回到了延安。

王明在长达6年的留苏生活中，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与组织工作，并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在此次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仅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很显然，从中共隶属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看，毛泽东还是王明的下级。更何况，行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均接见了王明，并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均作了明确的指示。因此，王明是身揣“国际”这把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陈云、康生乘飞机自新疆抵达延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党政军要均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王明后来曾写诗记述这一“盛况”《七绝·不胜今昔之感（离上海到延安）》，云：

国际连番命启程，
日船悄悄四人行；
六年中外风云变，
蒋请苏机万众迎。

王明这位“国际神仙”，将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马上倾注到中共方针、政策中，迫不及待从批评洛川会议入手，提议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王明此时的意气神态，时在延安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

有这样的描述：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首先由王明作长篇报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反对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二是反对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游击战，主张正规战，提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并特别强调来自国际的指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11日、12日，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言，对王明的报告提出反批评，一再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模范、领导作用，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

在此次会议上，王明没和任何人商量，私自提出一张16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主要是将国内的有关领导人位置作重新变动，企图取张闻天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与毛泽东党、军分掌，但遭到与会者的抵制。不过，会议仍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连同以前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5位书记，这是中共中央在战争时期常委最多的时期。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央长江局，

领导南部中共的工作；还决定，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同时，中央成立25人的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为主席，王为书记。

会后王明赴武汉，率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12月23日，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为委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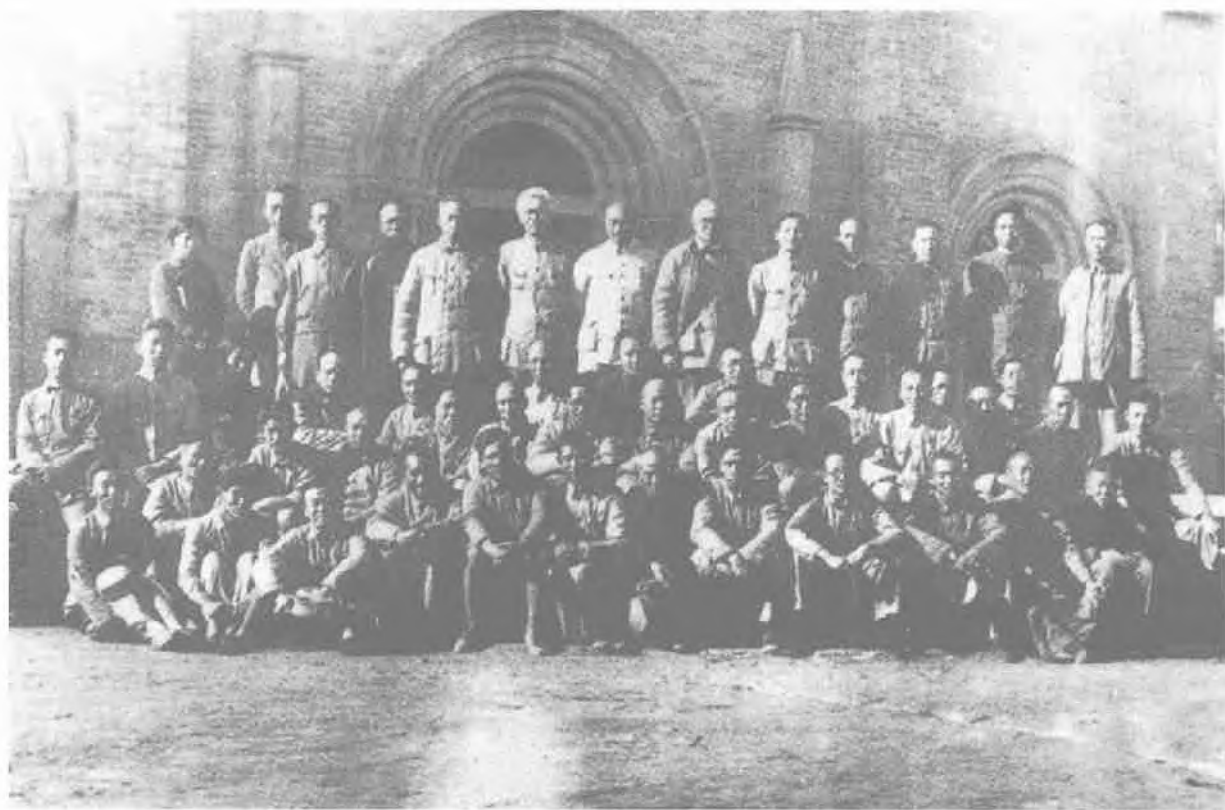
很快，王明在武汉远离毛泽东等的情况下，显现出企及独当一面，发表与中央不相一致的言论，特别是越权以中央名义公开发布文告、批示党内指示，竟然凌驾中央之上。

在此情况下，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背景，王明的意见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党内上层占据了主导地位，毛泽东自己就曾感慨地说，他的意见出不了他的窑洞。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洛甫、毛泽东、王明、周恩来、陈云、康生、任弼时、凯丰等8人召开会议。会上，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长篇发言，继续坚持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主张。对保卫大武汉、军事统一及游击战诸紧要问题都与毛泽东意见相左。

毛泽东在会上还对王明的工作去留表示，应让王明留在延安，不能再到武汉去，实际上是要王明不能在外无组织、无纪律地发表意见，将与中央不同的主张公开，但为王明等反对。最后，会议进行表决，以5票赞成3票反对否决了毛的提议，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但王明后来并未执行，直到8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

王明重回武汉后，于21日采取“先斩后奏”策略，未经中央同意，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会有中央委员17人，列席的有38人

表大会的提议》并送交国民党中央，再报告中共中央。王明此提议就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团结、健全民意机关、动员和组织民众等问题提出意见，且有过分迁就国民党、过于讲究合法与服从的右倾偏向，因而25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报告后，立即重新起草一份《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对“王明提议”附加8条意见，重点要求国民党改善民主、民生。但王明收到此电后，却隐而不发，直到4月1日国民党临时大会闭幕后才提交，公开抗拒中共中央。

4月23日，王明主持领导下在武汉出版的中共刊物《群众》杂志登载王明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长篇文章，将3月会议与中共中央的原则争论公诸于世。

5月底和6月初，毛泽东针对党内外的争论，尤其是王明的言论与汪精卫亲日派的谬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并整理成文。

毛泽东这篇富有远见卓识、基本规定了中国持久抗战总方针的文章，由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要中共在蒋管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转载，但为控制、领导此报的王明等人以文章太长予以拒绝。后中央再次电告分期刊登，亦为王明所婉拒。

王明在本年夏写的一首《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的诗中有鲜明的反映，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
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
阶段三分只通牌。

在注解第三句时，标明是“此处

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此诗是王明在晚年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披露的，他还有下面的回忆：

“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在我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此外，我还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关于我们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吩咐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

登此文。”

关于王明的脱离中央的“独立自主”，时仍在延安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记事》中说：

“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作者）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真正解决王明的右倾路线错误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而此次会议的契机则是任弼时去苏汇报和王稼祥自苏归国。

任弼时到苏联后，多次拜会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认真地汇报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内部分歧的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逐步转向，开始支持毛泽东，承认中共中央现存的既成事实。

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中共应当保持相对独立性，“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继续用一切力量，“在日军后方组织游击队及游击区域。”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正式全国爆发一周年之际，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登出毛泽东、朱德的照片，这在报纸为党的最重要公开喉舌与耳目的苏联，其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继任团

长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指示，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共产国际从对王明的信任转而支持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分歧解决最重要的砝码。

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这次长达近40天的会议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引人注目地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

11月5日、6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针锋相对地对王明的右倾错误提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即统一，又独立。”

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强调党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必须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不正确的偏向，肃清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并针对王明的自行其是、抗拒中央与张国焘的叛逃开

除党籍事件，提出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会议还在组织上对王明等的派别活动、路线错误作出规定。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领导。王明被限制在延安。

王明由此也一反前态，处处谨慎，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出人意料地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提出学习毛泽东的五种精神，即：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的这篇讲演是党内高层领导人较早公开表态称颂毛泽东为党的领袖的讲话，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肯定，王明已不再是与毛泽东争权的对手。

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即向毛泽东请辞中央负总责职务，为毛泽东所婉言拒绝，但会后张闻天还是将职责主动地移交给了毛泽东。关于这段情况，张闻天1943年有这样的回忆：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在经历四年多的实践检验后，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从未留洋学习过的山村书生，终于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战胜了党内各种错误路线，特别是来自共产国际大背景下的王明路线的干扰，成为中共真正的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核心。

（责任编辑：仲文）

解放区最早出版的

画报

● 梁小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批京津爱国青年和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来到了晋察冀边区。军队的宣传工作加强了。当时，宣传干部中已经有了一些照相机，加之能够摄影的全民社记者沙飞偕同延安电影团的到来，使新闻摄影形成宣传队伍中的一支新兵种。1939年，各个军分区都成立了摄影记者组。

为了更好地发挥摄影工作的战斗作用，晋察冀边区的领导层决定出版《晋察冀画报》，由军区摄影科长沙飞负责，又从华北联合大学及各部队调来了作家章文龙、罗光达、赵启贤，诗人蔡其矫和画家焰羽等人组成编辑部。又通过地下党从北平请为搞印刷制版的几位老师傅和当地的十几个青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叫支角沟的小山沟里建立了《晋察冀画报》印刷厂。

但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两条腿一蹲就是办公桌，用被子堵上门窗洗相片。印刷厂开始只有三个小圆盘机，车间设在老乡羊圈里，白天印画报，晚间还要圈羊。在敌人封锁禁运下，器材的补充，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战利品中搜索外，就是由地下党员在敌占区购买。

就这样，在1942年3月22日印出了一期反映边区参军热潮的《时事专刊》，作为画报的试刊。画面上再现了“父母送儿妻送郎，保卫祖国上战场”的动人场面。画刊真实生动、清新感人。受到边区军民热烈欢迎。

这时，晋察冀边区的“抗敌三日刊”（即现在的《解放军报》前身）支援了十几位同志和4台小石印机给《晋察冀画报》，而《抗敌报》的邓拓也派出十几位同志支援《晋察冀画报》创刊。军械厂还给予制造了手铸字炉和八页铅印机。敌人“扫荡”，只好一边打游击，一边继续坚持筹备出画报。

1942年10月，解放区的第一本画报——《晋察冀画报》终于和广大军民见面了。第一期共印两千册，主要内容有“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事迹报道等。

1943年12月9日深夜，晋察冀画报社到达阜平县柏崖村。刚安顿好，村口就响起了爆炸声。扫荡的敌人包围了村子，报社人员拚死命往外冲。沙飞没顾得上穿鞋，抓起一背囊重要底片就往外突围。敌人追

上去，沙飞一摸手枪不在，原来昨晚借给警戒的同志了。敌人即在扑上去，沙飞急中生智，将垂在胸前的米袋向后一甩，日本兵以为是手榴弹，赶快趴下。警卫战士王友和赶到，同敌人拼起刺刀。他一连刺倒七个日本兵，可是又上来八个鬼子跟他拼杀。王友和被敌人刺中脖子，倒地后日本兵又刺了他几刀，幸非重要部位。鬼子捏了捏他的鼻子，以为王友和死了，才离去。沙飞脱险了，但两脚地板的肉都磨掉了。王友和也没有死去，后来（在沙飞离去之后）又苏醒归队。

但在这次突围战中，晋察冀画报社牺牲了十几人，指导员赵烈，工长何重生，工人李明等都已殉难。生还归队的人员又转移到阜平县洞子沟。大家宣誓化悲痛为力量。

《晋察冀画报》第二期、第三期接连出版了，第四期更印出了漂亮的套色版。

《晋察冀画报》的出版，还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支持与欢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曾热情地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底片送到晋察冀边区筹委高粮处。在白求恩大夫临终时，他又把自己心爱的“莱卡”照相机遗赠给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巴斯华、柯棟华、福莱等国际友人都欢迎和支持《晋察冀画报》的出版。1944年初，美军参观组人员看到《晋察冀画报》之后拍案称绝，并要求带回若干份到盟军总部去，让大家看看中国人民的英勇志士是怎样在敌后坚持斗争的。

《晋察冀画报》共出版了十三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时期，该报易名为《晋察冀画刊》。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又改名为《华北画报》。最后成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出版的《解放军画报》的前身。

（责任编辑：刘家驹）

抗日劲旅第十九路军 的兴与亡

● 陈光明



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浴血奋战

一

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队的第十九路军，像一簇无根的浮萍，在内战的漩涡中飘荡。但这支部队的历史却令人感叹不已：它的前身是粤军第十师第四团，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都在这个团任职。北伐时，它是号称铁军的四军的一部分。由于这支部队战斗力非同一般，因此，各派政治力量都曾向它伸手。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曾企图拉住陈铭枢，任命他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汉卫戍司令。不料，陈铭枢弃职逃到南京投奔蒋介石。陈铭枢丢下的部队由蔡廷锴率领开到了南昌，1927年8月1日，起义委员会名单上印着蔡廷锴的名字。哪知，蔡廷锴在起义军南下途中，竟将部队拉走，使得南昌起义部队顿时失去了一支主力。蔡率部回广东后，与陈济棠、黄琪翔争夺地盘，打得天昏地暗；1929年，蒋桂大战，他们从背后袭击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使得桂军一败涂地；1930年蒋、冯、阎大战，他们在蒋介石

石即将支撑不住的形势下，千里迢迢从广东杀到山东，一举打败冯阎联军，攻入济南，解了蒋介石即将灭顶的危难……这支纵横驰骋内战战场的部队，着实让各路诸侯刮目相看。人们都将它视为拥蒋的部队，但蒋介石却从不将它当做嫡系看待，只想让它在内战中换血。不久，这支戴斗笠、穿草鞋的老广，又开进了上海，投入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它的英勇事迹，迅速在世界传扬：

“第五团第一营第二连下士班长潘德章，面对敌铁甲车的进攻，抱起机枪向敌铁甲车后的步兵扫射，击毙数十名。”

“上等兵伍培、伍金兄弟二人，在闸北宝山路奋不顾身与敌人肉搏。他们左冲右突，见一个刺一个，刺毙约十几个鬼子后，终于被数十倍于他们的敌人所害。”

“三连中尉连副谭绍平和上士班长张桂林，在击倒敌数十人后，自己负伤倒下。战友帮他包扎后，他们又冲上前去……”

“陆营副中弹后仍然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了十几步，才猝然倒地牺牲。该营机枪连张连长负伤后，仍大呼杀敌，直到血流光为止……”

美国记者斯诺赶到真茹指挥所，他在与蔡廷锴探讨了十九路军为何如此勇敢后，作了这样的报道：“中国人永不能忘记在粉碎‘皇军战争机器不可战胜’的神话时所感到的惊奇和兴奋。士兵们决心以暴力对抗暴力，每一个人乐于迎接冒险。”

十九路军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全国军民都兴奋起来了，海内外立即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捐献活动，十九路军从得不到军饷的穷队伍一下子成了全国装备最好、经费最足的部队。

此时，日军迅速增兵 25000 人，十九路军却无后援。李济深亲自到北平请张学良相助，陈铭枢到杭州向鲁涤平求援……蒋介石不发话，谁也不敢出动一兵一卒。

3 月 1 日，日军在浏河登陆。在日寇的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的攻势下，十九路军被迫退到了苏州至嘉定一线。

5 月 28 日，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体育场刚开过，蒋介石便密令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

二

当十九路军在厦门登陆后，立即挥师汀州，七十八师的两个团落进了彭德怀的口袋，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欲哭无泪。

紧接着蒋介石通令全国，将十九路军的此次失败肆意张扬，以贬低十九路军的威望。蒙受羞辱的陈铭枢，已看出蒋介石的图谋，他决意联络红军反蒋。

在延平东郊的大山里，军团长彭德怀见到了一个抓来的俘虏，他说他叫陈公培，他交给了彭德怀一封信。

陈公培是黄埔军校的二期生，南昌起义当蔡廷锴拉着队伍逃跑后，他坚定地跟随周恩来南下汕头，担任了城市保卫工作，责任心强，亲自带枪巡逻。在粤东那个叫做流沙的小村庄，决定起义军最后归宿的会议上，周恩来又见到了这位精干的年轻人。起义军失败后，周恩来病重，被人抬上了一叶小舟，漂到了香港。而陈公培便去了上海，又追随陈铭枢。由于他文笔好，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政治经验，颇为陈铭枢所器重。这次，陈铭枢急于打开共产党的联系，想到了这位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早期共产党员。

周恩来现在已是红军的总政委，正为突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而苦思良策。十九路军此时此刻主动来联合，简直是天赐神助。他赶快给彭德怀回电，让他好好招待陈公培。并派袁国平速去延平谈判，达成了三条友好协议。

陈公培返回，蔡廷锴读完彭德怀致他的信，兴奋地说：“告诉各部队，立即调整部署，解除对红军的战斗状态。”

这时在香港的陈铭枢兴奋得夜不能寐。他一面发电报给蒋光鼐，请他们速派代表到瑞金，直接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谈，一面急购赴闽船票，亲自布置与中共领导人的进一步合作。

派往瑞金的代表确定为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和陈公培。

与陈公培一样，徐名鸿也是中共的脱党党员，并且也是在四军任过职。但徐名鸿经过“一·二八”抗战，已颇有知名度了。

徐名鸿、陈公培来到瑞金，见到了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他们在与中共的谈判代表潘汉年的谈判中，虽然在划定边界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很快还是取得了谅解，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翌日清晨，令徐名鸿、陈公培惊喜不已的是，毛泽东亲自来给他们送行。毛泽东笑着对徐名鸿说：“现在我们结亲家了，你们可以常来常往嘛！我们的潘汉年同志，就陪同你们去福州。”

徐名鸿握着毛泽东的手说：“谢谢。我觉得十九路军的很多目标与共产党是一致的，我们闽西的土改也搞得



陈铭枢



蒋光鼐

很热闹，欢迎主席去看看。”

毛泽东笑着说：“好啊，我对农民问题最有兴趣，当然要去看的。”毛泽东说这话时，内心隐隐感到痛楚：因为他此刻已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只能搞点农村调查之类的事。

但徐名鸿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握别毛泽东，骑上马缓缓东行时，心里只感到一种信任和放心。

三

陈铭枢的革命主张在他召集的香港会议上获得了通过。第三党人黄琪翔、章伯钧、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以及徐谦、李济深等，都同意了立即在福建举事的提议。会后，蒋光鼐和陈铭枢回到福建点燃革命之火。

蒋介石眼着自己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又将因出现内部分裂而告吹，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陈铭枢等人的叛变，因此，必须在福建的叛变发生之前，将他们的企图遏制住。

蒋介石从庐山给未参加香港会议的蔡廷锴发来邀请电，请他速往庐山面谈。蔡廷锴想了想，给十九路军驻

南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去了一个电报，让他作为代表去庐山。

黄和春在宋子文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但笑容满面，而且异常慷慨地当面指示宋子文送给蔡廷锴的十九路军50万元。50万元！中央一年拨给十九路军的军费才30万元呢！黄和春不禁感到惊讶。于是，他电报请示蔡廷锴能不能收下。蔡廷锴痛痛快快地答应道：“全部收下，并向委员长致谢。”

陈铭枢最担心的事发生了：蔡廷锴不同意立即起义。

陈铭枢的脖子涨得通红：“现在不同意革命晚了，香港会议已作了决定，各方面都动起来了！”

蔡廷锴气愤地说：“他们只是嘴上说说革命，一旦失败，他们也不少什么，可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却要流血、牺牲，甚至……”

陈铭枢气得说话声音都有点发颤：“贤初，你口口声声说人家不同意，我看就你这里有问题。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样！”

蒋光鼐赶忙插到他们中间，劝说道：“有话慢慢商量。这样吧，真如兄先去福州会会林森，我和贤初将部队调整后随后也去福州，我们再好好交谈。”

陈铭枢转身取过拐杖，气冲冲地走了。

林森乘坐的永安号兵舰泊在马尾，然后由海军派轿车将他送到了福州。

林森喜欢收藏古董字画，家藏古董数万件。平日还时常轻车简从到夫子庙逛古董店。因此，与收藏字画出名的陈铭枢结交甚笃。陈铭枢常往林公馆观摩书画，调侃这位京城有名的“好好先生”：“你买的这些字画是假的吧？”林森则笑着说：“再过几百年就成真的。”在宁粤分裂后的选举中，陈铭枢向蒋介石提出选林森当国府主席，居然顺利通过了。

陈铭枢亲往乌山脚下的林森下榻处去会见林森，两人一见面便异常热乎。林森说他是来扫墓的。

“林老，您是我很敬重的长辈。我愿意在此聆听您的教诲。有话，你只管对我直说。”陈铭枢估猜他身负有重任，便主动提出。

林森装做不介意的样子说：“我也知道真如老弟对中正有些看法。但南京的朋友们都想劝劝真如老弟，一家人不要弄得敌人似的。我站在桑梓父老的立场上，也想劝你，骂几句算了，不要打起来。”

陈铭枢笑笑说：“是他要打我们。谁抗日，他就打谁。冯玉祥不是被他打掉了么？我们要抗日，他就会来打我们。所以，林老不妨回去劝劝他，改变不抗日的政策，大家就打不起来了。”

林森苦笑了一下：“要好生相处，和为贵嘛。”

陈铭枢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边，蒋光鼐为了解解蔡廷锴的闷气，邀他去闽江口的海边打野鸭子。

一片荒草丛生的滩涂上，枪响过后，蒋光鼐举起望远镜，数着海边倒下的野鸭，朝蔡廷锴大声喊：“一共八只。”

蔡廷锴提着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蒋光鼐走来。

蒋光鼐见四周空空，便认真地说：“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让你来轻松的哟！我是想认认真真的跟你商量一下真如的建议。如果你反对，则前功尽弃。”

蔡廷锴望了一眼乌云笼罩下的海面，他不快地答道：“我不是不愿反蒋抗日，但是，事情做的太快，太急。内部思想也没来得及统一。昨天还教育官兵打共产党，今天又要联合共产党，这总得让士兵跟着脑筋转弯吧！”

蒋光鼐拉着蔡廷锴在一块礁石上坐下：“你想的都有道理，但是，客观形势不给我们以准备时间了。香港的人员都已陆续来闽。如果我们还犹豫，可能就会吓退了来闽投身革命的人们。”

蔡廷锴两眼怔怔地望着蒋光鼐，说：“这样人心不统一，肯定要失败的。我不愿意看到十九路军因为我而失败。我想，你和真如公都是十九路军的老长官，我可以将部队交出来，你们可以委派一位长官，我觉得，我实在没有信心。”

蒋光鼐沉重地说：“现在，无人能替代你的位置。再说，真如公有恩于你我，如今他带头倡议革命，我们不支持他，人们会怎么看你我呢！”

这番话，在蔡廷锴脑海里激起了一阵历史的快速闪回：从他当排长起，一直到北伐打下武汉，多年来，他正是在陈铭枢和蒋光鼐的提拔下，迅速成了一支天下闻名的部队的统兵之将。没有他们提携，就不可能有蔡廷锴的今天。虽然他们三人之间没有“桃园三结义”，但人们都把他们看作三位一体的集团。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谋划、蔡廷锴主军事，这正是最佳组合，因而使得十九路军不断发展壮大。如果自己挂印逃跑，那么，这种最佳组合就要被打破。那么，十九路军的前途也是成问题的……此时此刻，不应过多地考虑个人的成败得失，而应想着于十九路军的前途，着眼于团体的利益。他想了想，问道：“懋然兄，你真的赞成立即起事吗？”

蒋光鼐点了点头，说：“我参加了香港会议，知道真如公为策划这次革命费了很大劲。虽然他们都不及我们在福建的人，更加了解自己处境的困难，但大家好不容易下定革命决心，又岂能因为你扫兴而回呢！革命也确实要担风险的，而反蒋抗日，即使不成功，也是光荣的。十九路军只能在这样的旗帜下走完自己的历史。”

蔡廷锴为难地说：“我明知道这是一条危险四伏的路，不能将部队往这条路上带。我内心是沉重的，但只要

你们两位老长官坚持要干，我蔡廷锴绝不会背叛。”

蒋光鼐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也紧紧握住了蔡廷锴的手，说：“真兄弟也！”

四

李济深是在陈铭枢请宋庆龄、胡汉民都未成的情况下所能找到的最有声望的领袖人物。如果没有李济深的到来，这台锣鼓已敲响的戏还是无法拉开大幕。

李济深在福州频频的电报催促中，却迟迟不肯动身。因为广东、广西都不肯支持，他也犹豫不决。尤其是广西方面，一直忠告此次行动必败无疑，使他陷于沉思。可正当这时，从福州飞来接他的张文，详细报告了福州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得这位老将军坐不住了。

1934年11月20日，福州成了人声鼎沸的海洋，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在这座古城上空回荡。

只匆匆准备了一天，便将十万军民从福州的大街小巷号召到南门兜公共体育场。广场西端的主席台上，坐着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等几十名各地代表。十九路军驻福州的部队，肩扛机枪和子弹，威武地进到会场前列，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蔡廷锴

当晨雾散去，蓝天一片清澈时，一阵马达轰鸣从东面的天空中响起，四架从法国购进的双螺旋桨轰炸机以雷鸣般的轰鸣飞临上空。这是用全国人民给十九路军的捐款购买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热烈的欢呼。当飞机引擎声从空中消失时，广播里响起了福州公安局长丘国珍的声音：“现在，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始。”

主席团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他号召大家，要谋求中国之自由独立，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扫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当先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中正，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南京政府。

李济深站在台中央。自从1929年被蒋介石扣于汤山后，他就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十九路军在淞沪打响后，他曾北上动员张学良出兵抗战。今天他成了革命的旗手。他发表了即兴讲演：“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是几杆枪、哪个领袖、哪个英雄，就可以干得成功的。必须整个民众起来，才有效果，所以今天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成，兄弟觉得这是最可以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唯一的办法，兄弟觉得这光明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就在我们眼前了。”

萨镇冰身着长布褂，颤巍巍地走向麦克风前。作为福建名人，他被推选为福建的人民代表。作为参加过甲午海战的老将，他第一次听说过中国军队敢于跟日寇开战，内心激动不已。这位一辈子“忠君”，有些保守、迂腐

的老人，对十九路军的“革命”表现出难得的响应：“今天的会，是万不得已的举动。我们国家的兴亡，在此一举。希望全国同胞共同努力讨贼，我们的大功才能告成。”

他的短短的几句话，立即博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以对日强硬而著称的外交家，因长期侨居国外，国语表达能力不好。由黄琪翔代他念了张纸条：“余以最诚挚的热情，希望大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努力于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的成功。”

蒋光鼐、蔡廷锴作为这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十九路军的统帅而倍受注目。

蒋光鼐只简短地作了一个态度坚定的发言：“……本人自本日起，已不是南京政府任命的省府主席，乃是一个人民。”他的几句话清晰地印入了群众的心，立即唤起了一阵长时间的欢呼。

蔡廷锴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向麦克风：“我们现在要想打倒帝国主义，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蒋介石一天不去，我们救国的革命事业，便一天受到威胁……”

台上各省代表都纷纷发言，声讨和谴责蒋介石卖国残民、破坏抗日。他们的演讲不时被群众的口号声所打断。接着，黄琪翔宣读了大会筹备处准备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这个宣言，与共产党的革命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

口号的差距相去并不太远。但瑞金的共产党最高决策人物给党内的指示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因而比反革命还更“反动”，更具欺骗性。

五

南昌行营，蒋介石下达了讨伐令，数十万大军直指福建。

蔡廷锴凝视着地图，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思之中。

作为军事主官，他要向革委会成员发表自己的意见：“福建乃是四战之地，除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诸方面都要设防。而我们只有不到7万人的兵力，若散在四方，即无机动作战能力，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

作为总司令，他必须使得会议尽快作出决断：“我的意见是：集中我主力部队于闽北山区，先行消灭已投蒋的对我危害最大的刘和鼎的杂牌军，……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从军事上讲，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态度，并掌握着一定的战役主动权，将内线作战变为部分的外线作战。而且闽北地区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还可以以逸待劳地打击奔袭福建的中央军。

在一片等待的沉默中，蒋光鼐结论式地说：“我军应将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和广东，作持久抵抗。”

根本没料到会有人提出这样消极的主张，蔡廷锴克制住自己的不满，笑着问：“懔然兄主张现在就撤？福州不要了？”

大家把目光留在了身材矮胖的李济深身上，毕竟他是四军老军长。而这支四军在北伐中的声誉这么响，以至以后不知有过多少个四军。张发奎把自己的部队拉回广东叫做四军，陈济棠留在广东的部队扩编后也叫四军。南昌起义的部队也号称四军，朱德红军游击队也叫“红四军”，后来编组红军游击队也叫“新四军”。其实，源流都在李济深的北伐军第四军。

李济深眨了眨眼睛说：“福州还是不能丢的嘛！”陈铭枢高兴地说：“李主席的看法很对。我们只要让革命的旗帜在这里飘扬三个月，全国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苏俄的列宁，就是彼得堡打出了革命的旗帜，革命就成功的。法国，巴黎公社的民兵们，还坚持了72天。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更是势不可挡。”

蒋光鼐此刻感到非常痛苦。目前，军事问题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如果不着眼于军事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黄琪翔是坚定的保卫首都派，他希望能从军事原则上说服这两位带兵之将：“十九路军守上海，有过中国军队无出其右的光辉战绩。上海乃一马平川之地，我军尚能坚持数月之久；而福州，北有北峰，西有闽候山区……



李济深

打一次福州保卫战，会让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再次想起上海保卫战，这正是扬我军之长。”

黄琪翔、陈铭枢、李济深这些人都是北伐军中的将星，对作战问题他们当然是深思熟虑的。蔡廷锴从内心深处仍然崇敬这些老上级。

蒋光鼐却很固执。他意识到这些政治家的马脖子上，将把这具马车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把十九路军这一赌注押在福州，将有可能把这支部队输个精光……他内心充满了一种负疚感。他知道：现在已无可挽回，他们已形成了多数。他两眼怔怔地望着地图上的红蓝圈，什么也说不出来。

六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真的干起来了。这对正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苦战的红军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彭德怀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写信给总政委并转博古，建议：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的赣东北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这样可以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但博古认为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周恩来的内心深处对蔡廷锴始终有一种信任感：这

是个典型的广东军人，治军严格，脾气暴躁，但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尽管蔡廷锴给他制造了那次“滑铁卢”。但周恩来还是相信蔡廷锴与那些满脑子私利的军阀不一样，他是从社会的最底层上升的，他了解人民，因而良心还在。这次主动要求联共反蒋，不正是他内心革命要求的表现吗？

周恩来向博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联合十九路军反蒋，为粉碎第五次反围剿创造条件。博古太年轻，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一窍不通，听了周恩来的介绍，觉得挺新鲜。因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联合十九路军的问题。但由于一年多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党内弥漫的是一片“左”的气氛，像这样一种提议，马上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这完全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让他们狗咬狗好了”。中共决策人对于福建事变的犹豫和彷徨，成全了讨伐福建“叛军”的“中央军”。

1934年的元旦是在一片战云笼罩的气氛下度过的。十九路军各军都迅速向福州集中，并在福州郊区展开后，赶修工事，准备打一场世界瞩目的“福州保卫战”。

此时，延平、水口失守。

陈铭枢显得很镇定：“我们的主力都还完好，可以在福州拉开阵势和蒋介石干一仗嘛！”



黄琪翔

蔡廷锴急得脖子拉得更长：“现在军心已经不稳，部队不经过调整，是难以遂行任务的。”

顿时，小屋里一片静默。

蒋光鼐说：“贤初的想法有道理。福州很快将陷入敌人重围。如果以十九路军在闽西南，则有可能背靠广东和红军，与中央军对峙几个月，等待全国形势变化。”

蔡廷锴说：“现在，再无休止讨论下去，就将陷全军于被动局面。我是总司令，要对部队负责。决定：为避免被敌包围，全军退向泉州、漳州一线。”

七

十九路军撤离福州向闽南退却。这情况，连蒋介石他自己都没敢想，十九路军就这样放弃了福州。

1928年，从南昌起义部队中分化出来的蔡廷锴，率领部队入闽后，又率领部队打回广东老家去。当时也是从这条福泉公路往南撤的。

现在，泉州忽地拥来了十九路军的数万军队。这座古城有可能成为被认为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十九路军和声势浩大的中央军决战的战场。

蔡廷锴意识到了：十九路军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这时，广州方面胡汉民提出善后主张：只要十九路军恢复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只要陈铭枢、李济深离闽，其余应免究……

蔡廷锴被胡汉民这几条建议深深感动了。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华，不能这样毁于内战战火。可蒋介石能听得进吗？

眼下，蒋鼎文部已在厦门登陆，汤恩伯部正在向同安进犯。

蔡廷锴郑重地对副总司令毛维寿说：“现在，十九路军还有四个军，损失不大，我全交你。在敌军未合围前应冒险向西急进，徐图再举。我今晚飞漳州，退龙岩，作最后反对独裁的措施。要保留下这支抗日队伍，现在非你出面不可。”

毛维寿脸一下红了起来。这话等于说，你跟蒋介石一直保持联系，我蔡廷锴早已知道。

副参谋长范汉杰目光木然地盯着窗外。他不敢看蔡廷锴的眼睛。他心里明白：十九路军落得进退两难，跟他有直接关系。为了自己前途，他暗中一直跟蒋介石拉着关系。这次闽变，他干脆把密电码本都送给了戴笠，使得十九路军一举一动都置于蒋介石的眼皮下。某种意义上说，十九路军是败在范汉杰的手里了。

蔡廷锴对他说：“范参谋长，你去厦门找蒋鼎文，商量是否可进行和平整编吧？”

范汉杰心惊肉跳：蔡廷锴这是真话？

蔡廷锴确实看出他与蒋介石早有联系。因此，战前把他从参谋处长调为架空的副参谋长，以为他没有兵权，成不了什么事，没想到，他比蔡廷锴能想象出来的动摇更为可恶。这口恶气，蔡廷锴只能噎进肚里。

23年后，已成为共和国政府领导人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坚决不同意释放这名战犯。因此，范汉杰第一批特赦没通过。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前，周恩来总理为他这位黄埔学生讲了话，说是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原因很多，不能都怪范汉杰。这才说服了大家。

蔡廷锴知道：范汉杰与其是去谈判，倒不如说是去联系投降。

八

蔡廷锴到龙岩后，不停地指示泉州的部队要趁敌尚未合围之际，向西突围。但他也知道，这是徒劳，因为大错已经铸成。

龙岩的上空，蒋军的飞机撒下了大量的传单。上面写道：十九路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四中全会，一致拥护中央，李、陈、蒋、蔡离军，停止军事行动、静候处理。

蔡廷锴手持传单，心平如水。

此时此刻，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从漳州撤向龙岩，可谓备尝艰辛。一路上，民军、土匪不停地袭击他们，他们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来到龙岩，就听说泉州的部队通电“和谈”，不战而降。这些拥兵多年的将领，突然觉得自己一钱不值。

陈铭枢禁不住呜咽起来。

蒋光鼐冷冷地说了声：“我是料到会有这一天的。十九路军有这样的结局，也还算光荣。”

陈铭枢、李济深却向蒋光鼐投去不解的目光。蒋光鼐愤然地说：“不打内战，这是当今中国军人最不易做的选择。”

赵锦雯在十九路军一直不受重用，而这次却被这些被围困的将军推为十九路军的谈判代表。他把对方已拟好的谈判协议向大家读了一遍：

“一、十九路军所属各军须按原番号缩编为师，照原编制名额呈报候点验。

二、师级以上如愿深造者，资遣出洋留学；不愿出洋者，给资遣散或安排相当工作。

三、团以上将校，应由中央遴选接充；营长以下仍供原职。

四、团长级愿深造者，可分别送陆军大学特别班或中央军校高级班学习。

五、编余官佐士兵，分别补充入闽部队缺额，其余年

老体弱者给资遣散。

上述条款，经双方同意后，立即移防整编，七十八师暂驻莆田，其他各师则分别在惠安、仙游等地整理。”

他举起毛笔，舒展地签下了“赵锦雯”三个字。他觉得自己三个字写得很顺手，很得意。

毛维寿终于如愿以偿，蒋介石任命他为十九路军总指挥，各师师长也换上了黄埔学生。

威震海内外的十九路军的番号，就这样被正式取消了。

还在闽西的蔡廷锴，领着残部钻进了山林小镇。

5年前，也是在寒冬里，也是在这个小镇上，毛泽东对一支败退而归的红军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从此走上了胜利的坦途……在那些寒夜里，他就着一盏油灯，写下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他的棉衣上，留下了炭火烧燎的黑洞。然而，1934年2月的寒冬里，蔡廷锴却在这个小镇上陷入迷茫。

蔡廷锴在这里，接受了劝告，将十九路军残余部队交给了陈济棠，改编成独立第三旅，以期使这支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能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而陈济棠在接受改编后不到一星期，就利用会操的机会，将独立第三旅缴了械。这样，就使得十九路军企图东山再起的希望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因为放弃了与十九路军联合这一难得的机会，无法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万里长征。

两年后，因为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广东暴露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接着多年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分庭抗礼的广东，也被蒋介石“解决”了。

（责任编辑：刘文）

（本文节编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劲旅之亡》一书）

作者来函补正

《张爱萍单枪匹马闯路东》一文的倒数第七段，开头应为“吴法宪的电报是半个月后来的。张爱萍带着省委秘书刘玉柱与吴法宪在豫皖边界会合……”

特此补正

胡士弘

驻旅顺苏联红军提前撤退内幕

● 周金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辽东半岛的旅顺口，仍然驻守着一支外国军队，那就是苏联红军远东后贝加尔第三十九集团军。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有关协定，中国的旅顺港口暂由苏中双方共同使用30年。1955年5月27日，这支苏联红军突然全部撤出了旅顺口，比协议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20年。这是为什么？

“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近百年来，列强曾先后染指这里。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这是三个大国的一次秘密交易，它们背着中国允诺苏联海军在辽东半岛驻扎，并以此为条件，让苏联承担义务，即德国投降后，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正式对日作战。

1945年8月9日凌晨，150万苏联红军、数千辆坦克和数百架飞机，在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向日军发起突然攻击，一个月左右，近100万日本关东军全部崩溃，解放了中国东北全境。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官伊凡诺夫中将，率领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土城子机场着陆，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小林海军中将向伊凡诺夫交出了指

挥刀。当天下午，一批乘火车的苏军抵达金县石河驿。24日，苏军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所属的首批坦克部队抵达旅顺，进驻兵力约1万人。除海上舰队外，其中有步兵1个师驻守旅顺口。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有数不清的重大问题需要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去处理。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寿辰，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包括旅顺口驻军一事。

面对斯大林提出的一些苛刻条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思维和才略征服了斯大林。斯大林让步了，他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一个是现在撤兵。”在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内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协定》指出，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出，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由中国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

复与建设费用；旅顺民事行政直属中国。缔约国任何一方受侵袭而卷入军事纠纷时，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然而，中苏两国协定签字的墨迹未干，美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朝鲜，并宣称“鸭绿江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斯大林来电询问我方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怎样，能否出兵，助一臂之力。

为此，周恩来总理秘密访苏，并同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会见了斯大林。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斯大林很有远见地说：“如果朝鲜同志继续坚持下去，就可能无畏的牺牲，要告诉他们撤退，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国东北，把老弱病残撤到苏联，我们两家都能承担起这个任务。苏联想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我军已撤出朝鲜了，如再出兵就等于我与美直接交战，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设想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斯大林同周总理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大炮坦克等项军事装备……”

毛泽东马上致电斯大林：“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我国抗美援朝的态度坚决，行

动迅速，斯大林同意为中国装备60个师和1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在周总理建议下，彭德怀、金日成秘密访苏，斯大林又同意为朝鲜装备3个空军师，5个高射炮团，援助2000辆汽车和1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

面对朝鲜战场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分析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他们也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美国将更伤脑筋。于是，中苏两国外长再次达成《换文》协议，为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苏军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1953年7月27日，美帝国主义不得不认输，与朝、中两国代表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1954年9月，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的庆祝活动。赫鲁晓夫在华期间同毛泽东主席举行了多次会谈，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协定。

赫鲁晓夫在后来的一次集团军高级指挥官会议上说：中国人的事情就让中国人自己去管吧，苏军驻扎在这里是一种侵略，这是沙皇和帝国主义的行为，过去驻旅顺口的三十九集团军强占了中国、朝鲜和芬兰的领土，现在到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时候了。

赫鲁晓夫最后命令第三十九集团军必须在5个月内全部撤出，一兵一卒也不许留下；并决定把旅顺口所有的苏军武器、技术装备及弹药都卖给中国，并按“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行事。

1955年2月，毛泽东亲自安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慰问驻旅顺口的苏军代表团事宜。

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兼

国防部长彭德怀与代表团副团长、中苏友好会总会会长宋庆龄，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等一行于1955年5月22日，抵达旅顺。彭德怀在慰问大会上代表毛泽东主席将一面绣着“苏中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署名“毛泽东”的锦旗授予苏军领导人。

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带领慰问团全体成员及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和苏联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等人在旅顺举行了“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同时，旅顺人民在白云山营造了“中苏友谊林”，它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1955年4月9日，旅大11万人集会于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斯大林广场，欢送苏军撤退回国。

整个具体交接工作于4月14日基本完成，4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防务交接签字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基地以司令员罗华生为代表，苏联海军以基地司令阿·普·

库德梁夫切夫少将为代表，于旅顺水兵俱乐部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证书》证明苏联海军已将辽东半岛协议地区之海军防务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自1955年4月15日24时零分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负责该区沿岸之防务。

1955年5月25日，最后一趟运送苏军回国的列车在千千万万的欢送人群中，缓缓离开了旅顺口……

至此，以什维佐夫上将为司令员，图兰达也夫少将为参谋长，格列克夫少将为政治部主任的驻旅顺口第五十五区的苏联远东后贝加尔三十九集团军所属的警卫师、机炮师、预备炮兵师、独立炮兵团、空军五十五军、海军舰队、鱼雷机师和通信团、工兵团、直属队共计12万人，分批撤离，1955年5月27日，该集团军司令部随同最后一批部队一起全部撤出了旅顺，从而结束了苏军在旅顺驻军的历史。

从母体分割达60年之久的旅顺，从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责任编辑：刘文)



1955年4月，中苏双方某部在交接证明书上签字

傅崇碧谈“杨余傅事件”

● 舒 云

一

在傅崇碧将军高大宽敞的客厅里，除了一面窗外，三面墙上都是名人字画，舒同的条幅：“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出处不得而知，但这十个字足以概括傅崇碧将军坦坦荡荡的一生了。

傅崇碧说他自放出来重新回到家后，舒同来看他，就请他写字。舒同说：您也练练字，可以从中学到气功。就在那时傅崇碧拜舒同为师，赋闲在家就天天练字。傅崇碧说他虽不是什么文化人，但他对文化人很敬重，爱书画如宝。“文革”中，郭沫若病得很重，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傅崇碧去看他，说郭老给他的字都没有了，能不能再给他写一幅。在“文革”中，傅崇碧保护过郭沫若，郭沫若很感激，说：“现在我不能写了，让我老婆于立群写。她的字好，不值钱，你要不要？”说完叹了一口气。傅崇碧告诉我：郭沫若那时受了冲击，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由于立群陪着练字，写完就扔在地下。一上午写下来，地上一大堆。他们走后，警卫就把地上收拾干净了。每天如此，谁也不敢偷偷留下一两张。那时谁敢私藏“封资修”的东西啊？那天，于立群写得很长，写完后让郭沫若签字，郭沫若躺在床上手腕抖了好半天，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最后还是于立群代签上了名字。

傅崇碧有一个珍贵的樟木大箱子，里边保存了不少名人字画。有毛主席给他写的，有朱老总写的。还有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写的。何香凝也给他写过一幅字。他在朝鲜还和赴朝慰问的梅兰芳成了好朋友，梅兰

芳送给他两箱子自己在艺术顶峰时录的唱片。这些都放在大樟木箱子里，塞得满满的。后来巴金要参考资料，向傅崇碧借走了不少，说一定归还。“文革”后，巴金很抱歉地对傅崇碧说，借去的那些资料全部给抄走，再也找不回来了。

傅崇碧被释放出来后，那个价值连城的大箱子已经无影无踪。傅崇碧是个很有心的人，他在战争中就注意保存资料，行军打仗的道路、地名、作战地图以及抗日时期的剪报、战斗故事等，记了六大本，专门用美国产的派克墨水，怕时间久了掉色。多年下来，积了大约几百万字，还有好大的一摞剪报，以及红军时代的照片，这些他都存放在箱子里一块不见了。后来杨得志、李志民等写回忆录，都问傅崇碧要材料。傅崇碧说：“哪里还有，全丢了。”这使傅崇碧很伤心。

二

傅崇碧今年整整 80 岁了，除了耳朵聋一些，身体还是很好的，走路仍然是标准的军人风度。

傅崇碧的老家在四川通江县，1932 年在他 16 岁时刚参加红军就七次负伤，十八九岁就当了团长。那时负伤最多，有一颗子弹从脑门穿过去，从后脑勺出来。那子弹还算长眼，要是稍低一点，就完了。打小腿上那次也是贯通伤，他坚持骑马行军，指挥打仗，一二十天就好了。

傅崇碧在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他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就是在卫戍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被莫名其妙关了起来。

那是 1967 年的一天夜里，谢富治打电话告诉傅崇

碧，说林彪和中央文革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的干部，要他马上通知。傅崇碧叫秘书通知有关部门叫团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他自己先赶到了人民大会堂，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他被关七年的头一个夜晚。

那天夜里，卫戍区团以上的干部也都到齐了，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都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正边吃边聊天时，总理从小会议室里出来，对他说，你不要激动。傅崇碧心里明白有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一会儿，林彪来了，总理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旁边的沙发上。林彪坐下来，对傅崇碧说：你到沈阳，当第一副司令，温玉成接你的手，主管卫戍区。命令一宣布，总理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和林彪一起出去了。过了约半个小时，总理又进来了。傅崇碧正和陈锡联吃水果，聊天。总理说，什么也搞好了，是不是马上走？傅崇碧说我回去取东西。总理说：还回去？干脆吧，要什么东西，你写个条，让陈锡联办。傅崇碧说，这么急，又不是打仗。总理说还是写一个条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走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好吧，你们走吧。

傅崇碧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上了车，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人夹着他，后面还有两辆车。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有烟抽了，机场的主任就给拿了一条来，他分了几包给陈锡联。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飞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去洛阳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

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下了飞机，沈阳军区一个副政委带了几个保卫干部来接，陈锡联脱下了自己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就走了。

傅崇碧被这伙人带到一座楼上，当时傅崇碧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道上一道岗哨，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当然，这封信是不会有下文的。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关七年。一个排看管他，不到一两个月就换一个地方。

关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征兆，放出来也没有什么征兆。1974年，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飞，就由两个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萧克也来跟他讲，说不要得罪……第四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辆大红旗来接。总理住在西花厅，傅崇碧过去哪一天也要去，而这回车过了中南海西门还往北开，到了小西门，不进，还往北。等过了养蜂夹道，才钻进一个胡同。傅崇碧以为完了，这不是中央文革专案材料组的地方吗？直到开到一个院子，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才看见穿着睡衣的总理。总理上前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的眼泪下来了，他这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了。总理说不要激动，你受了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傅崇碧记得他在七八年前被关起来时，最后在人民大会堂也是总理跟他说的话：你的身体不好，先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党考验，将来出来为党工作。傅崇碧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是3月22日，烟还没抽完两支，就“保护”起来了。



傅崇碧和作者

周总理说，八一建军节主席见你没有出来，从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说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萧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总理说：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人派个车……总理一把这些事交代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总理说：不要紧。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思。总理说：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傅崇碧说：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我不干了。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傅崇碧被关起来时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直到关了很久后的一天，他从小窗外看见一条“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还想了好久：没听说有叫杨余傅的人啊。他哪里想到杨余傅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当他坐在书香味很浓的客厅里平静地给我讲着这件笑话时，其心中的酸甜苦辣是不言而喻的。

“文革”开始后，鲁迅夫人许广平写信给毛主席，说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书稿丢了。毛主席批给周恩来，周恩来让卫戍区查找，说戚本禹可能知道一些情况。傅崇碧在秦城监狱找到戚本禹，戚说是江青让取走的。他又满头大汗找了一圈，鲁迅手稿就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而江青却装着不知道，一再让查。傅崇碧打电话报告江青，说查清了鲁迅手稿，他们马上就到钓鱼台。

钓鱼台虽说当时是中央文革的所在地，但作为卫戍区司令员，也有权力进去。傅崇碧还是谨慎的，他带了两台吉普车，到了钓鱼台门口又打了一个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秘书说可以进去。一见江青，江青就赖账。后来她的机要秘书承认有此事，江青马上强装笑脸，要把傅崇碧留下来吃饭。傅一走，江青就大怒，说傅崇碧到这来抓人了……

四

傅崇碧知道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江青了。

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还莫名其妙地经常穿身军

装。有一次，她对傅崇碧下指示要给上街游行的造反派解决车辆，傅崇碧请示过周总理和军委几位老师后，没有理会江青的指手划脚。

总理交给傅崇碧一个任务，说是有30多个省委第一书记、部长呆的那个地方不行了，要傅崇碧给他们找个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把他们送到东高地，按照总理的指示给他们吃小灶，还给他们送每天的报纸。有一天，江青、康生追问傅崇碧，傅崇碧说，别问了。江青问：是谁让干的？傅崇碧说上边。傅崇碧不说了，他不能把总理交代出去。

经历过“文革”的那些搞原子弹、导弹的科学家们记得傅崇碧，都说他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积极地保护，那些原子弹的材料非搞烂不可，他们这些科学家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呢。当时这些高级专家住在三个地方，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荣臻找到傅崇碧，对他说：要保护那些人和那些机密材料。傅崇碧马上就加强了警卫。他还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包括国务院部长、省委第一书记在内的30多人都给藏到东高地兵营里。另外就是那批关于原子弹的材料，叫造反派给搞走了。傅崇碧告诉聂帅后，聂帅说一定要搞回来，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搞回来。傅崇碧对总理说了，周恩来非常支持聂帅的意见。于是，傅崇碧派了20多辆北京吉普给追了回来，然后封闭起来。这都触犯了江青，她拍桌子说：红卫兵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光开红灯不开绿灯。傅崇碧悄悄把这些科学家转移到七机部的楼上，刚开始用一个连警卫，后来他不放心，又调来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红卫兵要冲，傅崇碧说，谁冲就开枪打谁，这是军事禁区。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做得对。江青却发了好大的脾气，说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傅崇碧对总理说，江青追查得很厉害。总理说他们再问，你就说是我叫办的。

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事。

国防科工委造反派头头对聂帅攻得很厉害，两次冲击卫戍区。傅崇碧就去请示叶帅怎么办？叶帅说把他们关起来。他执行叶帅这个指示，把人关了起来。江青让放人。傅崇碧说不能放。江青就亲自找傅崇碧谈话。那次毛主席在游泳池叫傅崇碧去，傅崇碧把这事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见他手里拿有一卷纸，问他是什么，他说我也没有看，上车时红卫兵从车窗户塞进来的。其实傅崇碧知道是红卫兵画的百丑图。毛主席拿过来打开一看，发火了，说：这是丑化我们，都说朱毛一家，朱和毛能分开吗？这个百丑图是错误的。你赶快打电话给陈伯达，不准印这个。毛主席问，北京现在怎么样？傅崇碧告诉毛主席说，现在北京很乱。胡耀邦下跪，腿都跪破了。陈毅夫人挂着大牌子挨斗，坐喷气式。傅崇碧说

了按总理指示保护好省委第一书记的事,毛主席说:总理搞得很好,你也搞得很好。不要紧,再追,就说是我叫办的。毛主席又问,朱德现在还有大字报吗?有,名字都是倒着的,还划着××。傅崇碧还讲了搞原子弹的专家以及知识分子都叫臭老九。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傅崇碧说主席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说的。毛主席说你怕什么?这是我讲的。从主席那里回来,傅崇碧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夜快结束了,他没有去钓鱼台,直接回到了家里。虽然他知道江青正在钓鱼台办公。

江青心虚,从卫戍区到市府大楼到处找傅崇碧,找到他家,叫傅崇碧马上到钓鱼台来。追问傅崇碧为什么不先到这里来?傅崇碧说天快亮了。江青问主席都说了些什么?傅崇碧说没讲什么,就讲了讲安定团结。江青更加生气,说那些老部长都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有了“尚方宝剑”,不慌不忙拿杯子喝水,说不知道。江青站了起来,陈伯达也站了起来,傅崇碧也发了火,把杯子一拍,说你问主席去。江青马上软了下来,说:你怎么不早说?周恩来当时也在场,出来后,他把傅崇碧拉到车上,说: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冷静?傅崇碧把主席的话讲给总理听,总理笑了,说你办得好。

还有一次,傅崇碧救陈再道。一万多人斗,要把陈整死。傅崇碧把陈再道搞到电梯里,让电梯升到半截,谁也找不到。总理为这事也哈哈大笑。宋任穷也是傅崇碧给转移的。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黄克诚在医院里写了个条子说拉不出大便,想吃点苹果。傅崇碧跟他很熟,但不敢去看他,就叫警卫买点苹果,乘专案小组不在的时候送给他,还关照警卫把吃剩的果核拿掉。没想到第二个苹果核就被发现了,追查到傅崇碧这里。傅崇碧说旧社会还可以探监呢,他自己的钱,买几个苹果吃怎么啦?江青、康生都不满意,说他把文革小组比做旧社会。

已经关起来的贺龙发高烧,周总理让他讲是不是让贺龙到301治疗?傅崇碧说他讲不合适。总理说你讲,意思是把贺龙交给卫戍区。江青说他这个坏蛋没有资格住301。总理不好再说话了,就叫傅崇碧想办法,找个医院。傅崇碧说:北京军区总医院也造反了,不行。我们卫戍区的师医院可以,没有造反。总理说:那好,就去那里。傅崇碧亲自去看的房子,很大,怕屋里太冷,傅崇碧又叫人拿来两个加热器。他不敢去看望贺龙,但从卫戍区找了一个很好的厨师专门给贺龙作饭。后来,造反派造谣说傅崇碧和余立金勾结要把贺龙送到苏联保护起来。江青多次火冒三丈地质问傅崇碧,傅崇碧想:惹不起躲得起吧。谁知冤家路窄,上海造反派连着送给他两包材料,都是江青30年代当演员的一些窝囊事。其中还有江青给蒋介石祝寿的照片。两次周总理叫傅崇碧给江青送去。第一次江青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在会

上发了一通火。说背后有人整老娘的材料。第二次送来的材料,周恩来特地叫人加了密封印后请示江青,江青让销毁,还点名让傅崇碧到场……

傅崇碧和余立金以前连认识也不认识,“文革”中余立金担任空军政委,这才有了些不多的工作关系。与杨成武认识较早,但也不在一起工作。这“杨余傅”真是生拉硬拽也扯不到一块。

傅崇碧关到东北时,审问的人问他搞了些什么阴谋?傅崇碧不承认有阴谋,只是发火,质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枪毙吧,朝这胸口打,蒋介石、日本鬼子没打死我,让你们打死算了。

傅崇碧在京西宾馆住了半年多。有一次杨成武一家和傅崇碧一家一起去看望聂帅,聂帅指指耳朵说:只带耳朵别带嘴。大家都不敢深说什么了。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学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本刊邮购启事

敬告各地读者,如当地邮局不能订阅《炎黄春秋》,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4.00元,补购任何一期或补订一个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收邮费。

本刊1995年合订本(总34—45期)已装订完毕。全部精装,每部47.00元,一律免费挂号邮寄。

请您汇款时务必将姓名、地址、邮编,书写清楚,以免误递。

本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政编码:100802

电话:66170955

联系人:杜习

内蒙古 乌兰夫 周恩来

● 郝玉峰

在延安的整风中再次相会

1942年的深秋，延安整风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正在延安民族学院当教育处长的乌兰夫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孰料，乌兰夫进入党校后，便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在学习会上，大家要他老实交代：他为什么把党有深厚工作基础的新三师丢给了胡宗南，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什么自己只身回了延安……乌兰夫为自己申辩说：新三师西调和回延安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质问道：“你不要往上推，你拿出中央的决定来让我们看看！”



乌兰夫(1945年)

当时党中央发给他的电报，为了保密看完后立即销毁了，现在他上哪儿去找那份电报呢？乌兰夫在党校受审查的情况被周恩来知道了，他便找到张闻天说：“新三师问题是你直接处理的，下面人不了解情况，我看你是否去党校说明一下情况？”张闻天叫高岗到党校说明了问题，要大家在整风中就别纠缠这事了。

一天，周恩来到党校，遇见了乌兰夫。

“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周恩来向乌兰夫表示了歉意。

接着他们谈了自从莫斯科相见后的情况。周恩来表扬乌兰夫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工作很有成绩，勉励他说：“中华民族还在受难，你们蒙古民族受的苦难更重。我们这些人任重道远呀，你过去在莫斯科学习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经过很多实际斗争，要利用这个好机会，把斗争水平提高一步……”

乌兰夫告诉周恩来，组织上决定派他去伊克昭盟开展民族工作。周恩来说：“很好嘛，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还缺乏经验，你熟悉蒙古民族地区情况，要摸索出一些民族工作经验来。”

伯乐力荐千里马

1945年的夏天。中国共产党“七大”的筹备工作，正在延安紧张地进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斗争，酝酿选择一名蒙古族代表进入七届中央委员会，以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开始，组织部门推荐的人选并不是乌兰夫，周恩来却力荐乌兰夫。他列举了三个理由：第一，乌兰夫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经过李大钊同志的培养，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他坚决贯彻我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比较强的组织能力；第三，他对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很熟悉。最后周恩来强调，乌兰夫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经受住了考验，是个难得的蒙古族好干部。周恩来还让与乌兰夫一块工作过的王若飞向大家介绍情况。

王若飞详细地介绍了乌兰夫在苏联学习时的工作表现和白色恐怖时期主动要求回内蒙古西部发动蒙古族群众、重建党组织，领导百灵庙起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共同建立蒙古族第一支抗日武装新三师，并且在新三师内开展党的工作，培养民族干部，坚决贯彻我党团结抗日政治路线等事迹。又说他有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地下斗争的经验、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民族工作的经验，在蒙古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那时，党中央政治局中，最了解乌兰夫情况的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尤其是王若飞在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曾与乌兰夫共同开展过地下斗争，对他的为人比较熟悉。所以王若飞评论乌兰夫的政治品德、思想作风以及工作能力是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虽然不了解乌兰夫的全面情况，但在1938年5月乌兰夫到延安汇报新三师党的工作时曾见过一面，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由于周恩来和王若飞的力荐，毛泽东表示同意，就正式确定了乌兰夫为“七大”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

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一名蒙古族中央候补委员是很令人瞩目的。“七大”选举中，乌兰夫以全票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关键时刻的两封电报

抗日战争胜利的礼炮声中，党中央派乌兰夫回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民族工作。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和内蒙古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联合东蒙、西蒙成立地方性内蒙古自治政府。

内蒙古人民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呼雀跃，但是，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人中，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认识并不统一。以乌兰夫为首的大多数领导坚持主张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自治政府，而少数领导却提出内蒙古地区落后，以牧业经济为主，没有产业工人，不宜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主张建立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自治政府。此外，再加上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在背后破坏，当时的内蒙古便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乌兰夫想，这是关系到内蒙古人民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必须请求中央予以指示。

时值党中央刚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作生死搏斗时刻，因为民族问题是重要大事，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在百忙中研究了乌兰夫的报告，周恩来在窑洞里坐着小板凳，将纸铺在大腿上起草了电报，对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提出了六条原则，对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纲领，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内蒙古自治政府与祖国的关系以及有关党领导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指示。这就是中共中央1947年3月23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诸问题的意见》。乌兰夫读罢中央的电报后，立即在领导和党员中作了传达，同时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在王爷庙开幕。会议期间，在讨论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时，有人公然提出“中共不适合内蒙”，仍然坚持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乌兰夫又向党中央请示，同时提出了不宜成立“内人党”的个人意见。周恩来于4月20日代表党中央给乌兰夫发出电报，明确提出：在内蒙古不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党中央和周恩来在内蒙古革命的关键时刻给乌兰夫的又一次坚决而有力的支持，也是为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建立自治政府指出了正确方向。

乌兰夫用党中央这个指示，统一了全体代表的认识，顺利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

骏马奔腾

1950年3月，乌兰夫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通知，要他赴京参加内蒙古地区划界工作。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同他谈过一次话。

开始，毛泽东问他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在望，蒙古族民族都有些甚么要求？乌兰夫见毛泽东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便坦率地说：“蒙古族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在中

国革命胜利后，能够恢复历史上内蒙古版图的面貌，实现东西蒙地区的统一。”

毛泽东听后说：“好啊，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蒙古民族跟着中国共产党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民族采取的大汉族主义和分而治之的统治和压迫嘛。现在绥远谈判正在进行，董其武起义后，绥远和察哈尔、热河部分地区，都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周恩来要乌兰夫把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情况写一份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讨论研究，并做了一个重要补充，说：“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内蒙古地区的工作，给接受绥远和蒙绥合并做好准备，请主席和乌兰夫同志考虑，是否先将内蒙古自治区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去？”

听了这个意见，毛泽东问乌兰夫：“你的意思呢？”

乌兰夫立即表示：“我赞成周副主席的安排。”

“恩来这个意见很好。你们先‘借荆州’搬到张家口办公，至于将来内蒙古的首府设在什么地方，还有内蒙古管辖的区域怎么划分，由恩来同志和你再作具体研究……”

不久，由周恩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便由乌兰浩特迁移到了张家口。

……下了火车，乌兰夫在内蒙古驻京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餐后，乌兰夫便按时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周恩来一条腿跪在地毯上，左手举着一个圆形放大镜，右手握着一杆红铅笔，正聚精会神地往铺在地毯上的全国地图上划着什么。

乌兰夫走上前，挨着周恩来也单腿跪在地毯上。周恩来指着他用红笔标注的许多大小城镇，问乌兰夫：“你先看看这些地区划归内蒙古行不行？”乌兰夫接过周恩来递给他的放大镜，详细地看了一遍说：“行，行。总理对内蒙古的历史版图很熟悉呀！”

这时，秘书在一旁告诉乌兰夫说，总理这些日子研究了清朝时期、国民党时期，甚至日伪时期的内蒙古的版图。周总理对内蒙古的划界这么重视，这么细心，使乌兰夫深为感动。

周恩来认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绥远和平解放后，他便着手考虑内蒙古的划界工作。他的原则是，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照顾现实；既要实现蒙古民族的愿望，又要照顾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利益，要划出团结统一来。

就这样，他俩一边研究，一边划定了内蒙古地区的版图。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所在地，乌兰夫提出，归绥（现呼和浩特）在历史上曾是内蒙古的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设在那里比较合适。周恩来当场就采纳了乌兰夫的意见。

内蒙古划界工作结束了，此时周恩来突然又端着茶

杯走到地当中，用两只深邃的大眼，饶有兴趣地凝视着地上那张大地图上划出来的内蒙古版图。乌兰夫以为周总理又有新的考虑了，问道：“总理，还有甚么问题吗？”

周恩来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招手让乌兰夫走近自己，说：“乌兰夫同志，我有个新发现，你来看看，内蒙古的版图像不像一匹奔腾的骏马？！”

乌兰夫仔细琢磨一番，也兴奋起来，拍了一下大腿说道：“像，太像了，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说着，两个人都笑了。

两年后的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定。到此，内蒙古实现了东蒙和西蒙地区的完整统一，这匹骏马义无反顾地大踏步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内蒙古草原上的第一炉铁水

1953年初，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周恩来问乌兰夫：“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苏联将援助我国一批重工业建设项目，你看内蒙古地区能搞些什么？”

乌兰夫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内蒙古可以搞钢铁和煤炭工业。包头地区的铁矿和煤矿蕴藏量非常丰富。”

当中央已决定建设包头钢铁厂，并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的正式文件一下达，他便召集全体党委常委，研究如何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重大政治任务，决定组成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包钢的建设工作。

不久，苏联专家、建筑工人、解放军战士，从全国各地开进了风沙弥漫的包钢建设工地，荒芜的大草原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

勘探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消息一经传开，一些反动贵族，封建上层人物便在牧民中散布流言蜚语，胡说什么“敖包山是神山，汉人挖走了山里的金丹，老佛爷会降灾草原的……”同时他们还秘密鼓动几个旗的反动上层人物同流窜在草原上的土匪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互相勾结，兴风作浪，闹得矿山勘探工作无法进行。

对此，乌兰夫立即派部队去将土匪消灭，对那些宗教上层人物和牧民们，他分别登门拜访，宣传党中央建设包头钢铁基地的决定精神，说明开采白云鄂博地下铁矿对国家和草原人民的好处。

在广大牧民从白云鄂博搬家那些天，举行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还有三十多个喇嘛念了九天经。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包钢施工进度表上的红箭头直线上升。但是，新的问题又发生了。有些省市却不能按时

交付定货设备和建筑材料,致使包钢建设停工待料,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周恩来就指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具体负责督促有关部门按时交付定货,保证包钢建设。邓小平对包钢建设也十分关切,他组织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冶金部、铁道部等单位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包钢的问题,并且亲临包头与内蒙古和包头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959年10月15日,举行庆祝包钢一号高炉投产大会时,乌兰夫邀请周恩来总理光临剪彩。出铁的时间到了。周恩来走到一号高炉脚下,轻轻地剪断了那条具有象征意义的丝带。第一炉铁水夹着喷溅的火花,从高炉中滚滚而出,顿时,全场鼓乐齐鸣,职工们伴着优美的歌声跳起欢乐的安代舞,如同一簇簇美丽的花蝶在草地上翻飞……

拯救三千孤儿

1959年,神州大地,陷入了天灾人祸的深渊中,鱼米之乡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几十个孤儿院里的孤儿,因为食品不足,大多数都患了病,生活陷入困境。这些孤儿院纷纷向康克清告急,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困难。康克清认为保证这些儿童能健康地成长是关系培养革命后代的大事,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示。

康克清建议从少数民族地区调一些奶粉,以解孤儿的燃眉之急。一句话提醒了周恩来,他立刻想起了乌兰夫。他说:“克清同志,请你直接找乌兰夫同志商量商量,看看他能否有办法从内蒙古调些奶粉过去,乌兰夫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

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乌兰夫。那时内蒙古牧业也遭受了特大灾害,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奶粉也很缺乏。乌兰夫说:“康大姐,这件事我回内蒙古后想想办法,不管怎样也得帮助这些孤儿渡过难关的。”

坐在一旁的吉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

乌兰夫大手一拍桌子,说:“此法甚妙!由于历史上牧区性病泛滥,造成了牧民缺儿少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乌兰夫迅即组成了以卫生厅长为组长的工作机构,从1960年到1961年,两年内先后接纳了从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送来的孤儿三千多名。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6岁,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正在患病。乌兰夫安排工作人员把年龄大一点、身体好一些的孤儿直接送到牧区去了。对年幼患病的孤儿,则在集宁和锡林浩特等地设立了育婴院,对他们进行治疗,这些病儿恢复健康以后,也都陆续送到牧区去了。

牧民们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地照料。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教他们走路、唱歌、跳舞、骑马、打猎,供他们读书识字,学蒙古语……这些孤儿在蒙古族牧民的哺育下,一个个都健康地成长着。

真情永不渝

乌兰夫在“文革”初期就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叛国集团的头目,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批判。

1970年,乌兰夫的二女儿其其格打听到父亲是在湖南“监护”着,便千里迢迢去长沙探望。华国锋得知此事,便直接打电话请示周总理怎么处理,周恩来答复说:“骨肉之情人皆有之嘛,可以让乌兰夫和二女儿见面,不过要绝对保守秘密。”

经周恩来的批准,华国锋安排乌兰夫同二女儿其其格在长沙的湘江宾馆一间客房里见面。其其格见到父亲,叫了一声:“爸爸——”便扑在父亲的怀里大声痛哭起来。好半天,其其格才抬起头,哽咽着向父亲倾诉在北京和内蒙古的亲属们惨遭迫害的情况。乌兰夫亲昵地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看爸爸的身体不是很好吗?你妈和小妹的身体也都很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在二女儿其其格走后,乌兰夫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三封信,全面地检讨了他这些年来工作中的过错,表示要坚决改正,请求党中央让他站出来工作。

1971年冬天,乌兰夫恢复了自由,从长沙回到北京。一天晚上,周恩来到家来看望乌兰夫。乌兰夫问:“总理,党中央对我的工作准备怎样安排?”周恩来说:“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休息,看看病,恢复健康,至于工作安排问题,党中央正在考虑。”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乌兰夫出席了党的“十大”。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在“人大”领导下,成立一个临时民族工作研究小组,负责全国的民族工作,并建议由乌兰夫担任组长。从此,乌兰夫开始站出来工作。

(责任编辑:刘家驹)

沈鸿：

从小业主到共和国部长

● 曹进堂

为抗日，历尽艰辛奔延安

1906年5月19日，沈鸿诞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一个经营竹器店的家庭里。他6岁丧父。1919年春，母亲托人把13岁的沈鸿送到上海“协太新”布店当学徒。由于他勤奋好学，且经常搞一些“防盗铃”、“机关锁”一类的发明创造，很得布店经理的赏识，三年满师后让他管帐。

1931年春，25岁的沈鸿与几位朋友合伙办起了名为“利用”的小五金厂，沈鸿任厂长兼工程师，主要研制“利用”牌弹子锁。在这期间，他还设计制造了一批小铣床、小磨床、磨汽缸机、制造金属模具的机器和专门制造汽车阀门的机器等，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抗日战争爆发，沈鸿便带领10台机床母机和7名青年工人，乘船西迁。后来辗转找到“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该办事处行政负责人钱之光热情接待了他，表示非常欢迎沈鸿等人到延安参加抗日，并指定赖祖烈与沈鸿商谈去延安的具体细节。

在那战火纷飞，又是国民党控制的年代里，要将10台机床母机运到延安，谈何容易？

沈鸿找到胡厥文。在上海时，沈鸿就与胡相识，深知他是一位开明的爱国人士，因此，料定他会帮这个忙。当胡老得知沈鸿欲投奔延安时，十分高兴，鼓励他说：“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我年纪大了，大动作（指迁移陕北）有困难。你年轻力壮，到那边为抗日出力大有可为。”

胡厥文通过资源委员会为他取得了去西安的“通行

证”。

有了“资委会”签发的“护身符”，沈鸿便把全部机器交给了“办事处”，神不知鬼不觉地，于1938年春节前夕到达西安。

从西安到延安，启程的日子选在农历大年初一。天尚未亮，五辆卡车载着十台“母机”，由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安东押车，悄悄地离开了西安。由于大雪纷飞，道路泥泞，在行进中不断地遇到麻烦，直到正月初五以后才到达延安。

为救国，艰苦奋斗造军火

沈鸿到达延安后，很快被任命为兵工一厂机械总工程师。

沈鸿过去没有做过生产军火的机器，为了抗日，他刻苦攻读有关武器制造原理的书籍，找山西、东北来的“老兵工”座谈，与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合作，精心设计，反复试制，终于很快掌握了制造军火设备的要领和技术，生产出了许多适用于制造山地游击战轻武器的机器。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更加严密，使得延安的军火、粮饷极为困乏。在这种非常情况下，中央军委指示军工局：自力更生，自己想办法制造军火，特别要尽快研制前线急需的无烟火药。于是，军工局局长李强召集有关科技人员进行研究。但当时谁都没有做过无烟火药。怎么办？就连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延安任化学厂总工程师的钱志道也为难了。最后还是从沈鸿由上海带到延安的一套《化学工业大全》和钱志道的一

本英文版《军用火药》中找到了制造方法。

沈、钱两位工程师都精通英语，所以研究起来得心应手。原来，无烟火药要有三酸——硫酸、硝酸、盐酸和乙醚才能制造。乙醚要有高纯度的酒精作原料，方能溶解棉花纤维，制成硝化棉火药，即无烟火药。而高纯度的酒精需要有精密的酒精塔才能蒸馏出来。于是，他们一面办酿酒厂，一面设计酒精塔。无疑，这设计、制造酒精塔的任务落到了沈鸿身上。对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沈鸿，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废寝忘食，精心设计，很快绘制了图纸。实际上，这酒精塔很像蒸包子的蒸笼，因当时没有电焊，只好一层层地擦起来用螺丝拧紧，每一层钢屉内装配有管道之类的零件，工艺要求非常严格。

要制造酒精塔，首先要解决原材料问题。由于延安没有钢板，便从延长石油厂运来报废的钢管加工。酒精塔制成后，运进一孔大石窟，高度不够，便搭起脚手架向上凿窟窿，擦到十几层，认为可以了，结果只蒸出了90度的酒精，不合格；再加两层钢屉，蒸出来的酒精也仅92度，还是不合格。“上天”无路了，只好“入地”。他们把钢屉全部卸下，向地下进军，挖好后又增加了6层。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150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蒸出了98度的合格酒精。

沈老在谈起这件事时动情地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最大莫过于制造酒精塔。从现在的条件看，似乎是小题大作，但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个个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随着战争的发展，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严密封锁进入边区的一切物资。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由新华印刷厂印刷和发行的，同时承担着边区所有文件、资料、书籍的印刷任务。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使印刷用的油墨一下子断了来路，对此，新华印刷厂十分焦急，便向军工局局长李强求援。李强告诉该厂厂长祝志澄：找沈鸿，他会有办法的。接着，《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也委托沈鸿帮助解决这一难题，无论如何要自己制造出油墨来。

当时延安的作风是：不管份内份外，不扯皮，不踢皮球，谁家有困难，有能力帮助的都尽心尽力想办法。沈鸿弄清事情的原委后，立即到印刷厂察看，回来后从《化学工业大全》中查阅碾油墨机的资料，然后动手设计。这种机器在沈鸿看来并不复杂，主要部件是三根钢辊，但延安不出钢。这近一米长、三十厘米粗的钢辊从何而来？有人说延长石油厂的废钻头可以利用。于是，他们运来废钻头，铁工班将其锻成毛坯，经过车床加工，精坯便出来了。但是，这么大的家伙，工厂没有淬火炉怎么淬火呢？铆工班长刘伟利用了一个废井坑，放进水；又在井坑旁的河滩上砌起烘炉，把三根钢辊塞进去加热，然后取出



抗日战争时期，沈鸿（中）与李强（右）等在延安

来抬到井坑淬火，再抬回工厂上磨床加工，装到机器上。这样，延安第一台碾油墨机诞生了。

抗日战争进入四十年代，日寇更加疯狂，急需后方提供迫击炮弹和手榴弹。而弹壳和机器都是生铁铸出来的，延安不出铁，过去的来源都断了，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炼铁。这一主张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于是，军工局成立了炼铁部，指定沈鸿和已调任农具厂的徐驰负责制造设备和炼铁技术工作。他们虽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教育，也没有实践经验，但他们昼夜苦干，终于设计出了“五脏俱全”的成套炼铁设备。

沈鸿等人在延安的大砭沟选择了一块方圆百十米的地坪，带着一群工人和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昼夜苦干，首先造出了鼓风机；河西晋绥边区及时送来阎锡山留下的一份厚礼——一台蒸汽机，经过修理后造出了蒸汽锅炉；又根据延安没有焦炭只能用木炭做燃料的实际情况，设计制造了相适应的小高炉，一昼夜可炼一吨多生铁。高炉虽小，但作用极大。一到晚上，烟囱像支大蜡烛，在夜空中喷出烟火，红光照耀，蔚为壮观，成了周围百姓和党政干部以及学生们前来观看的一大景观。当时参加建设小高炉工程的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冶金工业战线

上的骨干。

沈鸿从1938年初到达延安至1945年10月离开延安的8年中,与员工们为子弹厂、火药厂、迫击炮厂、游动机械厂等军工厂共设计制造出了各种成套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为石油、印刷、玻璃、肥皂等13家工厂提供了许多成套设备和重要部件,如为医疗卫生部门制成了大型消毒锅、手术刀及其它手术器械;为制药厂设计制造了压药片机等设备;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主持建造了一座反熔炉,利用从民间收集到的废铜熔炼黄铜;设计了小造币厂,造出了完全合格的银元;与钱志道合作,利用无烟火药生产线,略加改造,和新制成的钢币双滚压机,制成了一面光洁的麻制钞票纸。其它的还有印刷机、铸字机、肥皂皂化锅等等。

由于沈鸿事迹突出、贡献大,1942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军工局特等劳模,被授予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无限忠诚”奖状。毛泽东还在这年冬天特地约见了。

那天,他按约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微笑着与沈鸿亲切握手,并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彭真、高岗等人。

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鸿说:“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毛泽东还问沈鸿是从哪里学到制造机器的。沈鸿说:“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以后胡乱做一些机器,谈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大笑:“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

接着,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证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说罢从书桌上拿出一本《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油印小册子,亲手递给沈鸿。

毛泽东又笑着对沈鸿说:“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

当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沈鸿。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沈鸿随军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任龙烟铁矿代理经理、晋察冀军工局华北企业部工程师,继续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尽忠效力,并于1947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说到沈鸿入党,还有一段趣事呢。在延安有人问已是“特等劳模”的沈鸿: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他实实在在地说:“党内会议太多,我的时间不够。”当时他还和兵工厂化学总工程师钱志道针对政治活动过多、影响生产的问题,联名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建议改变这种局面,使生产回到正轨上来。不几天接到复信,信中表扬了他们反映情况及时,建议正确,已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1949年3月北平解放时,他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同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为事业,不惑之年才成家

“先立业,后成家”,是沈鸿年轻时所定的原则。

结婚时他已43岁了,妻子是抗战时期一直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吴平。

沈鸿与吴平的婚礼选在1949年9月30日这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选择。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共同奋斗了十几年,“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们的最大愿望。因此,他们的婚期与共和国同龄,意味着他们的命运与新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足见他们对新中国的企盼与热爱。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紧接着全体与会人员赴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由于沈鸿是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吴平是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所以都参加了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盛典。到奠基典礼结束时,已是华灯齐亮,繁星满天,沈鸿、吴平怀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匆匆向南长街“织女桥”的住地赶去。一进大门,只见新房灯光红亮,欢声笑语,两位“迟到的新人”一进房间,就被大伙儿围住了,竞相祝贺他们喜结连理!

婚礼很俭朴。新房是热心肠的杨之华大姐临时腾出来的,她自己则搬到二楼的过道上住;一切铺设是吴平的老同学、老战友曾宪植从蔡畅、邓颖超、帅孟奇等六七位老大姐们有限的津贴中筹出钱来购买的;新房也是侯一、张渊等同事们动手布置的,他俩只是“坐享其成”。

婚后的第一天便是开国大典,首都北京一片欢腾。在这个震撼世界的盛大节日里,沈鸿夫妇与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欢愉、幸福之中。也正是这一天,他俩厮守着度过了唯一的一天“蜜月”。第二天,沈鸿就被中央财委召去开会,商量组织“中央工业考察团”到东北、上海、太原等地考察工业的事儿,并被任命为考察团副团

长。

在婚后的前20年里，两人总是国内、国外的出差、调查、访问，分多聚少，特别在几次政治运动中，又双双受到冲击，但他们却是“棒打”不散。沈鸿有何苦衷，妻子吴平总是想方设法为其排解。1956年7月，沈鸿被任命为电机部副部长。而沈鸿却志不在“官”，他只想钻研技术工作。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心情，便以个人的名义给邓颖超大姐写了一封信，反映沈鸿的要求，谈沈鸿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拙于行政领导能力，副部长一职恐难胜任，恳请转告总理收回成命，等等。

不久，沈鸿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没料到周总理在会上点名了：“沈鸿，你好哇！不愿做官，让老婆写信求情！你说你只想当工程师，你们内行都不愿做领导，难道就只有让我们这些外行来搞？”

从此以后，他调任过几个工业部门，担任部分领导工作，再也没有提过任何条件。

1966年夏季，“动乱狂风”骤起，沈鸿被冠以“典型的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白专道路”第一个受到批判。在原一机部机关，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2000多张批判沈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搞得沈鸿晕头转向。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沈鸿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他生气，他惶惑，他想不通！

的确，沈鸿在延安时就有过“想不通”的事儿。

那是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党内的极“左”分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毫无根据地怀疑沈鸿从上海带到延安的几个徒弟是“特务”。由于沈鸿当时是延安的“无价之宝”，受到了兵工局局长李强秉承党中央的旨意给予了特别保护，才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他对徒弟们所受的不白之冤想不通。

不久，斗争的矛头集中到党组一、二把手身上，他们整天挨批，化装游行，其他时间是打扫卫生，清理厕所等，生产没人抓了。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及时指定沈鸿负责“抓生产”。于是，他既是批斗、陪同对象，又是抓生产的负责人。沈鸿“抓生产”可一点儿都不含糊。开别人的批斗会，叫他上台低头陪斗，他就走神儿去想工作，这叫“挨批、生产两不误”。原来几个人分管的工作，现在集中到沈鸿一个人身上，的确忙得不亦乐乎！有一段时间，他往往白天挨批，晚上工作，有时深夜还要向“半公开”的领导汇报生产情况。就这样，他为在“十年动乱”中的机械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沈鸿接受了妻子在危难时刻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同样，妻子吴平在“动乱”中被“造反派”关进“牛棚”时，他对妻子的信任也毫不动摇。专案组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找沈鸿，逼他写“揭发吴平的材料”。他火了：“我写的你们不信，你们想要的内容我又不知道。那么好吧，你们如果拿出确凿的实证来，我们离婚不就得了！我工作忙，对不

起！”硬是把那些“专案组”的人给顶了回去。

为建设，一心一意搞工业

从1956年开始，沈鸿先后任电机部、煤炭部、农机部、一机部副部长。曾多次随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考察、谈判。为了中国的工业建设，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中国。

由于沈鸿知识渊博，善于钻研，办事认真，所以他在各部门负责技术工作的领导岗位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取得满意的效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信任。所以，哪个工业部门最需要技术领导干部，总是“调沈鸿”。他从三机部调到电机部，又从电机部调到煤炭工业部，就是如此。毛泽东主席发出“以粮为纲”、“大搞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后，沈鸿又被调任农机部副部长，专门负责研究农业机械；60年代初，中央决定建造九套大型设备的国家重点工程后，沈鸿又被任命为一机部副部长，专管“九套工程”的设计和制造。由邓小平总书记签发的中办文件中明确规定，沈鸿“不管行政日常工作，尽量少参加行政性的会议”，以便让他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搞“九套”。这是中央对他的最大信任和支持。

1958年5月，沈鸿出席了中共八届二次代表会议，会上他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自己制造国家非常需要的万吨级水压机，以解决自锻大件问题。在信的最后一句用商量的口吻写了一句：“您看如何？”

毛泽东阅后作了重要批示，并作为会议的《参阅资料》发给与会代表。有些代表看后，将其视为“狂”。的确，在那“迷信”盛行的年代里，对主席使用“您看如何”，确实有点儿惊世骇俗。

在沈鸿坐镇上海江南造船厂潜心研制万吨水压机期间，刘少奇主席曾去视察。

陈云当时也在上海，他把沈鸿召到住地，亲切地问候。

1961年，原安装在三门峡水电站的15万千瓦的水轮机转子，因运输不便割成两半从苏联运来。当时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该国竟违背协议，不派专家来焊接和安装。怎么办？经水电部要求，周恩来总理把这一重任又交给了沈鸿。

沈鸿亲临现场指挥。经过十几昼夜奋战，一举焊接成功。10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三门峡水电站机房视察时，对沈鸿等人的出色工作表示满意。

1962年初，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沈鸿正率领一班人全力以赴研制九套大型机器设备。一天，原铁道部副部长郭洪涛突然登门拜访：“我找您是求援来了。火车车轮和车轴原由苏联进口，现在来源断绝，库存快漏底了。你说问题大不大？”

为了国家利益，沈鸿经征得有关领导同意，答应了冶金部共同建设车轮轮箍厂，自己研制火车轮子和轮箍。

终于在1963年11月生产出了合格的火车车轮和轮箍，保证了祖国大动脉的畅通。

为了总结和宣扬沈鸿对中国机械科技的宝贵经验和重大贡献，机械工业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30多万字的《沈鸿论机械科技》一书，陈云为该书题词：“理想、勤奋、认真”，对沈鸿的生平和工作成就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和评价。

为治国，孜孜不倦研究法律

沈鸿除了精读细研难以计算的国内外工业机械、科技等方面的业务书籍外，其他方面的书籍涉猎的也相当广泛。在哲学方面，他喜欢读恩格斯的两部传世之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还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他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也十分崇敬。在延安时，是这几篇经典著作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对革命的认识有了飞跃性的升华。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毛泽东是科学家，是非常合格的社会科学家。”在古文、诗词方面，最爱读的是《国语》、《史记》和唐诗、宋词；另外还喜欢看世界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走进他的书房，只见四周书柜“顶天立地”，要想看上几层的图书，必登梯方能取之。书房中间有一又长又宽的办公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报刊、书籍；书柜上挂着一摞他书写的字帖，如周恩来的“险夷不变应当胆，道义争担敢息肩”；杜甫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等等。书房的东南角是他的“半步车间”和“材料库”；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亲笔写的警句：“近路是没有的，努力学习，特别是哲学、法制，可少走些弯路。”

由于我是从事法制宣传工作的，对沈老所写的“法制”尤感兴趣，便好奇地问：“沈老，您是机械专家，怎么对法制那么感兴趣呢？”

他一乐，继而对我说：“你是法制‘专家’，那我问你：日本共有多少个法律？”



1975年8月沈鸿陪同陈云去东北视察途中

我一愣，如实回答：“很抱歉，我真的说不清楚。”

“我来告诉你：至八十年代后期，日本共有11822个法律；公民和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有186个，现在是200多个；律师必须掌握的有832个。”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英、美、德、法和前苏联等八个国家的法制情况。

哇！九十高龄的老人记性竟如此之好，我被惊呆了！

沈鸿从1978年到1988年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又是第五届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六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法律，对沈老来说的确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正如他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中所说：“我过去自信是守法户，但确不甚知法为何物，也不甚知法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人治、法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当他接触法这个问题时已到耄耋之年，从头学起谈何容易？但沈鸿就是沈鸿，他的最大特点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从不马虎，从不敷衍，从不服输。于是，他以顽强的毅力研读法律书籍。资产阶级法律的老祖宗《拿破仑法典》被他请上了书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法典也找来浏览，不懂的地方就查有关资料，向法律界的老前辈张友渔、陶希晋、钱端升等人请教。

沈老深有体会地对我说：“社会科学中最难学的是法学，因此，组织全国人民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确是当务之急！”正如1985年3月4日他给陈云的信中所说：“在我国，法律科学是短线中的短线，而且法律科学又是一项比之其他学科综合性更强、更不易学的科学。”“如何加强干部学习法律科学，是当前迫切的问题”。“必须有大量的有理论、有经验的人来进行立法、执法，才能由人治达到法治。”

沈鸿在学法过程中，始终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正

如他所说：“宋朝大文豪苏轼有句名言：‘有法不行，与无法同。’这就是说，学法必须用法，如果不用，等于白学。”1985年4月9日，他有针对性地撰写了《关于加强法制工作的几点建议》，建议“在高级干部中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加强各部委的法制机构建设；加速法学人才的培养”。为了印证他的建议的重要与可行，他潜心研究了日本、美国、法国、西德、英国、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等8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干部法学知识状况和法学人才的培养状况，列了11个表，与我国的法制情况对比分析，找出了差距，词诚语切地呼吁：“要实现法治，还得高级干部来带头学法、守法、执法。建议我们的部长们、省长们应该先补上这一课，再忙也应该补，要认识法律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性”等等，有些建议已被中央所采纳。

为了推动国家的法制工作不断地向前发展，增加宣传法制工作的“动力”，他先后给李鹏、陈云、江泽民、彭真、彭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有的放矢地提出了“干部学法是当务之急”、“应尽快完善法律制度”、“提高法制机构在组织上的地位”、“培养法学人才是法治国家的根本大计”、“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治观念”等建议，领导同志大都作了批示，有的还批转有关部门阅读和研究。

沈老说：“‘一民之规，莫如法’（韩非），我就是要为以法治国‘鼓’与‘呼’，所以我逢人就宣传法律。如果我国的法律机制很健全，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很强，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就不容易发生陈希同、王宝森这样的特大案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违法犯罪。‘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慎子），正是这个道理。因此，这个‘法’呀，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所以他的精力一直比较旺盛！直到目前，他每天的



沈鸿、吴平夫妇近照

学习、工作时间一般在九个小时左右。

为了国家利益，在学习、工作、劳动中不知疲倦，不计名利，“乐在其中”，这就是沈鸿。

（责任编辑：刘家驹）

文苑掌故新谭

丁聪执教女中耳熟心跳

1936年，丁聪和马国良在上海一起编《良友画报》，这是当年风行全国具有权威性的一本大型刊物，是年，丁聪又奉父命去晏摩氏女中教国画课。晏摩氏是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入学的女学生大抵是名门闺秀或富家千金。上第一堂课时，父亲丁悚亲自“押送”小丁去学校。他教的是初中三和高中选修课。进得课堂，一片莺声燕语，直把年甫20岁的小丁吓坏了，看着窗外父亲渐走渐远的身影，捺不住心惊胆颤、脸烧耳热。吴祖光说：“丁聪经过这样的考验，日后虽年事渐长，见到年龄相若的女性，依然讷讷说不出话来。”

程砚秋夜访知音

著名画家胡考常把曹雪芹的小说、李煜的词、朱敦的水墨画和程砚秋的京剧并称为“中华四绝”。他曾撰文道：“由于我经常要在朋友中间流露这种感情，自有那些好事的朋友，将我对程砚秋艺术爱好之情多次传到了程先生的耳朵里。记得1956年的一个晚上，突然由丁聪、白桦二兄陪程先生来到舍下作不速之客，并一起吃了一餐饭，程先生口口声声‘夜访知音’。这也可见程先生待人自有独到之处。按理说应由我这程门艺术爱好者去拜访他的，岂有他来下访的道理呢。惜乎我跟程先生还未及深交，次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朱继功辑）



朱德和他的女儿朱敏

王基高

朱敏的自述《我在纳粹集中营》公开发表后，这个中共革命先驱者的女儿，终于54年后，将深埋在心中多年的一段惨痛往事，原原本本地昭示于世人。一时，全国各地有20多家报刊陆续转载，其中《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转载4天。《红樱桃》上映后，不难发现，观众确实将电影中的“楚楚”和朱德女儿“对号入座”了！

但是，楚楚并不等于朱敏，朱敏也不是那个“楚楚”。“楚楚”留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耻辱标志，朱敏却留下了终身不能愈合的心灵创伤。

她14岁才识得父亲

朱德当年在黄土高坡的一个窑洞里，曾伤感地对一位美国记者叙述了他的家庭生活。“我在参加共产党的斗争以前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我第三个妻子，是1928年湘南起义时期跟我同居的，名叫吴玉兰。她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键捉住，砍了头，现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1929年同我结婚的。”

除了这四次婚姻生活外，朱德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失败婚姻，留下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儿——朱敏（小名菲菲）。朱敏出生在1926年春天的莫斯科，刚刚满月，父亲便奉中央命令，回国参加北伐战争，朱敏还未满周岁时，寄养在四川成都的外婆家。

朱敏一直未见过父亲。在记忆里，父亲是成都街头一幅两万大洋悬赏告示图。那还是外婆悄悄告诉她的。直到1940年10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红军留在白区的革命后代，一批孩子通过千难万阻，终于到

达了延安。

那天，朱德和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刚开完会回到杨家岭。远远地，朱敏就认出了父亲，他身穿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朱德也一眼认出了女儿，向她跑过来，一把抱住她，朱敏高兴地流出了眼泪……

毛泽东扔掉夹在手中的单刀牌香烟，几步上前一下子把朱敏抱了起来，仔细端详着这位活泼天真小女孩，高兴地说：天不怕、地不怕，我毛泽东就喜欢这样的乖娃。

朱德告诉朱敏，打败日本鬼子，

我们要建立新中国，那时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你现在还小，要学习文化。准备将她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那是专为收留共产党国家孩子而开办的国际学校。

1941年2月，千里冰封的北国，雪花飘飘。一架帮助中国抗战的苏联轰炸机到达延安。朱敏作为大姐姐，带着李敏（毛泽东女儿娇娇）、王一飞（王若飞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一行四人，踏上了去往苏联的旅程。

当时，朱敏15岁，而李敏4岁。毛泽东和朱德都去机场送行。

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里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孩子，他们父母大都是共产党领袖。

6月21日傍晚，孩子们抵达明斯克的一个集体农庄。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纳粹的飞机、大炮、坦克使温暖的南方变成血腥的战场。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孩子们落入德国鬼子手中。朱敏随机应变，坚称自己名叫“赤英”，是中国一个有钱大夫家的女儿，是来苏联治病的。她被关进了集中营。张闻天的儿子试图跑回莫斯科，途中被德国鬼子的飞机炸死，年仅12岁。

在集中营里，朱敏饱受折磨，整天做苦役，有时还要挨鞭打（但没有被德国纳粹纹身）。

囚徒们被押到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第一关是脱光衣服淋浴“消毒”，朱敏眼睁睁看见一个德国鬼子一阵乱翻拿走了她的手表和父亲送给她的派克钢笔，她不知哪来的胆量，在脱光衣服前，悄悄将内裤口袋中藏着的一枚列宁胸章含进嘴里，她不想再失去这个国际儿童院的纪念。这个能带来杀身之祸的举动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以后，这枚胸章成为她的希望，期盼有一天

能从这个地狱回到祖国，回到父亲的身边。这个纪念章一直保留到今天，事隔多年后，一位外国好友在给朱敏的信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您（朱敏）在那恐怖的年代，在团结孩子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您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以自己的威信、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孩子们同敌人作斗争。您还教给他们一些谋生的手艺，如纺织毛衣等，今天，我们仍然记得您热爱劳动的精神……”

在集中营里，饥饿、病魔、战争威胁着孩子们的生命。那些年里，朱敏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好的，鞭痕棍鞭，日积月累。残酷岁月的痕迹刻得太深，太痛，以致影响终身。

1945年5月，反攻的苏联红军进入了德国领土。朱敏和难友们才得以死里逃生……

1946年，朱敏从德国回到莫斯科，决定在莫斯科上学，开始她迟到的学习生涯。朱敏以坚强的毅力很快补习完中学的课程，被保送到莫斯科医学院学习。可朱敏却要求上师范。她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向国内的爹爹、妈妈谈了，二老很快回信表示完全理解，支持女儿的选择。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转眼，朱

敏师范学院毕业。

婚恋·家庭

1951年朱敏从莫斯科专科学校放暑假回到了父亲身边。和父亲分别，又是一个10年！朱敏真正长大了，身体也好多了。此时，朱敏结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外交随员刘铮。

1950年底，妈妈康克清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康妈妈在刘铮呈送文件时巧妙地对女儿的男朋友进行了考察，对这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表示了满意。从此，莫斯科红场留下了朱敏和刘铮的脚印；美丽的高尔基公园留下了他们相依叙谈的身影；路灯旁、台灯下成了他们探讨人生、追求真理、磋商问题的理想场所……

1952年春节前夕，朱敏和刘铮按照俄国人的方式，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婚礼。

1953年，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她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回到祖国，被分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俄语教师，开始时，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朱德便经常教育她



在莫斯科结婚时，刘铮、朱敏举杯向来宾致意



1962年，朱敏和朱德、康克清在北戴河

要学会独立生活，要和群众在一起，多次劝她住到学校职工宿舍去。她就在学校的12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住了4年，直到两个孩子都满地跑了，才搬进学校分配的房子里，有了一个像点样子的家。

他们再也没有挪过窝，一住就是40年。现在，这灰砖楼在北京地区已基本属于陈旧的“古董”楼了，除了空间距离高的优点外，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赞美的地方。一进门就是一个窄窄的过道，一边开着两个门，共4个房间。

一次，朱敏对父亲说：“爹爹，你年纪大了，你就我一个女儿，让我留在身边可以照顾你的生活，也可以尽尽女儿的孝心。”

父亲则充满慈爱地对朱敏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是祖国和人民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你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而不是回来做孝子贤孙，只要你好好工作，就是对爹爹最大的孝顺。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你去上班工作，孩子就放在我这里，我替你安排好，你不要惦记。以后不到星期天，

不要回家来，孩子有我们照顾，你应该放心。”末了，还反复叮嘱：“一定要好好工作。”俗话说：儿是父母的心头肉。有时，朱敏想儿子实在是不得了，就悄悄跑回家看看孩子，朱德知道后总要批评她不听话，不安心工作。

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无私无畏的父亲，女儿还能说什么呢？1953年，朱敏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想让父亲带她去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活动。以前她从莫斯科回国度假时，父亲曾带她去过天安门城楼，她以为这次父亲还能再带她去。哪知父亲没有同意，可她不死心，为了达到目的，她还哭出了眼泪。

父亲不仅没有心软，而且很生气，问她：“朱敏，你想过没有，其他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去天安门城楼吗？因为爹爹的关系，你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会怎样呢？只会增添你的特权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人一样要自食其力！”父亲这番话让朱敏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一

个新问题，一个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中央领导人的子女走上社会后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位置？是特殊阶层还是普通阶层？

直到父亲去世，朱敏一直也没有上过天安门城楼。

朱敏在莫斯科上学，常年的住读生活养成了“打铃吃饭”、“打铃上课”的习惯，生活中只有读书的概念，其他生活琐事、柴米油盐都与她无关，她不知道生活的内容还包括“花钱”，工资发下来，不知道该怎样花。结果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找父亲求援。

朱德见朱敏兜里只剩下几个硬币，不由地笑了起来：“怎么？老师同志，照你这个花法，不把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你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以后爹爹帮你制订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朱德真的给女儿搞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比如每月伙食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书本费多少，衣物费多少，杂支多少，零花多少等等，一项项十分仔细。朱敏以后就按照父亲这个开支计划用钱，再没有出现经济危机，逐渐养成了节省的习惯。

后来朱敏有了6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但她从来没有向父亲伸过手，就靠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将清贫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们个个都很结实，健康。

从父亲处继承了 一笔宝贵“财富”

“四清”运动是在农村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是针对农村的经济问题进行清工、清账、清财、清库，后来运动矛头逐步指向农村的基层干部，由单纯的经济“四清”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政治运动，范围也由农村扩大到全国城乡。

朱敏想报名去。那个年代的人活着就讲一种精神，一种现代人无

法理解或者嗤之以鼻的精神，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政治活动不能不参加。当时朱敏正在患高血压病。校方不同意她参加“四清”。

朱敏为了说服学校领导，就搬来父亲做“救兵”。一向支持女儿努力工作的朱德，马上表态同意女儿到农村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校领导终于点头放行。

朱敏来到农村，一件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悄然降至，她的眼睛一天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工作组的同志连夜将她送到县医院，但县医院无法确诊是什么病，估计是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这种病，他们县级医院无法医治。后来通过县政府接通了朱德的电话，朱德立即叫女儿返回北京，请北京的眼科专家治疗。

朱敏带着一只快失明的眼睛回到北京。由于视网膜出血时间长，已引起血肿，一时难以治愈，医生先用保守疗法治疗，希望保住这只眼睛。偏在这时，“文革”开始了，专家们全被打倒。朱敏失去了他们的精心治疗，眼睛随之失去了最后复明的希望。医生们只好痛惜地告诉朱德：你女儿的右眼只能进行摘除手术，否则另外一只眼睛也会受连累的。

等朱敏醒来，那只黝黑的眼睛永远从脸上消失了。

朱敏还不到40岁，就失去了一只眼睛，以后还要教学，还要工作，还要抚养孩子，一只眼怎能支撑走完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

朱德虽说内心也很难过，但在女儿病床前却乐观地用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事例让女儿明白：你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的，下农村你有了收获，思想有了进步，但眼睛坏了。这就是生活辩证法。“你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你了解了中国的农村。”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打倒“大军阀”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

在了朱德办公室、会客厅门前，迫于政治气候，昔日殷勤的警卫员突然变得冷淡起来，个别秘书进行政治投机，开始写起揭发朱德的材料。随即，作为一种政治生活待遇而配给朱德的机要秘书、保健大夫、卫士长全部被撤了下来，而只换上了两名服务员。

1976年7月2日，朱敏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她和丈夫刘铮急急忙忙地赶到医院。病房里康妈妈以及其他亲属都怀着焦虑的心情，守候在朱德的身边。望着昏迷不醒的父亲，朱敏抚摸着爹爹那双熟悉的大手，泪水不禁扑簌簌地流下来。

7月6日，在隔壁房间守候的朱敏，突然听到爹爹在大声地呼喊自己的名字，便急忙跑进了病房。这时，朱德瞪大眼睛望着女儿，拉住女儿的手，想最后再嘱咐几句，但张了几次嘴，却说不出话来。

下午3时零1分，共和国的第一颗帅星朱德，带着众多的惆怅和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妻子、女儿，紧随刚刚故去的周恩来同赴黄泉，走在毛泽东的前面，终年90岁。朱德，这位革命的老英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没有为女儿留下多少荣华富贵，但女儿朱敏却从爹爹那里继承到了一笔很大的财富。那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朱敏一生献身教育，为人师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朱敏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的春天，同时被晋升为教授。1986年12月，朱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年满60岁的她，早已和教育事业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她无法离开这项深爱的事业，她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建军思想，继承朱老总的遗愿，发挥自己教书育人专长，在众多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多方奔走和筹措，于1988年办起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现北京军地两用人才管理学

院），并亲自担任院长，继续用生命的光和热在教育战线上燃烧不熄的火炬。

这位帅门之后，虽不是行伍出身，但她和她父亲一样，热爱人民的军队，了解中国的士兵。她知道，中国军队的兵员成分，大多数和她的父亲一样，是农家子弟，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指导；她更知道自学成才的艰辛，因为她的五个儿子在部队都经历过自学成才的艰辛。所以，在理解父辈的基础上，朱敏更深刻地理解着新一代的中国军人。她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渴求什么。

几年风雨、几年探索，朱敏终于摸索出了一套社会办学、全民搞教育的宝贵经验。几年来，先后有3万多名学子从这里学成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向安于平淡生活的朱敏，迎来了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政府也利用这个纪念日，向当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以奖励那些在二战时期做出贡献的英雄们。中国有18人被授予纪念奖章，其中15枚是颁发给东北联军在苏联境内和苏联军队一道作战的中国战士。还有3枚，一枚授予当年国际儿童院女生队长李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她在苏联4年卫国战争时期，获得过“马克希姆机关枪手”的证书；另一个是中国在苏联的战地记者；再一个就是朱敏，表彰她在卫国战争时期不畏强暴，严守身世，顽强地在集中营活了下来，最终回到莫斯科的动人事迹。

这枚奖章和她当年含在舌头底下，躲过法西斯检查，带进集中营的列宁纪念章一起存放在她的书桌上，尽管这两枚纪念章相隔了50多年，但共同记载着她那段难忘的岁月……

（责任编辑：刘文）

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 温济泽



李维汉带病撰写回忆录

今年6月2日，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

李老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敬爱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夏，我由关中分区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我在这里当教员）调回延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部长是张闻天同志，副部长是李老。我在李老直接领导下，研究当时全国国民教育问题，参与了《我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的写作。

1941年夏，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任研究员，李老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这时同李老接触更多了。在整风学习中，李老带头学习文件，写学习笔记，参加讨论，带头谈心得体会和反省自己，为大家做出榜样，对全院同志有很大的影响。在整风开始阶段，由于王实味在全院煽动极端民主化的偏向，李老提出召开全院“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来进行纠偏。开头我们认为王实味是思想

问题，受到康生的批评，他认为是政治问题，以后又加码，说王实味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由于康生的插手，就把“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变成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到了最后阶段，康生是要把王实味置于死地的，李老和我们仍希望把王实味挽救过来。

李老受过康生的打击，李老对王实味的态度也为康生所不满。由于康生又进谗言，1942年9月，李老被调离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此后，我和李老就再没有什么联系。建国初期也很少接触。1958年我在中央广播事业局被错划为右派后，为不牵连别人，更少去找什么熟人。

“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听说1964年李老以所谓执行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免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李老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秦城监狱，关了好几年之后，在出狱之日连家人都未得见面，又被遣送到湖北咸宁软禁。直到1977年底，经胡耀邦同志批准，才回到北京，恢复自由。

我得知李老住在北京医院，已是1978年。这时我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到医院去看望李老。李老认出是我，颤抖着从沙发上站起，但腰直不起来，差不多弯到90度，眼窝深陷，瘦骨嶙峋，高大的身躯萎缩了，我心酸得几乎落泪。但见李老精神矍铄，仍是那么乐观，谈笑声还是那么洪亮。

这次见面以后，我就经常去看望他，直到他1984年8月11日心脏停止跳动，我亲眼看到82岁到88岁高龄的李老，在耄耋残年，以带病之身，是如何呕心沥血，争分夺秒，以超人的毅力为党工作的。

1984年春节，李老在病榻上吟成一首诗，有句云：“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在此纪念李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把这位老一代革命家在残年“惜晚晴”的一些事迹记述下来，作为我向李老献上的一瓣心香。

二

1978年初，李老回到北京不久，胡耀邦同志就托人捎口信，赞同李老写回忆录的想法。李老是我们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1922年与周恩来同志一起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以后被选为四届中委，五届中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届中委。他亲身经历过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写出的回忆录，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将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从有关部门调集了几十个同志兼职帮他完成写回忆录的工作。他按历史时期把他们分成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二战时期等五个组，每星期分别召集各组开一次会，先由他口述，作出记录；然后根据他所提的线索，搜集资料，查阅档案，调查采访，在1980年和1981年，他曾

三次带着协助人员到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搜集和查核资料；经过反复研究，各组写出初稿，再由他亲自审阅、修改和定稿。他风趣地说过，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就是要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就是要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

李老写回忆录，以写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而绝不突出自己，要求正确地处理个人同党、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同群众三者的关系。对所记述，坚持实事求是，做到真实第一，他说过，要做到人真、言真、情真、形象真，力求忠于历史的本来面目，而绝不能弄虚作假。对所写历史，要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应当引为鉴戒的经验。对联系自己，要有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李老认为，这样才能对后人有参考价值。

李老原计划写27个专题，从1978年到1984年7月完成了20个专题。这些专题主要是：《回忆新民学会》，《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回顾党的六大前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在中央苏区》，《回忆长征》，《初到陕北》，《回忆中央党校》，《回忆陕北公学》，《中央干部教育部和延安干部教育》，《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中央研究院研究和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等等，篇篇都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

1984年7月31日，李老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10天，写信给胡耀邦同志说：由于身体不行了，回忆录不能继续搞了。他还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7个专题未能写出来，这是他的一大遗憾，也是党的一大损失。李老亲自审改定稿的20篇回忆录，近70万字，到1986年5月，以《回忆与研究》为书名，分上、下两册，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杨尚昆同志说过：“李维汉同志作了很好的榜样。他的回忆录，有历

李维汉是一位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同志
值得大家怀念
陈云 一九八七年六月

史资料,有事实经过,既有经验教训,还有自我批评,写得很好。”习仲勋同志在为《回忆与研究》一书写的序中说:“这是作者在他耄耋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写成的一部力作,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为瞿秋白同志在“文革”中横遭诬陷和蒙受冤屈进行平反昭雪的一次会。

在这次会上,李老作了重要讲话。瞿秋白和李老都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和主持人,会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同志为常委。他们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急关头挑起这一历史重任的。到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遭受错误打击时,李老也同时受到打击。李老是我们党最深刻了解瞿秋白的人之一。他在座谈会上说,秋白是正派人,能平等待人,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能团结同志,能服从组织和遵守纪律。他说,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秋白是最有民主作风,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他还讲到,在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和他同受处分的那天晚上,他看到瞿秋白在马路边一个小摊子旁吃阳春面,他就凑过去,坐到瞿秋白身边,轻轻地问他准备怎么办,秋白回答说听从党的分配。李老在讲话中说,以后几年,秋白果然行如其言。

1983年,李老写成《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篇近五万字的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李老对从“八七会议”到1928年初这个时期的党史作了详尽的记述,对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

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作了具体的分析,对瞿秋白作了公正的评价,对自己也作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他对瞿秋白评价说:“他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是一个有声望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28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李老这篇长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3期上发表,以后又收入《回忆与研究》一书之中。

四

在我1978年第一次到医院看望李老的时候,李老谈到他准备写回忆录,同时告诉我,他已向党中央建议编一部革命烈士传,他推荐我来主持这部书的编辑工作。我对他说:“我现在工作很忙,我已62岁了,恐怕不能再负担这项工作。”李老马上严肃地对我说:“我82岁了,你比我小20岁,怎么在我面前倒说起老来了?”后来胡乔木同志也以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编革命烈士传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只好又把这副担子挑起。

李老对我说过,他把写革命回忆录和编革命烈士传作为晚年的两大心愿。他说,五星红旗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成的,我们一定要让子孙后代永记不忘。他又说,写烈士传,不能只写领袖人物,领袖,有全国的领袖,也有一个地区的领袖,还有一个部门、一场斗争中的领袖,通常把这些大大小小的领袖叫做上、中、下层干部,对其中的烈士都要写。也不能只写共产党的烈士,还要写爱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烈士;不能只

写干部,也要写一般党员和革命群众。

我们在1981年成立革命烈士传编辑组,不久扩大成立编委会,经与中央和各省市党史与民政部门研究,到1979年底,全国登记了有姓有名的烈士一百五十多万人,没有登记和没有留下姓名的远不止此数;我们准备从中选出在全国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1000人左右,由我们立传,按历史时期分编成10卷。同时建议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有条件的市、县党史部门,都按各自地区范围分别编印烈士传或英名录,使之成为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

李老很高兴地同意这个计划,他自己还亲自指导撰写个别的传记。烈士陈昌是李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以后同为新民学会会员,又是湖南省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家,1930年在长沙英勇牺牲。陈昌的传记就是在李老关心和指导下写成的。

《革命烈士传》第1卷在1985年出版,邓小平同志题词,陈云同志题写书名,李先念同志作《序》。全部10卷在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前夕出齐。江泽民同志为《革命烈士传》的全部出版题词:“学习先烈革命献身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可惜这时已在李老去世之后快7年了。

五

李老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不论在这之前或之后,李老都向党中央多次提过重要的建议,并做了不少受委托的工作。

1978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会议。李老看了会议文件以后,认为不仅要摘掉帽子,还要甄别平反,于是给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信。

这封信对于“右派分子”的彻底改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80年5月,李老找邓小平同志作了一次4小时的长谈。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很深,特别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李老也同我谈过这个问题,并说小平同志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以后我看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343页)的第四部分,吸取了李老的不少意见,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问题讲得非常中肯,切中时弊。我认为到今天我们仍然要不断学习并继续贯彻。

李老在党的“十二大”的书面发言中又讲到同样性质的问题,他说:“某些领导班子内一两个有权势的人,结合一些沾亲带故(各种故旧关系)的、气味相投的分子,安插在所属的部门或地方,进行损害党的利益以至争权夺利的活动,“像白蚁钻进栋梁一样,悄悄地使人不易察觉地啃坏党的肌体。”这些话对当前进行反贪污腐化的斗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3年,李老接受中央的委



1982年11月,李维汉在政协会上和邓小平亲切会见

托,主持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工作,与原陕北负责干部解决30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争论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和多次讨论,最后一次开会时,李老病重又住院,是在医院一间会议室开的。李老移步困难,直不起腰,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两个人搀扶着他来开会。他最后说,历史问题的解决,既要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主要是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不应

着重追究个人责任。他勉励大家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贡献余热。这个斗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妥善的解决。

为王实味错划托派分子问题平反,是李老在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来的。由于种种原因,到李老逝世时还未能解决。李老生前把这件事嘱托给我,我又经过再三努力,到1991年终于由公安部作出平反决定。李老晚年还处理了上百封人民来信,其中有为曾与我们党合作过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件,有查询党史问题和党史人物情况的信件,李老都认真地作了答复和处理。

李老晚年仍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不能尽述,也有许多是我不知道的。刘禹锡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叶帅诗句云:“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些也都可以作为对李老“残年有志惜晚晴”的写照。

(责任编辑:方实)



还看今朝



数风流人物

李丽芳 作

从文坛女将到总理秘书

● 刘小清

上海沦陷后的1939年的夏天，杨刚来到香港。

杨刚原名杨缤，1928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她在上海“左联”工作过，被称为“敢于冲破国民党文化禁区，显示出一种解放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女作家”。抗战爆发后，她奔赴武汉、南京、上海，从事抗战救亡的宣传工作。也正是这个时候，她接到了燕京大学同学、在香港《大公报》负责“文艺副刊”的萧乾的电报，说他将去英国，要她即刻来香港接替她负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

杨刚送走萧乾后，很快便进入角色。

当时的《大公报》主要还受国民党的影响。杨刚刚利用了老板为拉拢读者而给予的一点自由，坚持“文艺副刊”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团结进步作家，争取与尽可能多的读者共呼吸，为正义事业呐喊。

杨刚既是散文家又是诗人，来香港前她在上海出版了她的散文集《沸腾的梦》。这部作品凝结了作者刚强的民族意志和革命精神，反映了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的炽烈爱国热情。来香港后不久，她发表了著名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

我站在地球中央！
在我头上高飘起一柄旗子，
风在那里歇脚，雨在那里藏息。
太阳在旗子鲜明的红光上，
射上她的金箭，
白箭，
鲜明天上耀人眼睛的晶的箭羽。
那是生命的箭簇，
镶在我的心底！

我站在地球中央，
竖起了战斗的大纛，

我的旗子有鲜明的红光，
有春天的荣耀！
有白羽金箭的美！
我的旗子出自地球孕育永恒的娘胎，
它流着生命的血液，
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
为了这一柄血的旗帜，
我预备另一个五千年！
……

诗中蕴含着作者对民族命运深沉的思考，赞颂着中华民族“千年煮不熟，万年捶不烂”的顽强精神，揭示出中华民族“站在生命最后的防线上，奉着了地球新生的使命！”这是一首激昂高亢的歌，当它与广大读者见面后，引起的反响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为作者恢宏的气势所折服。

由于她的这首诗，当时文化人中的朋友，即赠给她一个美名——“金箭女神”。

二

一天，茅盾和鲁迅介绍杨刚与史沫特莱见面。茅盾对史沫特莱说：“杨刚女士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左联的青年女作家，精通英语，特来给您当助手和翻译。”史沫特莱看着“穿着朴素大方，一张圆脸露着热情的微笑，一双动人的眼睛闪烁着机智的光芒，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杨刚，不禁喜出望外。从此，她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不久，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香港，史沫特莱感到很吃惊。因为前段时间她还在云岭军部与叶挺、项英等人见面，对新四军坚持敌后艰苦环境中抗战的精神，由衷地感到敬佩。然而，时隔不久，即有如此巨变，她深感痛惜。随即，杨刚和史沫特莱商量，决定以《大公报》和美国记者名义，约请香港各报刊记者和“抗战文协”的作家，在皇后大道的一间咖啡馆举行座谈会。开会那天，出席的有乔冠华、金仲华、刘思慕、羊枣等香港文化界人士50多人。史沫特莱用英语发表演说，谴责蒋介石政府

扼杀抗战力量,使亲痛仇快。杨刚则在一旁作翻译。

会后,杨刚引荐羊枣、金仲华、乔冠华等与史沫特莱相识。

当时杨刚在香港文化人圈中有个绰号,叫“浩烈之徒”,据说这个美名是夏衍赠予的,出处于杨刚的性格刚毅,而且心里总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曾对这一段有过回忆,他说:“在那些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嫉恶如仇,浩气磅礴。有位年岁比她大一些的老同志,也许由于他本业是电影、戏剧之故吧,习惯于观察人的性格,给杨刚起了一个外号叫‘浩烈之徒’。朋友们都觉得起得好,似乎不生造这个形容词,就不足以表现杨刚的特点。”

三

杨刚是个女强人,是一个感情在燃烧的诗人、作家、记者,是一个几种职能都凝聚于一身的女革命家。她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呐喊,而奋斗。她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广大妇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憧憬着妇女彻底解放的未来,她同样也追求着爱情生活的幸福、完美。然而爱情之神却没有特别的垂青她。

少女时代的杨刚曾爱上了她革命的启蒙老师,一个经常戴着黑色宽边眼镜,举止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的林源。他是当年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过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又负责训练组织农民武装。那时,他与杨刚志同道合,感情相通。不幸的是,在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前夕,他被反动分子抓住,用麻袋装着丢到长江里淹死了。

当杨刚知道她日夜思念的亲人惨烈的牺牲经过后,她曾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呼唤着他,那是她最纯真的爱的寄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林源留给她的,只能是一段刻骨铭心般的记忆。

以后,杨刚在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的时候,结识了北大经济系学生郑佩。当时性格豪爽坦荡的她,对热烈而又真诚追求她的郑佩说:“你真的爱我吗?我有我的志向和追求,又有男人般豪放的性格,我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啊。”热恋中的郑佩信誓旦旦:“只要你接受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幸福,别的我不计较。”

在历经了一段坎坷后,他们终于结合了。以后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女儿小光迪。

但是,由于杨刚和郑佩在性格、气质以及信仰和追求上的差异,他们在感情上也产生了难以愈合的裂痕。

抗战爆发后,杨刚决定随大批进步文化人南下,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而在中央银行任职员的郑佩,则要随银行转移到福建永安。两人意见分歧,争执不下。



杨刚

无奈之中,杨刚含泪对丈夫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关于这一点,当初我不是就声明了吗?”

于是他们默默地各奔一方,分道扬镳。

来到香港后,杨刚关起感情的闸门,将她的全部精力倾注在钟爱的事业上。她默默地、勤奋地,甚至是发疯般地撰稿、采访、编稿。她在创作中寻找感情的寄托和依附。

有一天,杨刚到香港知名作家、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许地山家约稿。公事谈完后,许夫人把杨刚拉到身边说:“我的好妹子,你和那个不称心的男人分开好几年了,不应该再这样孤独地生活下去,你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许夫人的话对经历过挫折、在感情上日趋成熟的杨刚来说,反应是很谨慎的。当时,在她周围曾有一个男人热情地追求她,但她觉得他的情分太轻薄,他们只能是同志,不能成为情投意合的爱人。于是她婉拒了。

许夫人继续对她说:“你还年轻,三十刚出头,对待个人爱情生活应该乐观些,不能老是忧心忡忡。听说有一位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先生,不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亲密朋友吗?一个是有才华的女作家、女诗人;一个是学

识渊博的哲学家,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

杨刚苦笑了一下,她很感谢许夫人的率直。她知道许夫人提的博士先生是指获德国博士学位的乔冠华。当时她与乔冠华确实关系很亲密,而且彼此印象很好。乔冠华当时叫乔木,他精通德语,又通英语,国际知识渊博,谈吐不凡。特别是那双深沉的眼睛和雍容的姿态、潇洒的风度,都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乔冠华见杨刚性格豪爽,侃侃而谈,文思敏捷,倚马千言,对时局精辟的分析,特别是她同样精通英、德两语,以及在文学创作方面火一样炽热的感情,丰富而优美的想象力,令他叹服。他们都是地下党员,经常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共同的理想和情操,使他们在香港结为相互关心和尊重的亲密战友。这是一种革命的同志关系,杨刚以为保持这种关系很自然,也很温馨,否则就有可能失掉这份和谐。事实上,他们一直相处很好,而且关系很纯真。以后杨刚在重庆还成了龚澎女士与乔冠华的红娘。

虽然这次许夫人的一席话,使杨刚丰富的心灵受到某种触动,但她很快冷静了下来。她依然理智地关闭着感情的闸门,依然保持一份我行我素的矜持。她体会到,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境,人生照样是充实的、丰富的。

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

在这炮火连天,战争恐怖笼罩着港九的日子里,杨刚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线采访。当时日军已封锁港九交通线,实行通宵戒严,分区分段搜查,并限令在港文化人前往指定地点报道,否则一律逮捕或枪杀。一天,杨刚冒着危险,来到电话约定的中环云咸街头,与乔冠华会面。乔冠华对她说:“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停滞在港九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的安全十分关心。廖承志同志派我去九龙,把能找到的人都护送到香港。现在形势万分险恶,请你立即通知羊枣、郁风、金仲华、俞颂华、萨空了等人就地隐蔽,等候撤离香港的通知。”

杨刚领命而去,她沉着机智,逐一通知她所熟悉的人。于是,一个个文化人转入地下,等待组织上的安排。

这时候,香港《大公报》已停刊,整个香港秩序一片混乱。

一天,杨刚突然得知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爱泼斯坦正面临危险,日本宪兵点名要缉捕他。于是杨刚立刻与他取得了联系。由于他是美国人,目标比较大,很难隐藏。最后杨刚把他送到玛丽医院,并请她的朋友,在医院工作的吴在东大夫设法将他隐蔽起来。但当时医院只收伤员,不能作为避难场所。杨刚和吴在东随即决定给这位美国朋友制造一个“人工伤”,并编造了一段传奇

的经历。这样,爱泼斯坦得以幸免于难。

不久,香港形势日趋危急,日军倾力搜捕滞港知名人士。为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与乔冠华、连贯等一道,紧急安排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撤离香港。

这时,杨刚随同茅盾、邹韬奋、金仲华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在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从香港偷渡惠州,抵达东江游击区。

五

1944年6月,战时陪都重庆的九龙坡机场,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腾空而起,刺向蓝天。

由于杨刚出色的工作,深得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的赏识,她遂被派赴美国,任报社驻美特派记者。行前,周恩来对她殷勤嘱咐:“你此去任重道远,要充分利用《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做好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的统战工作,广泛结交朋友,宣传祖国抗战。”

杨刚将女儿托付同志带往延安,只身奔赴大洋彼岸。在美国,她与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斯诺以及史迪威将军等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并通过他们进行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她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就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专门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表明了一个中国记者的民族正义感和自尊心。

1948年9月,杨刚终于奉召回国。途经香港时,杨刚感觉到香港《大公报》同人面对日趋明朗的政局,表现出一种心灰意冷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于是她因势利导,促成了令世人瞩目的香港《大公报》起义。

杨刚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这一天。当人民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发出了惊天动地、山鸣谷应的声音时,杨刚正以上海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参加开国大典。

开国之初,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擅长外交的杨刚,被从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岗位上调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协助身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处理重大外交事务。

1955年,应周恩来的提名,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不幸的是,这年冬季,一场意外的车祸造成了她严重的脑震荡。两年后,身体尚未痊愈的她又被卷入了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杨刚为此心情沉重,精神抑郁,终致愤然弃世。

杨刚的猝然去世,令多少人为之震惊惋惜和顿足失声。周恩来闻讯后非常痛惜地说:“杨刚是难以多得的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干部,死得太令人痛惜了!”1984年,《杨刚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邓颖超为此题词:“《杨刚文集》的出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同志的最好纪念。”

(责任编辑:刘文)

周恩来要我经商

● 肖林

1941年3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要我到红岩村住地，说是周恩来同志约我来谈经济问题。

钱之光还告诉我，办事处的开支，一是靠国民党政府拨的军饷，二是靠友好人士的支援，特别是宋庆龄女士在国外募集的捐款和物资，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自己也想些办法，节省开支，你是在作生意，所以找你来商量这个问题。

晚饭后，周恩来来到钱之光的卧室，他说：现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为了渡过经济困难，边区正掀起大生产运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要搞点经济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经费来源，不能只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动手，开辟新路。

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这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一种模式。所以我把它叫做地下经济工作。

当时我在重庆民生公司物产部工作，我把物产部的经营状况和重庆当时的市场情况作了介绍，还谈了一些设想。最后我表示，服从党的决定，努力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最后，周恩来说：“现在就开始筹备，党内由钱之光同志负责领导，

党外由肖旭初同志（当时我在党内用这个名字）负责经营。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周围环境，防止发生意外，不可疏忽。”

经过几天筹备，1941年3月28日，我们的地下经济工作正式开始运作。以重庆为中心，在宜昌的三斗坪，四川的万县、江津，云南的昆明设立分支机构，做土纱、土布、五金、西药、食粮和植物油等业务，先叫恒源字号，后改为大生公司，在重庆还就地转手买卖，有时也做黄金、美钞的买卖。困难虽然不少，但赚的钱也不少。因而办事处对烈军属、民主人士、地下党的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开支都有了保障。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到了南京。周恩来指示

我们：地下经济工作继续进行。南京不宜搞经济工作，便在上海开办华益公司，并在青岛、重庆、徐州、蚌埠设立分支机构，经营纱布、百货、杂粮、食盐等业务，还和香港联和公司（1948年改为华润公司）合作，开展沪港之间的外汇业务。在解放战争处在困难时期，上海党领导的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接送民主人士等活动，都有了可靠的经济保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才告结束。九年中，地下经济工作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但从未出过差错，结束时还上交黄金十多万两。

（肖林，82岁，红军干部，原上海市财贸办主任，现任《上海商报》董事长）



肖林、钱之光、祝华

参加拟定“863”计划 的老科学家王大珩

● 马京生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老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上书党中央。事隔两天,邓小平即在报告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通过认真全面的分析论证,批准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今年恰逢“863”计划10周年,我和王老早已熟悉,自然要登门拜访。王老虽已耄耋之年,却眼明耳聪,对于一幕幕逝去的岁月,他仍记忆犹新:

1983年,美国宣布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其核心是运用现代激光技术,从空间摧毁地面发射的一切核武器及其核设施。如同六十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七十年代的航天飞机计划一样。他们试图以此带动科技和经济的全面发展,抢占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制高点。

紧步其后的是,欧洲各国提出联合实施以发展未来高技术为目标的“尤里卡计划”。

前苏联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高科技发展纲要。

日本也迅速作出反应,提出了“全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

中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密切注视着世界的发展。中国要有中国的对策。

北京中关村——中国的硅谷,

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迅速崛起。王大珩和电子学家陈芳允、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就住在这里。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王大珩是学部主任,陈芳允是副主任。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世界高科技发展的趋势,也讨论着我们的对策。

那是1986年的初春,国防科工委几次组织专家讨论会,陈芳允在会上发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王大珩当即赞同陈芳允的意见。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

会后,陈芳允实在不能耐着性子等下去了,他跑到王大珩家,对王大珩说:“咱们给党中央写封信吧?”王大珩点头同意。两位老先生商量,认为高技术的重大特点之一:是学科的横向渗透、纵向加深、合纵连横、综合交错。高技术的任一领域都是多种知识的融合,多种学科人才的共同合作,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学科综合体的新产物,必将使相关领域的适应性大大增强。

于是,王大珩和陈芳允又去找核物理学界泰斗王淦昌和自动控制、卫星姿态控制系统专家杨嘉墀,四位老先生认真讨论了一番,由王大珩拟出了建议信的初稿,大家郑

重推敲后,署上了各自的名字。

这是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科学家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高技术研究的实效要花气力和时间;提高技术不仅可以集中现有的科研实力出成果,而且可以培养新一代高技术人才。

邓小平认真阅读建议书后,当即做出了重要批示。

3月8日,国务院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落实邓小平的指示,决定由宋健和丁衡高负责论证我国高技术计划的具体事宜。

由于四位老科学家上书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对这一建议的批复都是发生在1986年3月,所以把这一将要诞生的高技术计划定名为“863”计划。

王大珩祖籍江苏吴县,1915年2月26日出生。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常跟随父亲去观察天文和气象。那时作为人类眼睛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936年,王大珩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1942年,他选择了英国昌司公司,这是一家世界有名的光学

玻璃制造公司。王大珩以自身的学识进入了光学玻璃制造技术的研究领域。

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是保密的。他和另一同事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并获得专利。在精密测量光学折射率仪器方面，他发展了V棱镜折光仪，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

王大珩在英国的10年，他走上了一条全面掌握光学玻璃研究、设计、制造技术的务实之路。令英国同事肃然起敬，他们挽留王大珩在英国留下来工作。而王大珩却“轻装”回到祖国。

当王大珩从英国回到了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国昌司公司的电报追到上海，以高薪聘请他重返公司任职。此时，他的老师、科学家吴有训受共产党的委托，邀他北上，他欣然答应，来到了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1950年，王大珩35岁，与小儿

科大夫顾又芬结婚，他有了一个全力支持他的贤内助。

1952年王大珩出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可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光学玻璃仪器，于是，他把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工作的龚祖同调到长春来，两位光学专家共同努力，很快便研制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并使用在国防工业上。

1961年，当国际上出现激光仅一年的时间内，王大珩又支持手下的科研人员攻关，研制出在结构形式上独具特色的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我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巩固国防，中国需要铸造自己的核盾牌。

为研制试验原子弹，急需爆炸试验的测试工作跟上去，但这项测试工作如何进行，取得哪些数据才有价值，以及如何分析和判断其使用价值等等，大家都心中无数。

王大珩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机和测

量光冲量的途径，以获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提交出了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国开始研制中程导弹以后，上级要求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提供测量空间飞行体的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大型观测设备。这是一种集光学、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

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有这样东西，但出于技术保密的原因，是买不来的。

王大珩作为这项任务的总设计师，提出了总体方案，他主张从预研到拿出成品，科研单位应一杆子插到底。

在各方面的配合下，该仪器做到了一次研制成功，为我国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提供有鉴定性价值的数



1992年，王大珩(中)在华盛顿空间中心



王大珩(左2)在俄罗斯科学院访问

据,并为以后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及卫星飞行试验提供了宝贵的测量数据和影像资料。这种仪器的提供使用,从此成为我国导弹发射试验使用国产大型精密仪器的开端。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进入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年代。卫星使中国开拓天疆的步伐大大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更高。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的相机,同其他类型的光学设备不同,它与卫星本体密不可分,是整个卫星的主体部分,要和星体一起遨游在茫茫的太空,才能拍摄到地球清晰的图像。这种相机既要能经得起发射卫星时的剧烈震荡,还能调整,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他同事们的肩上。

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王大珩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设计出的两种相机同时问世,同时伴着卫星飞上太空。当卫星返回

时,相机带回了地球的全貌。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要发射远程的洲际运载火箭,就要实施发射全过程的测量。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只在本土上建立测试网点是远远不能满足远程火箭的全程测量的,唯一的办法是靠远洋测量船进入太平洋,才能形成全球性测量。

远洋船航行在海上,船体在风浪中的强烈摇摆、升沉,而光学设备必须要有一套稳定装置,像放在陆地上一样平稳,才能准确测量出精确的数据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就是靠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任务。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他和远洋船的总设

计师商量:“你不把船的烟筒挪到船尾上,我这经纬仪就无法工作。”由于他的坚持,烟筒挪到了船尾,光学仪器放到了船的中心,有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他们又在稳定快速跟踪、提高仪器的测量精度等方面做了大胆的探索,创造性地完成了电影经纬仪实现海上测量的课题。以后,在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试验中,在跟踪测量同步卫星的轨道上,我国研制的大型光电经纬仪表现出的优异性能,完全可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比美。

由于王大珩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作出的贡献,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王大珩是全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和组织领导者,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为国际宇航院院士,还是全国政协委员……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王老最感兴趣的是谈他的学生。是他指导了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还有王乃弘,五十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和微光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作出巨大贡献;王之江是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邓锡铭研究激光核聚变取得了突出成绩;江文汉在我国开拓了自适应光学……王老脸上绽开了自豪的微笑。

我强烈地感到,王老的科学生命在他的学生身上延续、光大,他身后已成长起一支朝气蓬勃的光学工程队伍。他不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汇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而且还把自己的才智融合在学生们的科研成果中。他期待的是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

(责任编辑:刘家驹)

美国总统奖获得者 中国青年科学家邓兴旺

● 陈 浜

美国总统奖获得者

1995年8月28日,美国白宫宣布,30名青年学者荣获克林顿总统颁发的“1995年总统教授专家奖”。我国青年科学家邓兴旺是获奖人之一。这是一项地位很高的美国国家奖,对青年理工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荣誉之外,它带给获奖者的还有连续5年每年能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0万美元研究拨款的权利。美国政府想通过这一奖励,促进其为21世纪培养最优秀的科技人才的实现。

1995年,全美几百所高校举荐了上千名候选人。选拔中的竞争,激烈可知。除邓兴旺之外,30名获奖人中还有3位中国大陆来美的年轻学者。他们是:毕业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李静,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司捷,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胜。30个名额中华人占了4个,两男两女,理工各二,大约是1/8的比率。这一事实显示出中国青年在美国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也说明我们民族的人才潜力深厚无比。

两项突破性的成果

邓兴旺去年10月刚满33岁,结实矮壮,外表同名字一样平凡。1962年他出生在湘西山区的沅陵县。1985年来美。三年前应聘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任生物系助理教授,建立并主持一个有十六七人、在该校也属大型的实验室。因为他是同行和同辈中成绩卓著的佼佼者,去年年中晋升为副教授,比一般规定的六年提前了一年半。这是学校的破格行事。

来美后的10年间,邓兴旺在基因研究方面获得了

学术界公认的两项突破性成果。

第一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是他和他的实验室发现了尼芥兰草(*Arabidopsis*)调控光性状发育的COP类基因群,并领先他人两年,分离和测定了基因单体,从而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取得了植物光性状发育调控机制研究方面的突破。

第二项,是他对植物叶绿体基因表达(意即基因按自身信息合成相应蛋白分子)调控(意即外部对这一合成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推翻了流行二十多年的错误看法,改写了美国大学教科书的有关论述。

这两项进展,尤其是第一项,引起了美国及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兴趣,因为它们涉及了植物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光是植物生存的能源,也是人类核能之外的主要能量来源。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光合作用的研究已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但是,不要忘记,光还是植物的最敏感的外界信息,植物的成长发育处处受光调控。例如,向日葵随太阳转动花盘;房间里的花草向窗户曲伸;不见太阳的韭菜日久变成黄色,如此等等。生活中比比皆是的这些现象,显示出植物会随着光而改变自己与光有关的特性和形状,即光性状。这种光对植物性状发育的调控作用,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深思。他们开始探索,找到了植物接受光信息的若干“接收器”,靠它,植物能侦知光的存在。但是,从植物接到光信息,到相应调整了性状发育之间,其体内是什么样的机制(意即经过什么实体和遵照什么规律)在运作,这一点也不为科学家所知,还是一大片空白。两个“已知”之间,横着一根长长的“未知之谜”的链条。

近20年来,空前多的科学家迸发出变这个“未知”为“已知”的热情。邓兴旺也参加了这个行列,并且捷足

先登,夺了头功,他的突破产生了“滚雪球”的效应。当着“未知”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和一切可能存在的链条都清楚之后,人们就可能像了解电流在导线上运动那样,洞察光信息在植物体内的转换和传导过程。那时,人们就会比现在十倍、百倍自如地控制某种植物,例如农作物的发育和生长。这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情景,当然,这还不是咫尺之内就能实现的事,但邓兴旺他们的努力和成果,已引得科学家们浮想联翩。

向成见挑战的博士生

1985年,不满23岁的北大生物系硕士邓兴旺,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半年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随后,获得学校的优秀生奖学金,留校攻读博士学位,专攻对叶绿体基因表达的调控研究。

选择这个研究课题,表现了邓兴旺学术上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向成见挑战的勇气。当时,对叶绿体基因表达的调控问题,早有了一种公认的说法。学术界认为,叶绿体基因同单细胞生物如细菌的基因几乎一样,调控其基因表达的机制也就同细菌的相似,并把这一认识写进了教科书。邓兴旺开始就是学习的这一定论。

但是,他后来对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细菌是一个独立的细胞,而叶绿体不是。叶绿体只是细胞里面的细胞质的一部分。本质有别,从逻辑上讲,当然也就不能把适用于细菌基因的认识搬到叶绿体基因上来了。而且,这一定论并没有直接用叶绿体实验证实,还属于“由此及彼”推断而得的性质。追求真理的执拗愿望,使邓兴旺无论如何也要探索究竟。

邓兴旺夜以继日地埋头学业,他设计了一套思路新颖的测试系统,选择菠菜叶绿体为样品,用光调控。果然,叶绿体基因不像细菌基因那样走极端,对光或受影响或不受影响,只是在其“指挥”合成相应蛋白分子的全过程中,才能接受光的调控,使合成结果出现不等的变化。这新的结论于1987年经《生化》杂志和《细胞》杂志发表出来,立刻在学术界形成冲击,一方赞誉,一方反对。而邓兴旺不受影响,继续他的试验。

伯克利分校是美国的一流学府。在这里念博士生,一般要求用6年时间,写出两篇学术论文。邓兴旺却用了不到4年时间便围绕课题,在导师指导下撰写了6篇研究论文,远远超出学校要求,而且发表在《细胞》、《植物细胞》、《欧洲分子生物学会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志》等权威刊物上。他从各方面证实了自己的结论具有普遍性,而非偶然,使学术界终于信服了他的新观点,改写了教科书中的旧看法,他也因此“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生命科学的大厦中,邓兴旺的这一成果或许只不过是添了一砖片瓦,分寸之进。但邓兴旺的勇气和能力



邓兴旺和他的孩子

却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正值他申请美国生命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后奖学金,导师和教授们纷纷选用最好的词汇推荐这个为人憨厚的中国学生。由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和权威组成的评奖委员会,从五百多申请人中选出10人领奖。其中植物学科中惟一的获奖者就是邓兴旺。科学泰斗们的垂青使他倍感荣幸和鼓舞。

生命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标志着邓兴旺独立自主从事科学研究的开始。因此十几万美元的奖学金,使他在开支生活费外,还有能力购买实验设备和材料,甚至“雇用”临时帮工。他不必仰仗资深学者帮他筹募经费而受人制约了。他有条件独立选定和设计研究题目,而且可以不受工作地区和工作单位的限制,使研究工作保持延续性,作长期计划。

后来居上的先锋

邓兴旺带着这笔奖学金,应聘走进一家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

这是美国农业部与伯克利分校合办、由邓兴旺的博士生导师主持的一家研究所。到职后,邓兴旺提出以尼芥兰草为样品,研究光信息在植物体内的转换和传导机制的课题。

器重他的教授好心劝他不要去冒这个风险,因为美

国有一家大型试验室已经走在这一研究的前面了。他们早已找到了尼芥兰草光性状调控的一种基因,并正在千方百计把它在细胞基因链上定位和分离出来。可以说他们这些研究都快接近终点了,而邓兴旺此时还站在起跑线外,没有起步,显然不可能赶上他们。但是,邓兴旺另有考虑。他想,如能发现不同于这家试验室的新的光性状调控基因,那么即使晚些,也能成功。何况他还可以找捷径超过他们。这位教授了解了他的周密安排之后,尊重他用生命科学基金会的那笔奖学金,独自开始他的研究。这时已近1990年了。

第一步是培育出尼芥兰草光性状异常的突变植株,由此追溯基因。邓兴旺不知失败了多少次,突变株总是早早死掉,大半年时间过去了,邓兴旺忧心如焚。这道门坎迈不过去,他将全盘皆空。他感到自己似乎在面对一次真正的失败。

焦急中,他决定把突变株的选育扩大到前一代亲本。工作量十几倍地增加,不得不“雇”了一批大学生来帮忙。让他们选出一二万粒用化学方法做了变异处理的种子,一粒粒地种,一株株地收。然后又一粒粒地选种,一粒粒地再种,真是“精雕细刻”。邓兴旺犹如育种站里的技师,在实验室里仔细观察植株成长的情况,埋头搜寻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尼芥兰草的光性状突变植株终于培育成功了。他高兴得赶快将突变植株拍照存档,并写出文章发表。

邓兴旺培育的突变株与那家试验室培育的不同。这种突变株对光信息似乎没有反应,在没有光照的黑暗中生长了4天,依然发育得主杆粗壮,子叶舒展,和用来对比的尼芥兰草正常植株的细杆、小叶、色白等特点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引起它体内发生突变的是另一个不同于那家试验室发现的新的光性状调控基因。邓兴旺悬着的心放下了。他知道,他的试验不是徒劳无功的,而是打开了光信息在植物体内通行的另一道关口,他希望能赶在那家试验室前面证明这一点。

下一步的计划是把这个基因分离出来的试验。

细胞的基因链上有十几万、几十万个基因,分离谈何容易。先要确定它的位置,定位的难度可以用长城做比喻。长城上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垛口,只知道其中一个藏有密信,但是怎么才能找到呢?邓兴旺不得不在这个难点上费尽心思。

美国有一家高科技公司,专门标志基因,他们用特殊的方法逐个给基因加标志,同时也就使该基因发生突变,失去活力。但是他们顾不上去研究加了标志的基因,究竟是什么基因。这项工作如同公园护林人在给每棵树挂号码牌时,却管不了它是什么树一样。可是邓兴旺想,这家公司已标志过的为数不多的基因中,会不会有自己寻找的基因呢?

其实,前面提到的那家实验室,早从这家公司的标志基因中找过他们想要的那个基因了,但一无所获。邓兴旺自然也不敢多抱希望,但他还是下决心再找找试试看。他想,同一本质产生的现象也会有差距的,如同一种病,由于轻重不等症状也不同一样,同一个基因的变异,也会因程度不等而使突变株表现各异。根据现象与本质关系的这种哲理思考,他没有从该公司标志的基因中,寻找与自己需要的突变株一模一样的尼芥兰草突变株,而是挑选了所有似乎相去甚远但却有一定关联的突变株,再回到实验室进行试验。

邓兴旺的心又悬到了胸口上,他生怕也是一无所获。等待结果的那几天真是难熬,邓兴旺急不可耐,几乎每天都要打开设备门观察动静。到了第三天,当他打开设备门观察时,发现这家公司标志的一个突变株,同他培育的突变株是同一个基因发生变异的结果,只是变异程度深浅有别而已。邓兴旺激动不已,半夜回到家,高兴地告诉妻子魏宁说:“成功了!”他说,他要的基因就在标志基因之中,只要把它定位和分离成单体就好办了。邓兴旺没想到自己真的后来居上,虽还未到达终点,但已跑到了那家大实验室的前面,即将领先开启通往光性状发育调控机制的大门了。

这时是1991年上半年,有8家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欢迎他去教学和继续研究。年底,博士后期满,他选择了耶鲁大学,开始了自己担任导师和学术带头人的崭新的学术生涯。

不过两年半时间,他完成了质的飞跃。

不及“而立之年”的学术带头人

1992年,邓兴旺就任耶鲁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时,刚过29岁,不及“而立之年”。他领导的实验室由三方合作,即耶鲁大学一方负责提供实验室,近半座楼层里装满了仪器设备;美国卫生研究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一方,负责拨给研究经费;邓兴旺一方,负责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聘用了十几名专职研究人员,另有两名工作人员包揽了实验室全部行政事务。在专职研究人员中,有六七位博士后,有来自德国和日本的。他们几乎都带着自己的研究奖金和课题,参加了实验室的工作。其余的有五六位博士生和几名大学生。这是一个人才荟萃的集体。同两年半以前邓兴旺自己单枪匹马上阵时相比,实力真是大大加强了。

实验成果出得很快。1992年,第一个尼芥兰草的光性状调控基因,由邓兴旺他们单体分离培养出来了,命名为COP₁。它的分子结构、作用和精确位置也得到了完整的测定。邓兴旺比那家实验室早一步跨过了终点。

COP₁调控尼芥兰草光性状的发育,而自己则又受

光信息的控制。当光接收器收到了外界光信息后, COP₁ 便活力受阻, 尼芥兰草的光性状得以发育。反之, 没有外界光的信息, COP₁ 便活力非凡, 光性状便发育不成。简单一句话, 光管它, 它管性状。在肉眼看不见的分子世界里, 也存在着“一物降一物”的现象。所谓的突变植株, 不过是因为草内的 COP₁ 先“变质”了, 失去了活力, 结果, 性状发育失控, 在黑暗中也长出了光性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植物的光性状调控基因单体, 也是在回答接连光信息和尼芥兰草性状发育机理的问题上, 邓兴旺做出的突破性的贡献。

有关这一发现的几篇论文, 在 1991 年和 1992 年的《细胞》、《基因及发育》杂志上发表后, 美国学术界广为震惊。最权威的自然科学综合刊物《科学》和《自然》异乎寻常地同时载文, 予以很高的评价。《自然》专文写道: “第一个这类(调控植物光性状发育的)基因, 现在由邓兴旺先生及其同事们从尼芥兰草中单体培育出来了。这就是 COP₁……顺此前进, 继续发现和分离 COP₁ 这类重要的发育基因, 弄清楚其间因果, 就一定能回答许多深奥的动植物发育问题。”

由于这一突破, 其后的研究进展势如破竹。1992 年至 1995 年, 发表在《细胞》和《植物细胞》等六七个学科杂志上的 14 篇重要论文, 记载了他们前进的步伐。紧接 COP₁, 他们又陆续发现了 COP₈、COP₉、COP₁₀、COP₁₁ 等十几个同类基因单体。同年, 那家原本领先的大实验室, 也分离培育出他们找到的 DET₁ 基因单体。消息与 COP₉ 基因单体同日发表, 但他们比邓兴旺的第一个 COP₁ 基因整整晚了两年。

这里要专门一提的是邓兴旺的妻子魏宁。她也是实验室里有自己研究基金的博士后, 北大毕业后随丈夫来美, 也在伯克利分校完成了博士学位。他们二人志同道合, 一起做光性状发育调控的研究。她对 COP 类基因群的发现, 尤其对 COP₉ 的探索, 有许多独立的成果。她是妻子、母亲、主妇, 也是位青年有为的女科学家。

教学方面, 邓兴旺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他参加了生物专业改革的改革和现代化工作。他和几位同事一道, 把植物学的最新成果融入了本科生遗传学、细胞分子生物学主要专业课内, 独自编写和讲授新的细胞分子生物学课程。学习这门课的学生, 90% 独立地完成了为期一年的自选研究。对研究生, 他编写和讲授了《植物遗传和发育》这门专业课, 迄今 4 年, 修课人数年年增加, 还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本科学生。在他实验室工作和学习的人, 有的将在毕业后留耶鲁大学执教, 有的将继续攻读博士后, 有的仍留实验室深造。

邓兴旺还是担任世界著名的基因结构发源地——长岛冷泉港试验室高级研讨组的三主持人之一。他负责选定部分题目, 主持相关讨论和实验。这个每周一期、有

16 人参加的研讨组成员, 是从全美对尼芥兰草分子遗传学有研究兴趣的研究者中遴选出来的。美国学术界用这个办法吸引人才, 同时也把最新科学成果迅速推广开去。

心系故土

邓兴旺在美国的独家住宅, 位于康涅狄克州纽海文市市郊的一座小山上, 离耶鲁大学不远。这里环境幽静, 从宽阔的阳台上远眺四周景色宜人。邓兴旺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生活在这里非常幸福。但邓兴旺忘不了故土, 忘不了与自己共命运同呼吸的父老同胞。同许多中国青年人一样, 当他们一踏上异国的土地, 一股强烈的热爱祖国的情感就不由地涌上心头, 而且随着离开家乡的时间越久, 这种眷恋之情就更加浓厚。

邓兴旺常说, 他在美国的学术研究能很快地脱颖而出, 这异域的条件和自己的拼搏固然是关键, 但基础则是早在国内打下的。所以获得克林顿总统奖, 不单是对他个人工作成就的表扬, 而且也是对中国的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肯定。因为,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没有在国内打下的知识基础, 也没有攀登科学高峰的能力。

十年在外, 千万种感受使他体会到, 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同祖国的独立富强是不可分的。作为一名华人, 在美国的学术界要取得很高的成就, 并得到他们的公认, 要比美国公民付出多上几倍的努力。要改变这种状况, 只有祖国的昌盛富强才能扭转。因此, 他身在海外, 不忘神州, 念念于国内的发展。

乡恩难忘! 邓兴旺的老家——邓家岭, 全村只有 5 户人家, 不过是湘西武陵山脉中针尖大的一个小点。但正是这方贫瘠的土地, 滋润了他的成长。回忆儿时, 邓兴旺同伙伴们要走出十几里山路, 才能偶然看见路过的汽车。现在邓家岭虽然比那时强多了, 家家都有了电灯, 但比之山外还差远了。两年前, 邓兴旺曾回过家乡一次。犹如天壤之别的反差, 震撼了他的心。他发誓滋根报恩, 改变家乡贫困的面貌。

师恩难忘! 每当邓兴旺想起他小学、中学、大学时代的老师, 尤其是几位从省城长沙下放到北溶镇的中学老师时, 都是激动不已。没有他们的栽培, 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念中学时的邓兴旺, 并没有远大抱负, 当时, 他只想毕业后能在小镇上找一份工作就不错了。1977 年恢复高考时, 中学的几位老师(有的当时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使出全身的气力不分日夜地辅导学生学习, 把深造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就这样, 1978 年, 邓兴旺和班上另两位同学一起考上了大学, 邓兴旺考进了北大生物系。从此, 这个爬惯了武陵山山道的农家少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如果当时没有这几位园丁对他的帮助

教诲,邓兴旺是不可能迈出这一步的。

亲恩难忘!邓兴旺的父母只上过小学,文化并不高,但他们仍然陆续把他和四个弟妹送去念书。而自己,终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地上耕耘,用汗水维持儿女的学业负担,直到把邓兴旺送上大学。在邓兴旺和他的妻子全力投入攻克 COP 类基因的紧张时刻,魏宁的父母又放下自己的家业,专程到美国帮助女婿、女儿,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这一切,使他深切感受到赖有亲人们的自我牺牲,才成全了他们事业上的成就。这一份深重的亲情,永远使邓兴旺魂牵梦绕。

乡恩、亲情,这一缕缕源自祖国的恩情,把邓兴旺的心牢牢系在神州故土上。所以,当邓兴旺在事业上刚刚有点成就时,他就想把取得的学术成果用到帮助国内生物工程科学的发展上。他曾经回国讲学,派研究生回国传授新技术。他还和一家试验室进行研究合作。但这些还只是他报效祖国的开始。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回国讲学的机会和同他合作的实验室。他还希望能参加国内科研学术成果评估,以便能更广泛地交流生



邓兴旺一家

物工程科学研究前沿课题方面的信息,把他的学术成果用来报效祖国。

(责任编辑:方俊)

艺苑掌故新谭

齐白石的画芭蕉卷叶

一九五〇年春节前,老舍先生选了四句苏曼殊的诗,请白石老人作画。内中一句是:「芭蕉叶卷抱秋花」。老人因为不熟悉芭蕉叶卷的情形,时当严冬,又无实物可作参考,逢人便问芭蕉的卷叶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的?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结果便没有画上卷叶。于兹一端,足见老人下笔作画之慎。

宋文治以地方菜肴喻画风

不少著名书画家也是美食家。宋文治讲究吃,可谓美食家中的佼佼者。他还将画家的个人风格与地方菜的特色风味联系起来作比喻,妙语迭出。他说,吴湖帆的作品「糯」,犹如苏州菜,讲究清润可口,所以我学他的「气韵生动」。傅抱石的画气魄大,似有四川菜的辣味,所以我学他的「整体布局」。李可染讲究「积墨法」和「破墨法」(「泼墨法」),做到干笔不枯,湿笔不滑,重墨不浊,淡墨不薄,墨越重而画越鲜亮,虽不着色而墨分五彩,犹如吃山东风味菜,所以我学他的「光色鲜明」。

宋振庭擅诗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九日,宋振庭六十大寿,许麟庐之子化夷画梅志庆。宋题诗道:「旧苑森森静不哗,早餐薄粥午啜茶。莫道老夫无大志,留得两眼看梅花。」又题化夷《水仙图》:「翠玉玲珑洗尘妆,岁寒雪朝第一香。为怜书生寂无伴,案头清供引杯长。」

(朱继功辑)

十一世班禅大师应化现身追记

● 王尧



班禅灵童寻访领导小组总顾问
赵朴初(左)、帕巴拉·格列朗杰(右)

1995年11月29日和12月8日,将作为两个极不平常的日子,载入我国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历史。

严肃隆重的金瓶掣 签仪式和坐床典礼

11月29日这一天,全国人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在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国务院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共同主持之下,胜利、圆满地完成了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古城拉萨阳光明媚、瑞气氤氲,西藏及各地高僧大德以及信教群众代表数百人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活动。

大昭寺是那么庄严而肃穆,香烟缭绕,佛灯齐明,彩旗佛幡交相辉映。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代理甘丹墀巴(Dgav-ldan khri-pa)寻访领导小组成员波米·强巴洛珠(Vbrog-mibyams-pa-blo-grub)面向释迦牟尼佛金身顶礼膜拜、喃喃

祈祷,面色凝重地从金奔巴瓶中掣出一签,递给在场监临的罗干、江村罗布和叶小文三位大员观看。江村罗布请在场的高僧大德传观,然后庄严宣布:“嘉黎县坚赞诺布中签,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待报国务院批准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顿时,全场沸腾,法鼓长号,震天齐鸣,人们抛撒吉祥糌粑白粉,欢呼声经久不息。灵童当下就躬身行礼,拜波米·强巴洛珠为师,按佛教仪轨,波米·强巴洛珠为转世灵童剃度落发,并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Rje-btsunblo-bzang byams-pa lhun-grub chos-kyirgyal-po dpal-bzang-po)。当天下午4时,中央代表罗干在册立典礼上宣读了国务院批复电文:

“正式确认、批准经过金瓶掣签中选的嘉黎县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自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以后,全国蒙藏各族宗教人士,在中央政府关怀和藏区人民

殷切盼望之中，历经六年有余的努力，寻访灵童转世的工作，至此胜利结束圆满完成。当场人们欢呼“拉杰洛！”“拉杰洛！”(lha-rgyal-lo, lha-rgyal-lo,意思是“神胜利了！神胜利了！”)这确实道出了人们难以抑止的喜悦之情。难怪西藏人民家家户户奔走相告，载歌载舞，欢喜若狂。

12月8日，在扎什伦布寺，也就是班禅大师驻锡的根本道场举行了坐床典礼。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和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亲自临场主持督察坐床盛典。

在典礼上，李铁映宣读了《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举行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的请示〉的批复》，六岁灵童坚赞诺布就在李铁映等中央大员的护持下坐上了历辈班禅的檀香木根本法床。

在典礼上，李铁映代表国务院向十一世班禅颁发授金印、金册。

金印上镌有汉、藏两种文字的“班禅额尔德尼之印”。金册的文字是：

授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金册；

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坚赞诺布继任为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盖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皆倾心内向，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潜修内典，明心见性，为佛门众望之所归，为世人之所崇敬。今班禅转世业已法定，特依历史定制，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举行坐床典礼，并授汉藏两体文金印金册，用示荣哀。以期继续发扬爱国爱教之历史传统，广结善缘，以利西藏发展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

公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在典礼上，李铁映还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题赠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地扎什伦布寺金字匾的文字：

护国利民

江泽民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

到此，完全实现了十世班禅圆寂的第三天，即1989年1月30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第十世班禅大

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

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西藏民族与宗教习俗的汇合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解决接班人的方便措施。人们都知道藏族人民绝大多数信仰佛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在西藏形成了当地文化、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柱和特点。活佛(清代文献中依藏语称“呼必勒”，依藏语译“未必古”，都是化身的意思)是根据“应劫现身，绍隆佛法，利济众生，随缘弘法”的举意。

远在13世纪初叶，由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Kama-Pakshi, 1204-1283)首发其端，宣布为前世都松钦



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喇嘛次仁在会上汇报班禅转世灵童寻访情况



拥护祖国统一，为国家繁荣富强奋斗一生的十世班禅

巴 (Dus-gsummkhyen-pa, 1110—1193) 化身为活佛。从此，形成定制。这一举措，在后来藏传佛教中影响极大，通过历史的衍变，日见强化，逐渐充实、完善。迨格鲁派僧人采用，解决其接班人时，已是风光绮丽，人才辈出了。以宗喀巴大师的两大弟子，根敦朱 (Dge-Vdungrub, 1391—1474)，凯朱结 (Mkhas-grub-rje, 1385—1438) 形成达赖、班禅两个转世活佛系统，一直受到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重视。

1644年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亟需谋求、寻找合作和支持，从政策上注意将蒙藏地区的佛教力量调动起来，为新朝服务，被称为“乃上应天命，下顺人心之举”。因之，在顺治九年 (1652年)，徵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 (Dlo-bzang rgya-m tsho, 1617—1682) 进京，正式以朝廷名义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这是中央政府正式承认转世活佛制度，并以封授形式列入国家定制的开始。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 又封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中央政府就正式建立了另一活佛转世系

统。在这种风气之下，喇嘛晋京朝见，博取封号，形成时尚，远远超过元、明两代。藏蒙地区几乎各大寺庙均有转世活佛。

由于这一世俗风气的影响，利之所在，如鱼趋渊，如蚁趋食，难免出现许多弊端和纰漏。在活佛转世访求灵童时，指认亲族，相互攀援，几乎被贵族世家子弟和寺庙管理人员亲党所把持。乾隆五十七年 (1792) 不得不由朝廷颁布“金瓶掣签”制度，来谋求改善和减少若干弊端，以示公平中正。同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宗教领袖确认的权威。

从1792年颁发金奔巴瓶开始，除有几位活佛由于“灵异卓著”经过向朝廷申请被批准免于掣签之外，大多数达赖、班禅的转世均由金瓶掣签产生。远的且不说，以九世班禅曲吉尼玛 (Chos-kyinyi-ma, 1883—1937) 为例，就是在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由驻藏大臣文硕亲自主持金瓶掣签仪式产生而被确认、坐床的。十世班禅确吉坚赞 (Chos-kyi rgyal-m tshan, 1938—1989) 在1949年8月10日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亲临西宁确认并监

临主持坐床大典。

上面介绍的十一世班禅由金瓶掣签、批准、确认到坐床，由两位国务委员罗干和李铁映亲临主持督导，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顺应藏族信仰的心意，支持保护西藏地区宗教生活正常开展，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决心。

班禅转世满足了藏族人民的心愿，有利于西藏地区的安定团结

国务院颁发给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金册册文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皆倾心内向，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这是历史事实的追溯，也是对班禅额尔德尼的褒奖。

本世纪初，由于外国势力挑拨，藏族内部失和，九世班禅被迫离藏，辗转来到内地，“固欲解脱，信赖坚固，有缘众生，转深法轮”。国民政府在1931年7月1日册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法号，并授金册册文：

广纳赤宙，知微赤复知彰；薄化黔氓，有德斯能有众。班禅额尔德尼，抚辑藏服，翊戴中央，敦教元黎，效忠民国，实闾无为之妙谛，懋膺无上之殊荣，允宜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朗烛慧珠，奉扬休命，德音普遍，布三民五权之宏规，法铎昭乘，彰六度万行之妙用，祇服懋典，益邕宗风。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后国民政府又授九世班禅西陲宣化使一职。1937年，九世班禅率众返藏途中，几经挫折，郁闷于胸，不幸在玉树圆寂。当时藏族人民痛悼良师，无法救治。

十世班禅，1949年8月10日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特使、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为副使，在西宁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李

宗仁作为代总统，赠予 390 两一块天然黄金为贺。班禅正式取得名义以后，积极向人民力量靠拢，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中央政府方面。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主席，朱总司令任副主席。就在同一天，10 月 1 日，班禅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热情洋溢的电报，表示了爱国热忱：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少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叩 十月一日”

1949 年 11 月 23 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班禅：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望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多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后来历史证明十世班禅不愧为爱国爱教，为国为民的宗教领袖。

1952 年 4 月 28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亲切关怀下，班禅回到西藏与达赖喇嘛举行历史性的会见。

1954 年 9 月，班禅与达赖喇嘛联袂来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又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1959 年 3 月，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叛乱时，大师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拥护中央，立场坚定，为西藏农奴翻身解放作出贡献，同年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班禅衷心拥护中央各项方针政策，贯彻不遗余力。

邓小平称他为“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

班禅拥护祖国统一，为国家繁荣富强奋斗不息，直到圆寂，与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所以，他的转世，十一世班禅，应化而来，继承前世班禅遗志，对于藏族社会、藏族人民非常鼓舞；对安定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新西藏是强有力的积极因素。

十一世班禅的认定， 真正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平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人民长期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结晶。宗教，作为人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追求人生理想的一个重要层面，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就庄严宣布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利。

建国 46 年以来，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四人帮”猖獗肆虐，宗教政策一度受到严重破坏以外，总体说来，都得以认真执行，而且政府还制定若干有关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和法令。

就藏族而言，她沐浴着宗教信仰自由的阳光，享受正常的宗教生

活的情趣。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建立，布达拉宫的彻底维修都是明证。

这一次，十世班禅的灵童转世，经过严格的教法教制的手续，在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大员主持下得以圆满实现，更为生动地说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中国的实行。

隆莲老法师，也是藏传佛教的长老，她在《喜闻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的诗中说：

南洲圣教得人师，
嘉讯真传喜不支。
应化遥瞻新德相，
前身犹记旧威仪。
千秋疆宇终宁谧，
十亿天龙共护持。
大法金瓶遵古制，
众心归礼雪山狮。

两位蒙古族老经师白凤阁、却日阁表示：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已经六年了。这六年中，我们每天诵经、祈祷班禅转世灵童早日掣定。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的心里也踏实了。

当十一世班禅，年仅六岁的坚赞诺布到北京，向中央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对话，充分表现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的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的高度重视，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重视更能拨动人们心弦呢？

笔者聊以偈句抒发胸臆，并作芹献：

顺应群机现妙相，
幻化三生续前缘。
欣逢盛世隆重典，
云天华雨春满园。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洛松）

蒋介石的身边人 共产党的好朋友

● 王光远

原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莫雄，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国民党元老。曾多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莫雄，广东英德县人，1891年生，当过学徒、伙夫。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讨伐张勋的战斗，后又参与反龙济光的兵变。曾营救过被困桂林的蒋介石。1922年，孙中山任命他为中央直辖第一独立旅旅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翌年，孙中山重组大元帅府，任莫雄为粤军二师第3独立旅少将旅长，后升任第4军11师中将师长。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为了攫取粤军的领导权，借处理廖仲恺被刺案之机，逼走了许崇智，并将莫雄师缴械，莫雄只身逃往澳门。

早在广州革命时期，莫雄就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周任政治部主任，叶任二师参谋长，莫任二师旅长。

中央特科对莫雄极为重视，列为重点统战对象，由刘哑佛与他经常联系。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下，莫雄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说：“在中共几位党员的帮助下，我才明白原来共产主义乃是更具体地体现了孙先生亲自倡导的三民主义，实行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也就是实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唯一途径。”这时，莫雄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希纯传达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的意见说：“你是革命的老前辈，你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为宜。”

不久，莫雄被任命为上海税警总团总团长，他利用这一职务多次营救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34年初，莫雄经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等人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4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他立即邀请中共党员严希纯、

项与年、刘哑佛等到他家中，坚定地表示：“我莫雄很佩服你们共产党，因此我相信你们的主义是可以救国强国的。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齐干吧！蒋介石要我剿共，我要剿蒋！”

四区行署设在江西德安，这里是南浔铁路的中心，下辖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7个县，在军事上处于重要地位，特别是蒋介石正在“围剿”中央苏区，他的行辕就设在南昌，这一地区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对莫雄所请极为重视，决定派精干人员前去。到行署任职的有刘哑佛（主任秘书）、贾绍谊（情报股长）、阮退之（文教科长）、傅肖先、薛代旦、丘镛等。到保安司令部任职的有胡毅（副司令）、陈修爵（副司令）、卢志英（参谋长）、项与年（情报参谋）。同时又通过莫雄介绍一些党员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还介绍10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行署设在南昌的办事处，也成了党的交通站。项与年的夫人张育民和特科的丘吉夫还在南昌市内开了一家诊所，实为情报站。能在蒋介石的身边开展如此声势的情报工作，全赖莫雄的掩护。

德安地区本是共产党活动频繁的地区，为了配合莫雄的工作，使他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游击队停止了公开活动，造成一种平安气氛，结果被评为“模范区”，蒋介石还特别“传令嘉奖”莫雄。

这时，蒋介石正在积极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五省主席及军事长官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莫雄也应邀参加。会后莫雄带回一大包绝密文件，内有：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战斗序列等等。莫雄深知这个对付红军的“铁桶围剿计划”异常残忍毒辣，果真得以实施，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将全部文件交给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三人阅后，诚恳地

对莫雄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他们先利用一架简陋的发报机及时向党中央发出情报，然后将文件抄在薄纸上，藏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内，由项与年亲自送往瑞金。这一重要情报对党中央果断地决定突围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起了重要作用。长征中毛泽东在谈到这份重要情报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1935年3月，蒋介石派专机把莫雄召到贵阳，任命他为贵州毕节行署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蒋介石指着地图亲自交代说：“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清剿。”并指定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归他指挥。莫雄就带着德安行署的刘哑佛、项与年等原班人马来到毕节。这时卢志英已被任命为中共贵州军事特派员，在贵阳工作，也调来毕节继任参谋长。

毕节地区确实有数千红军伤病员，若听任第六十三师去清查，会造成严重后果。莫雄就同刘哑佛、卢志英等人商议，抓住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有“好色”之癖，借口给他“谋娶妾侍”，整天用茅台酒灌他，又给他找了两个漂亮的小老婆，让他整日沉迷于酒色之中。待到他出兵清查之时，伤病员早已安全转移得无影无踪。

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要过毕节，为了掩护红军过境，莫雄等人先制造假情报，设法将陈光中的六十三师调走，同时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1936年2月，二、六军团冲破敌人重重防线，直向黔西、大定、毕节而来，莫雄又和卢志英编了一个红军主力正向遵义前进的情报，送给蒋介石，并以“围截红军”为借口，把保安队全部撤出城外。2月9日，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毕节。由于这里各项活动的基础好，红军在这里休整了18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成立了“毕节县革命委员会”、“抗日救国会”，又组建

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由爱国人士周素园任司令，共产党员邓止戈任参谋长。

这时红军军事委员会曾派一参谋给莫雄送来一封信，由贺龙、萧克、夏曦等9人署名，信中说：“莫雄先生：你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莫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莫雄认为，保安司令部和行署职员合起来才几百人，加上彝祖的县府警察大队300人，也不足千人，枪械又陈旧，建立队伍有困难。他对红军参谋说：“你们两三天内就要开走，你们一走，我不成了无兵司令？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请你告诉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可以帮助你们的。”红军离开时，莫雄手下不少人都参加了长征。

红军走后，中统特务梁福庭就将红军过毕节的情况向蒋介石做了密报，蒋介石得知莫雄竟然一枪未放，弃守城池，让红军顺利通过，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将莫雄扣押，并派专机押往南京。后又查明扣押莫雄还有一个原因，莫雄派司令部参谋黄贲书持其亲笔信去上海，寻找老朋友华克之，结果在李怀诚家中被捕，华、李二人都参加了1935年11月刺杀汪精卫的活动，莫雄也成了暗杀嫌疑犯。莫雄就是以“通共”和“暗杀”二罪，被关在南京军法处。

莫雄被捕后，卢志英、郑世农等人曾多方奔走营救。直到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蒋介石想利用莫雄与两广人士的关系，派他去两广进行策反，才由杨永泰、张发奎、陈诚等人将他保释出来，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两广事件平息后，蒋介石再次派他出任专员，他以治病为名，婉言谢绝。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省长吴铁城请莫雄出任南雄县长兼“广东大后方第23区游击司令”，莫雄出于对抗日的热情，接受了这一任命。

当时南雄狱中关押着六七百名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进步人士，是余汉谋在粤、赣、湘三省边界“剿共”时抓来寄押在南雄的。1938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指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解放后任省府秘书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与莫雄联系，设法营救这些人，云广英立即写信给莫雄，莫雄到狱中一查，果然如此，这些人处境艰难，有的已瘦死狱中。莫雄不顾一些人的反对，愿自担罪名向余汉谋交代，毅然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还发给每人一块银元、5斤大米和由他签字的释放证明书。后又查明还有24名共产党员在押，都已定案判刑，莫雄不敢擅自释放，就去与余汉谋交涉。他对余说：“现在是国共合作，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摸了酒杯底，把这些人放出来，多一份抗日力量，有什么不好。”余没有答应，莫雄又托徐景唐去说情，余才答应，但这些人出狱要在莫雄手下当兵，莫雄满口答应，终于将这些人释放出来。

莫雄曾去武汉一次，会见了叶剑英，二人旧友重逢，互道十余年别情，叶剑英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送给他毛泽东《论持久战》一册，莫雄如获至宝，他回来后，立即指示县政府翻印三千册，由他分送给亲友和部属。

1939年2月，莫雄调任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党派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朱小仲等10多人前来，成立了政治部。1941年4月，成立了第七战区第8挺进纵队，莫雄任司令，黄桐华任政治部主任，后任副司令，活跃在粤北抗战前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在全国大搞军官退役，莫雄也被解职，只在余汉谋部任挂名的少将参议。黄桐华等人也奉命撤离，带领原挺进二纵队的大部分上了北山。

1947年底，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兼行署主任，由于北江地区共产党十分活跃，他特请莫雄出任英

德县长，后又调为韶关行署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莫雄在任职期间，请地下党员刘强担任他的谍报组长，又将四张“谍报证”送给黄桐华，持此证可以在国统区通行无阻。莫雄还利用各种关系，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如：何英（解放后任武汉空军党委书记）、李拔才、陈子涛等。莫雄还派人从香港购买胶鞋 3000 双，送给游击队。

莫雄还通过刘强把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送往解放区。据地下交通站的潭子净回忆，1946 年 4 月，莫雄送给陈建中支队机枪一挺，子弹 1000 发。7 月，又送来步枪和手枪子弹 10 箱。莫雄的贴身卫士莫善文回忆，1947 年底，莫雄送给北江支队长枪 50 支，子弹几十箱。另据陈建中支队通信员陈来回忆，1948 年春，莫雄送来步枪数十支。后又通过其堂兄莫献猷送来机枪两挺。类似情况还有多起。

莫雄的活动，特务们侦知后，不断到宋子文处告状，说莫雄“通敌”、“资敌”。莫雄只好回到广州，任挂名的少将参议。1949 年秋，薛岳也怀疑莫雄通敌，兼任广州警备司令的军长胡长青也发出了：“莫雄是北江之匪首，格杀勿论”的命令。莫雄化装后又逃往香港。

全国解放后，叶剑英出任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帅对莫雄极为关心，派李学林持其亲笔信去香港，邀请莫雄回广州。黄松坚、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等人也都写信相邀。莫雄回到广州后，叶剑英在梅花村家中设宴接见了，并转达毛泽东主席的话说：“他（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毛泽东的话使莫雄深受感动。11 月，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很快平定了匪患。

1951 年，莫雄调任广东参事室参事。在土改、镇反运动中，他的一



些旧部被镇压，也有人要求处理莫雄，叶剑英立即坚定地表示：“这个人对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要保起来。”

1955 年，莫雄升任参事室第一副主任，兼省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是年春，莫雄的同父异母弟莫汉，妄图策反莫雄出任反共救国军司令。莫雄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1956 年 9 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派项与年去广州，接莫雄来京参加国庆典礼活动。

在反右派运动中，由于莫雄在省政府大会上作过《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发言，有人要求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因省委副书记古大存等人的保护，才免于右派罪名。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莫雄以“中南第一大特务”的罪名被关押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78 年，莫雄随广东省政协参观团再次来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并再一次受到叶剑英的接见。回广

州后，他郑重地向参事室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9 年，莫雄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 年 2 月 12 日，莫雄在广州病逝，享年 89 岁。

（责任编辑：刘文）



把爱心献给社会

李丽芳 作

一个战犯夫人的悲喜人生

● 李占恒

香港著名作家曹云霞，由客居地香港返回家乡——江西省铅山县探望，因肝病复发，于1996年1月28日，在丈夫、子孙的簇拥下乘鹤而去。曹云霞的丧礼相当隆重，有亲朋好友四面八方赶来奔丧的，有海峡两岸的军政、新闻、文学、出版界人士飞鸿吊唁的……引人注目的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吴官正敬献的花圈和台湾政界要人章孝严的挽额——“范垂巾帼”，这突出标明了谢世者的身世不凡。

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早在1943年于重庆，将自己的得意学生曹云霞介绍给周恩来时，他指着与舒绣文、陶金、赵蕴如同台演出的曹云霞，说：“我的这个学生长



曹云霞 1944 年于重庆

着一张喜剧的脸孔，生就一副悲剧的嗓子。”大师不经意的一句话，概括了曹云霞的一生。

曹云霞出生于一个崇尚武德的家庭，父亲曹亚山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她8岁便双手操作勃朗宁，打得屋后的枣子开花。在“长沙大火”之后，她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中央军校三分校”（后为黄埔16期），毕业之后，又被保送到蒋经国的“青干班”来受训的。年龄最小的曹云霞深得班主任蒋经国的喜爱。曹云霞想跟随蒋经国抗日打游击，抱怨“这里练文不练武”。蒋经国开导她“要能文能武”。并亲自观看了曹云霞引以为自豪的双枪射击。此后曹云霞追随蒋经国作了许多抗日工作，最有名的是参加蒋经国任团长的“江西青年训练慰劳团”，赴抗日前线慰劳抗日将士，行程八千余里。慰劳结束，回到赣州，曹云霞与一同参加慰劳团的宣传大队长蔡省三喜结连理，蒋经国亲临婚礼，“那一天，先生特别穿长袍为我们证婚。”“如果没有蒋经国，便也就没有我们的戏了。”

1942年浙赣战争爆发，在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撤退福建崇安时，身为6县三青团书记的蔡省三，与妻子曹云霞抗命不撤，在家乡组织了抗日游击队，著名的一场战斗，是抢在日军入侵之前将装在百余条船上的食盐分给沿江群众。蔡省三在乡间发动群众，曹云霞手提两支“快慢机”，在信江北岸汪二渡狙击日寇……1949年，蒋家王朝行将崩溃，身为“青年救国团赣东北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的蔡省三与妻子曹云霞拒绝执行蒋经国迅速撤往台湾的指示，他们潜伏大陆，组织“抗俄救国游击队赣东北地区指挥部”，蔡省三任指挥官，曹云霞任副指挥官……这一来结局是悲剧性的。

结果蔡省三作了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罪犯。

曹云霞又结婚了，她对那位与她一往情深的年轻人立了一纸约定，一旦蔡省三出狱，便解除婚姻关系。一生怀过16胎的曹云霞，拖着蔡省三的两个女儿，又与继任的丈夫生了五个儿女——七个孩子！那个日月，她收过旧货、作过小生意，还学了几手中医，跑起了江湖……

1975年蔡省三特赦获释，消息传来，曹云霞立刻进京与蔡省三会面，接着便是办理与后夫的离婚手续，义无反顾地去了香港，与因蒋经国政府拒收归来的战犯而留居那里的蔡省三复婚。

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蔡执意要去台湾的动因，是投奔自己一生崇敬的蒋经国。蔡的这个决定，恰是同进京与他会面的、尚未恢复合法妻子身份的曹云霞商议所定。

蔡省三与曹云霞因其特别的身份与境遇，成为香港，乃至国际政界、新闻界注目的人物；两岸都有代表与之接触，所谓第三方“国际救援会”也出面表示关怀，为此蔡、曹二人在《七十年代》发表声明，我们有自己的祖国，留居香港乃个人的选择，二人以“三不”、“四要”铭志，一不作官，二不发横财，三不作恶害人；一要为历史作证，二要为正义发言，三要为民请命，四要为真理呐喊。二人办了一个中国国情研究所，蔡省三全身心投入政论文写作，曹云霞边挂牌行医，边伏案写作。

蔡、曹二人居港，恰逢台湾国民党完成由蒋介石到蒋经国的过渡，于是蔡、曹二人的“戏”又来了。

1975年八月号的《七十年代》，刊登了《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专稿，大陆的《参考消息》连续四天作了详细摘要转发，蔡详述了他所知道的蒋经国的从政历程，性格特点，并不为拒绝他返台而恶语中伤，蔡中肯的判断，“蒋经国三不会”：一不会卖，即不会卖身投靠外国；二不会降，即不会投降中共；三不会烂，即将有一番作为。病榻之上的周恩来总理阅罢，甚感兴趣，他在报纸的空白处作了如下的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 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托托。

该件影印在《周恩来画册》里，成为蔡、曹最为珍贵的宝藏。

港台新闻媒介曾不负责任地称“蒋经国有一个秘密夫人，名叫张雅君”。于是以讹传讹，纷纷扬扬，《晶报》竟将蒋经国与秘密夫人的孪生儿子，称作了“蒋孝严”、“蒋孝慈”，为正规听，曹云霞于1977年发表了《赣南忆旧录》，向世人宣告了许多秘密，其中就有：

江西青干班在蒋先生的倡导下，形成了一股“兄弟热”，男女同学都是亲热地互相叫唤你兄我弟，女同学为什么不称谓“姐妹”呢？这也是由于蒋先生的教导，要我们女同学都有男人“大丈夫”的气概，将来都像男同学一样，能胜任独当一面的工作。这样一来，有些女同学就表现得很活跃、很积极，特别是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更显得突出，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乎乎地叫“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十分和蔼可亲。这位自称

是“大哥”的女同学，大概是28岁，她名叫章亚若，……后来又看到很多同学都巴结章亚若，亲昵地“大哥”“大哥”叫不绝口，章亚若俨然成了全班的一个中心人物。我于是好奇地向团部一个姓徐的女同学探问：“你瞧章亚若可有神通呀？”徐说：“小鬼，你知道章亚若是谁？”我说：“她是专员公署职员调训的。”徐说：“章亚若来头可大啦，她是蒋主任的‘那个’……”

曹云霞首次把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这算是为章亚若正了名，也为他们的两个儿子——章孝严、章孝慈正了名。1991年，蔡省三去台湾“观光”，身为台湾“外交部次长”的章孝严，特别邀请蔡省三到办公室叙谈，分手时孝严叮咛蔡省三：“问候曹阿姨！”

1978年，中央统战部邀请蔡省三夫妇回内地参观。两人访问了赣州蒋经国的故址，最后来到了老同学、当时任台湾军队政战部主任王升的家中。回到香港，曹云霞写了《同王升的亲人话家常》一文，发表于《七十年代》。

蔡、曹二人在香港办的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很有成果。1981年，研究中心发表的《从国民党十二大谈中国统一问题》一文，提出统一的“十条意见”，与半年之后叶剑英发表的“九条”有多处一致。他们把两岸今后的走势，概括为16字：“确保和平，不独不打，边谈边通，自然统一”。可见研究有较高的水准。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推荐十本研究东亚的书，就有二本是在蔡与



曹云霞 1994年于香港

曹合写的。

1994年共和国举行建国45周年庆典，国务院邀请蔡省三与曹云霞夫妇进京观礼，成为李鹏总理的座上客；台湾方面也不再把蔡、曹二人拒之门外，以1996年春节为例，他们既收到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参加新春酒会的邀请，又收到了台湾驻香港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中国文化协会和中央通讯社联名邀请参加春茗联欢会的请柬。

可以说晚年的曹云霞很风光，很幸福。在香港，情深似海的蔡省三设计，二人居室的墙壁上全贴着曹云霞的

照片，拥挤挤数十张，都是曹云霞一个脸孔——喜剧的脸孔。

万没料到，曹云霞会这样早的告别人世，她返回家乡不久，便住进了上饶市的高干病房……蔡省三即刻通知了七个儿女，七个儿女来到了母亲身旁；蔡省三也将噩耗通知了曹云霞的第二任丈夫，这位老人携继任曹云霞为妻子的一位退休女教师，也来到了她的病榻前。

曹云霞的心被感情的潮水所拍击……

临终前出现了一张“喜剧”的脸孔。

（责任编辑：刘家驹）

编读窗

需要的是沟通与合作

《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同志们：

因参加一部辞书的审读，加之社会活动较多，许久没有联系了。不过我作为贵刊的一个忠实读者，杂志还是逐期翻阅的。今年以来，《陈布雷、陈琏父女分道扬镳》、《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以及《“扬州出美人”背后的血泪史》等，读后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然，也有我个人认为的平平之作，至于文章中的瑕疵也时有发现。不过我已注意到三期有“更正”发表，四期的“编读窗”又订正了两篇文章中的错讹。这倒使我这个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的读者，油然而生了这样的感慨：个人提意见不难，刊物要杜绝错误却不易。

办刊本来就不易，办好像《炎黄春秋》这样的一个刊物就更非易事了。《炎黄春秋》的内容涉及的不仅仅是某一领域，某一专业，某一行当，而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包。编辑部怎能聚集那么多的专家来把守关口防止疏漏呢？老实说，失误难免。关键是编辑部是否敢于直面自己的失误，能否勇于公开承认并切实纠正自己的错误。《炎黄春秋》创刊近五年，坚持这样做，我是钦佩的、赞赏的。记得贵刊曾郑重提出以“尊重史实”为办刊原则。我以为单是编辑同志们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作者、编者、读者三方面经常的沟通和合作。

严谨的作者总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声名并愿对自己的文章负责的。为《炎黄春秋》杂志撰写的文章，又多涉及历史或现实的真人真事，势必会在执笔时慎之又慎，反复核对史实和事实，力求准确无误，尽量避免给编者带来麻烦，给读者带来损失。甚至还要像鲁迅那样，一篇

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我是主张“文责自负”的，作为作者似乎也应以此自豪。但这不等于说编者就理应无所作为。文章的取舍，内容的斟酌，史实的认定，文字的推敲，我以为都在编者的职责和职权范围之内。作者的疏忽，编者予以弥补；编者对文稿的某些删改，作者应予以理解和支持。需作较多删除和改动的，当然最好请作者自行处理，或事先取得作者的同意。这就是双方的沟通和合作，既可保证刊物的质量，又可维护作者的声誉，一举两得。

而读者，则是一本刊物以至一篇文章最终的受益人或受害人。读了好的文章，读者会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引发现实的感触，找到做人的榜样，培养高尚的情操，寻取有益的知识，从而感到获益匪浅。如果刊发的文章出现了重大的思想性的、史实性的、科学性的、常识性的错讹，却无人指出，或虽有人指出却不予纠正，结果在读者中以讹传讹，后果自然是很不好的。

读者肯定不希望刊物中屡出错误，但通情达理的读者也深知期望刊物不出现任何错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期望的是，刊物多发好文章，有分量的文章，而尽量减少失误；重大错讹则公开纠正。刊物敢于直面并勇于纠正自身的失误和错讹，是刊物有自信的表现。刊物应该相信读者懂得这个道理。刊物相信读者，读者也必然会更加相信这个刊物。

我深信，依靠作者、编者、读者三方面的沟通和合作，《炎黄春秋》必将办得更好，更出色。

王景山



蒋军在台湾的 一次特大坠机事件

● 徐刚

1974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福特签署废除“台湾决议案”，宣布了“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护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权力”法案正式失效，在台北的蒋氏父子犹如丢失了一件护身符，忿然中夹杂着惊慌失措。蒋经国紧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要求三军“提高忧患意识”。会后，立即在桃园观音海岸丘陵地带，举行一次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

蒋介石希望通过这次演习，给风雨飘摇中的“党国”带来一线生机。作为昔日叱咤风云的国军统帅，他何尝不想亲临现场，无奈重病缠身，心力不济，只能呆在官邸里等待侍从官送来演习的录像资料……

然而，他的儿子也是他党国接班人的蒋经国，带给他的却是他万万未曾料到的坏消息。

“父亲，”蒋经国低声说，“演习出事了，陆军总司令于豪章等七名高级将领分乘的两架直升机相继坠毁了……”

不等蒋经国把话讲完，蒋介石如同吃了一记闷棍，仰面倒下……

6时55分，陆军总部所在地

——云冈机场。

伴随着嗡嗡作响的轰鸣声，灰色的天空中两团黑点变成两只大蜻蜓，带着强烈的旋风缓缓降落到停机坪上。

这是两架“UF-H”型重攻击直升机，系美国生产用于装备美军的性能较为先进的机种，它的安全系数较高，可进行“全天候”飞行。

飞机刚停稳，身着飞行服的少校飞行员钻出机舱，快步跑进陆军总部。

面对群星灿烂的众多将领，他挺胸抬手行礼：“报告，接送专机已准备完毕，等候将军指示！”

陆军总司令于豪章上将告诉他，待人到齐后即刻出发。

于豪章是黄埔军校十二期出身，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返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于豪章当时担任蒋介石的侍从武官，负责保卫蒋氏家庭的安全，宋美龄收他为义子。蒋介石去台复职后，于豪章外放又晋升为嫡系十一师少将师长，50岁时便出任台湾陆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建军以来最年轻的总司令。眼

下，他刚满56岁，正值宏图大展之际，风传他是下任“参谋总长”的热门人选。再者，他因与宋美龄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军中与孔祥熙之子孔令晟皆被视为“夫人派”的核心成员。蒋介石已病重缠身，“夫人派”与蒋经国的“太子派”之间必然有一番权力之争，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倍受人们关注。

参加演习的陆军高级将领都已陆续到齐。于豪章抬腕看看表，已是7时20分，他示意众将登机。

政战部主任张雯泽中将打头，陆军通信署长常清宗中将及两名上校军官、一名少校军官、一名少校侍从官，共六人先登了其中的一架直升机。7时30分，飞机腾空而起。

与此同时，于豪章率新竹军司令冯应平中将、陆军总部的两名少将及两名校官，一行六人，登上了停在一侧的另一架直升机。

飞机正要拔地而起，一辆黑色轿车朝飞机方向疾驰而来，车门开处，从车里走出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中年将领。一身草绿色野战服，肩上缀着两颗金黄色将星，煞是神气。

机上的人透过舷窗一看，来人正是久等不来的龙冈一军团司令荀云森中将。

有人朝荀云森嚷：“老荀，机上已经坐满啦，你坐车去吧！”

于豪章却冲他这位老友招招手：“上来挤一挤吧！”

总司令发了话，荀云森硬是挤上了这架正待升空的飞机。

7时35分，于豪章等人搭乘的这架直升机缓缓升空，很快消失在厚厚的云层之中。

两架飞机里，难得一聚的将领们谈笑风生，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天顶之灾正悄然向将星们袭来！

12月27日这天，龙冈飞往桃园的航线上恰巧正聚有大片的浓积云。加之航线上空是一个狭长的风口，终年气流不稳。

“UF-H”直升机钻入云层，机身当即颠簸起来，如同在大风大浪中遨游。

陆军将领们平日很少遇上这种阵势，于豪章大叫：“开稳一点！开稳一点！”

飞行员已力不从心。机长当即向地面塔台报告：“天气恶劣，气流紊乱，飞行出现障碍，请求指示！”

飞行员把飞机从500米下降到300米，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流朝于豪章的座机横扫而来。飞机左右摇晃一下，便失去了控制，疾速坠向地面，没等机上人员反应过来，伴随轰隆一声巨响，飞机已重重砸进了杨梅公路旁的一块稻田里。飞机的引擎竟把稻田砸出个大窟窿！顿时，机身断裂，机上人员和物品被抛出舱外，地面一片狼藉。

荀云森中将当场身亡，他那身漂亮的制服碎落到好几个地方，其状惨不忍睹。于豪章尚算走运，摔断了多根肋骨，命在旦夕。

于豪章座机坠毁的同一时刻，张雯泽等人乘坐的那架直升机已经飞抵演习场上空。

地面上，坦克、战车和荷枪实弹

的国民党军士兵散布在海岸边、丘陵上，缓缓蠕动。演习已经开始。

直升机缓缓下降，降至30米时，飞机在空中做低空盘旋。

世上的事情往往无独有偶。张雯泽与其余五名将校正透过舷窗朝下巡视，机身突然一下倾斜，巨大的旋转机翼打在一处高起的土堤上，机翼当即折断，整架飞机像一个玩具似地倾覆、翻转，迅即撞毁。

地面的演习的官兵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国民党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空难事件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

8时零5分，当张雯泽座机坠毁的同时，在杨梅公路旁的那块稻田里，身负重伤的于豪章总司令的侍从官，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侍从官被眼前情景惊呆了：断成两截的飞机残骸冒着滚滚浓烟，先前还衣冠楚楚的将领们一个个血肉模糊，横七竖八地躺在稻田里。他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求救，他忍着剧痛爬上公路。

终于有一辆出租汽车出现在公路上。司机曾在陆军服役，当过一等兵。他当机立断，决定依据军衔的高低来确定救人的先后。他找到了肩上扛有三颗将星、尚有微弱呼吸的于豪章上将，用尽全力把他抱上出租车，疾速驶向附近的医院急救，随后又打电话向当地驻军报警。

三军总部、国防部的高层官员匆匆赶往出事现场。坠机事件也震惊了台湾最高当局，行政院长蒋经国闻讯驱车赶来。

蒋经国显得忧心忡忡。这位“太子”如今也已是66岁的老人，蒋介石百年之后，他将独立支撑其父苦心经营了二十几载的这个蒋氏小朝廷，这些高级将领的意外伤亡，给他平添了几丝不祥之兆。况且，蒋介石尚在病中，此次演习是他亲自授意，并寄予极大期望的，现在自己将如何去向父亲汇报呢？重病的父亲经受得了这沉重的打击吗？

8时30分，桃园观音地方医院。

狭小医院从未经受过今天这种阵势，救援官兵抬着受伤者送进医院，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忙前忙后，尽力挽救每位伤者的生命。无奈，这家医院的设备较为简陋，又有几位将校不治身亡。陆军总司令于豪章上将和政战部主任张雯泽中将气息残喘，随时都有殒命之虞。

幸而这时候，一辆设备先进的移动救护车奉调从台北荣民总医院赶赴现场，给人心惶惶的救护现场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一个新难题又摆在众人面前：救护车上昂贵的电击急救设备只有一套，毫无疑问“先救者生，后救者亡”，他俩一个是陆军总司令，一个是政战部主任，究竟该先救谁呢？医护人员面面相觑。

时间不等人！主治医生的目光朝在场的所有军官的肩间上溜了一圈，尔后跑到一个上校跟前：“请长官即刻决定！”

上校瞥了瞥四周，唯独他的军阶最高活该倒霉，由他做这种后果严重的决定。他略一沉吟，果断地下令道：“先救总司令，再救主任！”——谁让张雯泽比于豪章少一颗星呢！

在强大电流的激发下，于豪章的心脏渐渐恢复了正常跳动，又经过20分钟的抢救，这位总司令终于摆脱了死神的追逐。而就在这同时，不走运的政战部主任张雯泽却因未得到及时的救治而命丧黄泉。

两架直升机相继坠落，13名将校非死即伤，当局宣布取消演习。

这次坠机事件对病中的蒋介石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次空难死伤的将领比一次大的战役损失的还多，不能不令这位曾驰骋沙场、身经百战的老“总统”黯然神伤，痛心疾首。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那点残存的“反攻梦”最终也破灭了。

（责任编辑：仲文）

三位名教授掩护我脱险

● 裴毓荪

1947年夏，“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次年，又颁布了一系列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法令措施。接着在北平、南京、天津、成都、重庆、上海等地，相继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

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我既是进步组织“剧艺社”的活跃分子，又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在“8·19”第一批黑名单上就有了我。当天中午，地下党支部的周广澜通知我，先进城到亲戚家躲避一下。



1981年清华大学70年校庆时，费孝通和裴毓荪在一起

组织上会与我联系。他特别叮嘱说：“你必须迅速离开。万一被捕，就学习卓娅！”我回到宿舍取了两件衣服，正准备离校，已经晚了。军警包围了一切可能通行的路口，校内已出现了“便衣”。于是，灵机一动，我朝着教授住宅区走去。出乎我所料，教授住宅区已经有军警在那里巡逻了。

走到费孝通教授家门口，进不进去？我犹豫了，费孝通是我在社会系所熟悉和尊敬的老师，我怎么能连累他的一家呢？何况，他当时已经是进步教授闻名，容易引起注意，进去了也不能久留。可是，情况紧迫，我已经无法走出校门了，只好冒失地踏进了费先生的家门，我相信他会帮助我的。果然，费先生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快到里面去！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你先上阁楼去躲一躲，我们再想办法。”费师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安慰我，为我做好吃的。但是，她又为我担忧受怕，通宵不眠地守门，生怕有人闯进来把我抓走。费先生则深更半夜跑到燕京大学去设法找关系，想弄辆可以自由出入校门的汽车把我送进城去。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天，“便衣”上门来了，被费教授巧妙地对付了过去。

费孝通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他去找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冯友兰商量，让我到冯家暂避一时。因为，他认为，以冯友兰教授当时的地位和声望，国民党政府可能不会去搜查。冯先生曾执教于西南联大，我心里却有点犯嘀咕，我虽在西南联大上过冯先生的哲学大课，他根本不会认识我。何况，在这样的时刻，他怎么能收留一个被“通缉”的学生呢？20日深夜，费先生却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冯先生让我马上去他家。于是，我怀着无限感激两位恩师的心情来到了冯先生家。当晚，就住在一个比较隐蔽的阁楼里，受到他们全家的关怀。第二天，冯师母专门炖了鸡汤，让小妹妹冯宗璞给我送上阁楼。

这一天的深夜12点左右，校领导派人来请我去他家，说要帮助我脱险。当时，我虽然不相信，但又不能不去。一进门，他就好像很关心似地对我说：“军警包围很严，再拖延一天，他们就要进校内搜查。你的传票是‘独立案件’。”说完，他拿出传票指给我看，上面写的是：“祸



吴泽霖

国殃民”独立案件。我当时心里就有点明白了，我问道：“你们打算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明天一早陪你一起去特刑庭，并立即保你出来。”还说：“我们知道，你年轻活泼，热情好活动，不是共产党，是被人利用。我们一定保你出来。”这时候，我就更清楚了，也明确地表明我的态度：“我绝不会跟你们一块去。因为，我根本没有‘祸国殃民’。我就在冯先生家待着，您们看着办吧。”

回到冯先生家，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我决定趁黑夜赶快离开，再设法逃出去。这时，冯师母含泪给我包上几个馒头、咸菜和几件衣服，还给了我20万“金圆券”。她一再叮嘱：“路上要小心，遇上坏人，就把‘金圆券’给他，保住自己！”我被这真挚的母爱所深深打动，含着热泪，匆匆溜出了冯家的后门，向黑压压的一片树林走去。

突然，一个人影迎面而来，我已来不及躲开，只好吃惊地站在原地观望。只听见轻轻的一声，“快过来，裴毓荪！”仔细一看，原来是社会系的吴泽霖教授，是我所熟悉的老师。他急忙拉着我的手，边走边细声说：“听说你上了黑名单，又没有离开学校，我们都急坏了，已经找了你好两三天了。刚听说你在冯先生家，我就趁夜晚来接你去我家，明早我将借用使馆的车送你去城里朋友家。”这时，我又惊又喜，好像在梦中一样，好心的老师们都冒着危险援救我，都那样真诚地爱护自己的学生！

吴先生住的四合院，是我常去请教的地方，这时候来到这里倍觉亲切。他马上让我睡在他女儿的房间，他自己则睡在外屋，以便应付意外情况。

22日凌晨两点，突然出现轻轻的敲门声。吴先生马上惊醒，我也穿好衣服下床，准备应付意外。急促的敲门



冯友兰

声依然不停，我感到不能再拖延。吴先生叮嘱说：“若从门缝看是陌生人，就马上回来！”我急忙朝大门走去，虽然天色昏暗，从门缝看去，还是认出来了。“啊！是彭佩云！”我惊喜万分，连忙打开大门。她拉着我说：“好不容易找到你，快走，不要耽搁了！”我还是回房里与吴先生告别，然后立即和她一起小跑来到住在校园里的剧艺社负责人王松声家里。

患难之中，同志相聚，心情十分激动，因时间紧迫，已不容我们话别就得马上离开。我立刻拿上组织上为我做好的身份证，改名“梅青珍”，脱下我的学生装，穿上准备好的普通妇女衣服，跟着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张永刚，翻越西南角围墙跳出清华校园。我们走进高粱田里，天刚开始蒙蒙亮，到了离德胜门还有两三里的地方，一看，我们两人的衣服都湿到了胸前，怎么能这样进城去呢。于是，我们找了个土墙围起来的厕所换衣改妆。我化装成身着旗袍、脚穿皮鞋、眼戴墨镜的小姐，他装扮为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等到快八点时，见进出城的人多起来，我们顺利地混进了城，坐上黄包车，直奔我家亲友秦二哥家。

几天后，组织上派人送我去了天津，住在一座豪华别墅里，等待机会去解放区。

没多久，经傅冬菊的安排，我化装成为银行老板家的保姆，带上铜耳环，梳着发结，穿一件花布大襟上衣，黑裤，手上挎的白布包里装的是点心和红糖，一副回娘家的模样。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我终于通过闸口封锁线，到了解放区平山，进入了党校直属班学习。

（责任编辑：刘文）

清代名臣孙嘉淦

和他的《三习一弊疏》

● 李文林

康、雍、乾三朝为臣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号懿斋,别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小时候,家境贫寒,但他聪颖好学,性格顽强。康熙五十二年,他连登科第,春闱得中举人,秋闱又中了进士,改庶吉士,从此步入了仕途。他历仕康、雍、乾三朝,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在改革太学、审理冤狱、取消酒禁、治理永定河以及抚治苗民等方面都有过卓越的建树。他居官四十余年,为清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代学者郭象升认为:“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也。”

“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这是孙嘉淦自定的居官八约,是他生平成功就业的得力处。他一生清苦,囊无余物,在他当直隶总督时,用养廉银买下几顷田地,但不到三四年,因修顺义城悉数卖去,到他死的时候,仅留下祖遗山田了。

孙嘉淦一生以忠清鲠亮著称于官林。他每次奏劾,必直告无隐,甚至敢于弹劾皇亲。雍正皇帝曾指着孙嘉淦对九卿们说:“孙嘉淦每事陈奏,可谓直言极谏,汝等当以为法。”每逢朝里有需谏净的事,大臣们总是说:“得非孙公耶!”他死了以后,乾隆皇帝叹惜地说:“朝中少一正人矣!”

孙嘉淦一生以直谏闻名,也因直谏每受挫折,但他始终不悔。早在翰林院任检讨的时候,就曾向雍正皇帝

提出过“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的建议。我们知道,雍正皇帝是通过一些权谋手段取得帝位的。他在取得帝位之后,杀戮和囚禁了一些曾经与他争过位的弟兄及其同党,一时间朝里弥漫着恐怖气氛,而西部边境的连年用兵,又使国力耗费巨大。孙嘉淦的建议无疑戳到了雍正的痛处,特别是所谓“亲骨肉”一议,是最为敏感的事,无异变相地指摘雍正的伤疤,是其他人万万不敢吭声的,而孙嘉淦竟斗胆提了出来,致使“龙颜”震怒:“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幸亏大学士朱轼巧为其开脱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经朱轼这么一说,雍正也转怒为笑了:“朕亦服其胆!”转而又把孙嘉淦提为国子监司业。一场几乎临头的大祸忽又演作加官进爵之幸。雍正究竟不失为英明之主。

雍正十年,国子监教习官期满,由孙嘉淦负责带领引见。引见之后,皇帝认为不称职,而孙嘉淦不以为然,坚持己见,甚至在皇帝面前要拿起御笔立状担保,又一次冲犯了“龙颜”,以此被定为大不敬罪而拟斩。过了几天,当雍正消了气,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孙嘉淦这个人无非是“太憨”了一点,“然不爱钱”,总归是个廉直之臣,遂取消其死罪,把他贬到户部,派作银库效力行走,等于是降为“一般干部”使用了。孙嘉淦并不在乎这些,他一出狱,就到银库视事。其时,管户部的是果亲王允礼,他以为孙嘉淦一定怨恨不平,不肯屈就此位而认真做事。甚至还有人造谣中伤,说什么孙嘉淦为了沽名钓誉,收银时往往分量不足,等等。有一天,允礼到银库视察,但见孙嘉淦弓腰曲背亲自过秤收银。休息时,又见他与小吏仆役混杂而坐,笑谈自若,看不出有半点不愉之色。允

礼还不放心，又复验孙嘉淦所收的银子，结果不见有丝毫差错。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允礼不能不深深叹服了。允礼如事实告雍正，雍正更加器重孙嘉淦，不久，命孙署理河东盐政。

向乾隆进呈《三习一弊疏》

雍正十三年，乾隆皇帝即位，孙嘉淦从河东盐政的任上被召回京，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

古人谓，君莫大于纳谏，臣莫大于进言。身负风纪重任之后，孙嘉淦更加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昼思夜想，考虑着如何创造一个“众正盈朝”的局面。他认为，君子小人的进退问题，是千古一辙的治乱之机，他历数那些近小人而远君子的历代皇帝，“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弊焉。”所以，使这位刚刚亲政的皇帝及早养成近君子而远小人的良好习惯是首当其要的事，于是，他写了《三习一弊疏》，进呈乾隆皇帝。

孙嘉淦所说的“三习”，指的是皇帝养成的“耳习”、“目习”、“心习”三种坏的习惯。他说，皇帝如果有了这三种坏习惯，其结果一定是“喜小人而厌君子”，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一弊”。

向皇帝上疏，本来是一件难事，更何况其疏所讲的又是什么“三习一弊”呢。不用说，上这样的奏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没有一颗赤胆忠心，没有无所畏惧的勇气，是绝对不敢启奏的。另一方面，即使有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倘无博大的才学，又怎能写好这类奏疏？所幸孙嘉淦二者得兼，他能以物极必反、性由习成的哲理对皇帝“耳习”、“目习”、“心习”的成因作出细致入微、绘声绘形的分析，形象生动地论述了由“习”生“弊”的必然规律，明白婉约、出入有据地进呈了除“习”杜“弊”之策。他那巧妙的笔触，说理缜密，譬喻精当，旁引曲释，卷叠绎绎，再加上流贯于字里行间的一腔忠直恳切之情，不能不使乾隆皇帝动心而“嘉纳”，并予以“宣示”了。

先看看孙嘉淦关于皇帝“耳习”成因的分析。

孙嘉淦说，如果皇帝施仁政于天下，德隆而望尊，群臣归服，百姓感恩，自然是“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这实在是发自臣民们内心的称颂，本无献谀之意。不过就在这种群臣称颂，万民讴歌的热烈赞誉声中，却潜藏着一种向坏的一面的转化之机。因为这种日复一日的颂扬声会使皇帝的耳朵渐渐发生变化，最终导致“耳与誉化，非誉则逆”。也就是说，耳朵为颂扬之声所同化，变成只能听好话，听颂扬的话，而听不得“坏话”，听不进逆耳之语的耳朵了。这就形成了“耳习”。

孙嘉淦认为，“耳习”的养成有一个渐次发展，逐步升级的过程。如何发展，如何升级的呢？他说：“始而匡拂

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就是说，最初表现为听不进谏诤之言或不同意见，进一步发展到讨厌那些忠直而拙于言辞的大臣，到后来，就是那些心有余而术不巧的献谀者也被冷落了。

关于“目习”的形成，孙嘉淦说，皇帝才能愈高，臣下就愈显得愚顽不及，因此对主上的敬畏之心也就愈益增多，时时小心，事事谨慎，唯恐说错，唯恐做错，于是“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他说，这种现象，多数是出于对皇帝的至尊和“尽礼”，然而，就在这种鞠躬如也的仪态中，也隐伏了一种转化的征兆。皇上老是看着这种毕恭毕敬的仪态，眼睛也会渐渐起变化，终于导致“目与媚化，非媚则触”。也就是说，眼睛为一派恭顺畏惧的容颜所同化，变成只爱看奴颜媚色，而不喜欢严正之色的眼睛了，终于形成了“目习”。

孙嘉淦说，“目习”也是逐渐养成的，逐步升级的：“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就是说，最初是斥责那些倨傲不恭的能臣，慢慢地又疏远了那些严正强直的君子；及至最后，连那些诚心献媚而媚术欠佳的人也难得欢心了。总之，“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孙嘉淦所说的“心习”，指的是皇帝养成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习性。他说，皇帝君临天下大事，见闻既多，阅历既久，就很容易养成高己而卑人，雄才而易事的思想作风，于是，“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心习”养成之后，皇帝就处在一种闭目塞听、盲目骄傲的自我封闭状态之中。因此，自己不可能知其所失，别人又不敢道其所短。于是，“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习惯，不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总是一种非常顽固的东西。一个人一旦养成某种习惯，就势必要本能地排斥一切违反习惯的东西。皇帝如果养成了“三习”，就一定要厌弃那些不合“三习”的人和事、言和行。孙嘉淦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德”字。他说：“德者，君子之所独”；至于“才”，则君子与小人都可能有，甚至小人的才能还胜过君子。但君子德高行洁，赤诚坦白；小人巧言令色，奸诈欺罔。因此，在语言奏对中，在奔走周旋中，前者总是有违皇帝的“三习”，后者总是投合皇帝的“三习”，久而久之，“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而更为可悲的是，直到这个时候，皇帝还总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真是习非而成是了。

在分析了“三习一弊”的成因之后，孙嘉淦又进呈除习杜弊之策。

孙嘉淦看到了“耳习”、“目习”、“心习”三者之间既相区别而又相关联的情形，他意识到：“三习”之中，最根本的起最后作用的是“心习”。所以，他认为，“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因此，谨防“心习”

的养成是关键所在。

“心习”的实质就是“骄泰”，其外在表现即是主观武断的作风。因此，要预除“心习”，就必须彻底拔除“自是之根”。他要乾隆皇帝“圣心自慊”，“知其不足”，“见其未能”，“常欲然不敢自是”。要时刻保持庄敬严肃的心态，不敢有半点恣肆放纵的念头。他希望皇上在“用人行政”之中，排除个人的好恶，谨防耳目之习的影响，心中树起一个正确的取舍标准，举贤而退不肖。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谏诤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总而言之，“机伏于至征而势成于不可返”，“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

《三习一弊疏》具有永久价值

有人说，清代260年中，所有奏疏当推《三习一弊疏》为第一，这是不无道理的。《三习一弊疏》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千古帝王近小人而远君子一个普遍规律，其运思之精微，其文采之精美，完全可以与魏征的《十渐疏》相媲美。

往昔多少人论述君子小人进退之由，往往注目于小人，多从剖析小人心术着眼，殊不知奸臣小人之滋生，奸臣小人之能够得逞，其根源在于皇帝养成了“耳习”、“目习”、“心习”。一些皇帝原本是所谓明王圣主，后来由于

“耳与誉化”，“目与媚化”，主观骄傲，刚愎自用，终致蔽于“三习”而被小人包围，做了许多糊涂事情。孙嘉淦的高明处就在于从皇帝身上探得根源，这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习一弊”，岂止皇帝会发生，一切为官者，特别是为大官者更容易发生。因此，《三习一弊疏》不仅可作皇帝之鉴，也可作一切为官者之鉴。曾国藩说：“所谓‘三习’者，余自认实所难免。”他认为，孙嘉淦关于拔除“自是之根”的识见，“亦非绝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他曾抄录《三习一弊疏》，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预除三习，永杜一弊”，这是一个历史的难题。莫说是帝王将相，就是古今中外的人民领袖也难免蹈“三习一弊”之覆辙而铸成大错。细读《三习一弊疏》，回想“文革”之乱，反思现代迷信在中华大地的发生、发展以至于达到狂热和愚蠢的可怕情景，反思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破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恶劣影响，有多少感慨，有多少值得记取的教训啊！“治乱之机，千古一辙”，任你是谁也好，只要养成了“三习”，就必然产生“一弊”，而只要产生“一弊”，“则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国家民族就要遭殃。所以《三习一弊疏》的价值是永久的。

诚然，若要从这篇写于二百五十多年前出自一个封建大臣之手的奏疏中寻找一些疵病，那是很容易的。不过，那样苛求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上接第79页）如围下宫程婴匿孤，弦高假命犒秦军，伍子胥借兵复仇，蔺相如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等，在赞誉豪侠们的传统道德时，也表明了由于不畏强暴、勇于牺牲因而正义必胜，奸佞必败这一深刻的道理。

除此之外，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描绘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养士的风气就已经开始。到了战国，“士”的阶层越发庞大，各国统治者争相养士，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各在三千人以上。许多优秀的士人，就是当时的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有各种知识才能的学者。他们善于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发挥自己的机变才能，纵横捭阖，伍侠尚武，舍生赴义，施展抱负，求取功名，在社会上很为活跃。如冯谖弹铗客孟尝君；信陵君窃符救赵；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封将；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鲁仲连义不帝秦；孟尝君“鸡鸣狗盗”，偷过函谷关等等，写的都是“士”

的活动。

应该说明的是，养士风气是春秋战国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官僚贵族通过养士邀权固宠，是有着自己的目的的。而“士”的成分也比较复杂，他们来自各个阶级、阶层，也代表当时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其中，既不乏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俊杰雄侠，也有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市侩庸夫。但一般说，的确有不少“士”借助主人的名位，做了一番传扬后世的事业。从中可见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使读者对久远的历史，有形象化的认识。

由于古典小说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受当时理学偏执的影响，流传后世的著名小说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以及因果报应、歧视妇女的封建糟粕，《东周列国志》也没有走出历史的窠臼。这是我们在观看这部电视连续剧时所应该注意的。

（责任编辑：萧 徐）

瓷殇

——中国古陶瓷市场的忧思

● 段向群



出卖陶器等古董的农民

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李约瑟博士，曾叹为观止地断言道：“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中，有两门古老而辉煌的学科至今难以被现代科学所征服，那就是经络与陶瓷，但，也为期不远了！”

经络学说至今还不被西方医学所承认，而中国古代陶瓷的发明与发现，其精深博大的古陶族谱，以及其美不胜收的陶国腾美学境界，已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骄傲。

而贵为天骄的中国古陶瓷，展现在现代史上，遭受过圆明园大火那样的列强掠夺，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毁灭性浩劫，现在又面临着经济大潮的冲蚀……

“文革”中文物遭劫难

30年前，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摆脱天灾人祸，极“左”思潮又卷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把那些划为政治与意识形态范畴的孤本、珍品，统统视为封资修的产物。甚至连红木供案、太师椅……一声令下，砸！商周的铜器玉件，私人的珠宝细软，抄！是铜的，送废品站；是玉的，废成碎块。抢到韩滉、李公麟、唐寅、八大山人或齐白石、张大千等名家的字画条幅，揉成一堆，烧！唐三彩、辽代鸡首壶、宋钧瓷三足香炉、耀州力士香炉、龙泉三足洗、洪武釉里红菊纹钵、宣德炉、永乐大盘、康雍乾三代的青花瓷器，用碾路机碾成齑粉……据有关部门披露，“文革”中破四旧和打砸抢运动，仅1966年6月—1967年2月，北京市通县一家造纸厂回收处理古书、旧字画等以万吨计，华北铜厂收回熔铸的铜佛、铜炉不计其数。损失如此浩瀚，使人倍觉“弃之如弊履，毁之如草芥”。

阴阳两界国宝几何？

大约八九千年前，先民们在长

期农业实践中发现,成型的粘土经篝火焚烧后可变成坚硬的器皿,篮子沾了粘土投置火中烧炼,便成了最早的不易漏水的容器。无论龙山的红陶、裴李岗的彩陶或是仰韶的鸟鱼图陶罐,都证明了陶器是人类早年的生活伴侣。

后来,人类为带走阳世的美好,彩陶系列用具成为逝者奔赴阴间的陪葬物。于是,那些满载着远古文明与幽冥气息双重印迹的用品,重见天日后便成了当今世上的尤物。

在洛阳、陕县、三门峡、上蔡、安阳等地的唐墓中,除出土有精致的青瓷白瓷,还出土大量的骆驼、人俑、三彩器皿和镇墓兽。其中仅关林附近发掘的唐墓就有三百余座。

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尊、罍、罐、豆、器盖等,均难以计数。这些陶制明器,以仓、灶、井、炉为代表,罐、鼎、敦、壶、案、杯为组合,以及牛、马、狗、羊等家畜,乃至城堡、楼阁、水榭等模型,在大陆的秦汉墓群几乎到处可见,其数量之丰,是近几十年考古收获所罕见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和社会肌体外伤初愈,人们渴望富裕,社会更趋势利。躁动着的人们被点“陶”成金的暴富挑起发财欲,纷纷

把眼光投向金山银山的世界古玩市场。

以中国古代文物拍卖收藏为热点的佳士得(美国)、苏富比、太古佳士得(香港)、克里斯蒂(英国)……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千余家中国传统式古玩店,将中国文物价格拍卖得扶摇直上,成为富人争胜斗富的竞技场。

三彩天王俑(唐)——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拍卖价:16.5万美元。拍卖时间:1992年11月。

三彩马(唐)——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拍卖价:4955万港币。拍卖地点:香港。拍卖时间:1989年12月。

哥窑八方壶(南宋)——太古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拍卖价:1100万元港币。(香港)拍卖时间:1991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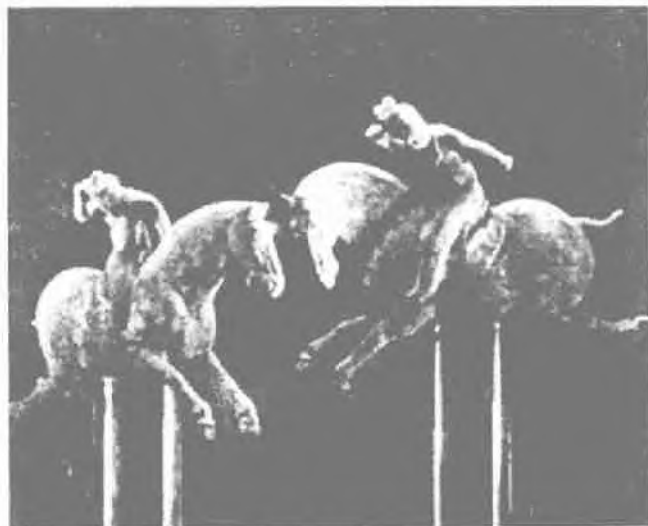
青花缠枝菊纹执壶(明·洪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拍卖价:1200万元港币。拍卖时间:1991年5月。

有位美国亿万富翁,曾以1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征购秦始皇兵马俑。霎时间,原本很少有人问津的古旧市场,如北京的琉璃厂、天津的沈阳道、西安的鼓楼大街……顿时沸沸扬扬。一夜之间,那些持着海外护

照、西装革履的古董贩子,那些冒充公司白领职员古董探子、掮客、说客、中间人,与那些见小利而忘大义的盗墓团伙,在光天化日之下,指向洛阳邙山、安阳殷墟、邯郸的磁州窑……其间仅西安周边、陕北地区,就有1700座古墓被盗,甚至连当年陕甘宁边区的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墓也被盗了三次。

茫茫邙山,遍地坑凹,令人发指。

另一数据表明,从1986—1991年,陕西省古墓被盗970座。柳公权墓被盗13次;洛阳北魏文帝陵被盗9次。河南淮阳地区被盗文物1.2万件,其中仅战国墓、汉墓被毁751座。洛阳文管部门收缴、追查回的被哄抢偷盗的周、秦、汉、唐珍贵文物达30余万件。



左,加彩马球女俑一对(唐),拍卖价18.7万美元;右,青花釉坛(元),拍卖价22.05万英镑;上,三彩马(唐),拍卖价4955万港元

缉私和鉴别学的误区

在我国自古就有搜奇的癖好，仿造复制贩假之风，就从未认真禁止过。宋徽宗皇帝是复古派，酷爱摹仿先秦以前的宫闱贵器，故宋代是仿古造伪的高峰期。从那时起，无论官窑民窑，凡是当时创新或立异的陶瓷器种，几乎都被仿制过。古人仿制的目的，除留恋艺术之美外，也间接地起到了继承和发扬各种优秀陶瓷品种并使之传世的作用。但那时仿制的范围十分窄小，基本不收墓葬或殉葬品。

1993年秋，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经专家教授鉴定，从河南收购一批价值近百万元的汉代墓葬陶俑。其数量之多，是近些年馆藏收购之最。这些陶俑，经权威机构的名家鉴定断代，对造型、胎土、釉色、片纹、蛤蜊光，反复考证，认为系真品无疑。孰料，这一结论却被北京市琉璃厂几家资深的文物商店专业鉴定师给否定了，断定为赝品、伪货。顿时，双方专家各执一理，各述己见。一方认为，胎土的成分不对，陶俑的手感分量较飘浮，釉色见新，器型、开片纹假……有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地质所用专业仪器和现代化手段取样测定。结论却保密了。也许是出于对双方面子上的考虑，双方都偃旗息鼓了。然而，却给这方面的鉴别工作增添了更多的隐患。由于专业部门对愈来愈多的墓葬文物鉴别鉴定工作的实践不足，文物鉴定的判断失衡，将直接影响此类文物的收藏和缉私工作。

大陆收藏者面临的守法与枉法

浏览欧美诸国皇家博物馆或私人馆藏，引人注目的展品，有许多是来自中国。而贵族富贾的私宅中，中国各代文物更不计其数。这些收藏

热点，是推动中国文物价格攀升的直接原因。

国际上著名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和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又是大收藏家，其中著名的华人收藏家，香港的徐展堂先生，新加坡的唐裕先生，他们的收藏品堪称富可敌国。与之相比，中国古代陶瓷在大陆私人收藏方面，所经历的境遇及其所处的地位，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大陆的收藏者，首先必须要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收藏者在收购法规规定的超年代的文物时，所面临的第一个选择便是：是缴公还是秘藏？前者是法理，后者是枉法。而能够称做收藏家的人，就靠清末那点新窑货，成吗？

大陆文物收藏家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规的同时，也希望有某种新的规定和新的解释，以利于发挥私人收藏家的积极性。

馆藏、跳蚤市场何去何从

前些年，论收藏价值，每个馆藏单位或文管口，都有值得炫耀与自豪的文物精品，都有数量可观、价格不菲的顶级藏品。而论收入与开销，所有馆藏单位或文管部门不约而同地唉声叹气：“我们是捧着金碗讨饭吃。”

1991年，国家批准文物商店99个，享有外销权的54家，形势才稍有好转。以1991年为例，库存文物1003万件，收购额达7541万元，销售额12872万元，盈余5154万元，外销文物46万件……

近年悄然兴起的“文物跳蚤市场”，如北京的红桥、潘家窑古玩城，天津市和平区沈阳道旧货市场，南京夫子庙，上海福佐路、浏河路，苏州十全街，杭州岳王路，广州清民街、戴河路，西安、洛阳两京旧地，成为各大城市颇有名气、拾遗补缺的旧货集散地。

民间收藏队伍扩大了，收藏品

位和质量不断上升。国内大牌拍卖公司，如嘉德拍卖有限公司、瀚海艺术品拍卖公司、荣宝斋拍卖公司、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纷纷在古城北京，敲响了清脆的槌声。

民间收藏的超年代交易，馆藏文物参与民间拍卖活动，私人拥有收藏一级文物的举止，海外收藏家参与国内著名文物的拍卖事宜，拍卖品的出境及流失……国家的文物法规面临着挑战，这些行为究竟是守法还是违规？国内拍卖的政策尺度究竟有没有相应的界限？例如1992年北京拍卖市场以800美元拍卖西汉青釉绳纹双系壶，1995年深圳市艺术品拍卖会以35000港币拍卖成交的隋代白釉辟雍砚，1992年北京拍卖市场以6000美元成交价拍卖唐彩绘陶骑马俑，5000美元拍卖成交唐三彩钵……近年仅陶瓷、书画、古器拍卖成交的古代著名文物就有数千件，总共拍卖金额不下10亿元人民币。

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办？能否适度扩大拍卖活动的尺度和范围，促进文物收藏界的活力和竞争，活跃民间收藏和馆藏文物双渠道的经营气氛，吸引国外收藏界的广泛兴趣，将我国的文物交流事业导向国际，成了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搜集文物，延续了历史的变幻。收藏，是为获得历史的荫袭。拍卖，是在确定历史所拥有的价值。然而，盗墓、走私、赝品、官倒和监守自盗的行为却使我们的时代蒙受羞辱。

中国历代文物的传承顺序，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和自身文明的接续和延伸。陶瓷史观，传递出古代智人凝聚不朽艺术火花的生命信息。艺术属于全人类。

宇宙开辟了地球历史，自然选择了人类。物竞天择，人类与生俱来的善与美，注入鬼斧神工般的陶塑工艺中间，弥足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昭示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刘家驹）

画里画外的 吴冠中

● 刘宏伟

塞纳河，一年年地将世界各国的画家召至身边。复活节那天，两名巴黎美术学院的学生顺流而下去写生。

汹涌的波涛掀翻了他们的小船。那位稍稍会点儿水的法国学生顶着风浪向远远的岸边游去呼救，另一位不大会水的中国学生抓住下沉的小船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

中国学生渐渐地手脚麻木、力气耗尽了，他吞咽着塞纳河河水，心里低沉地念着：“永别了，梵高，永别了，绘画；永别了，祖国……”

吴冠中这一生都能清晰地看到当年塞纳河里濒死的自己。获救后他又面临了人生路上的第二个十字路口：回到中国，还是留在法国？坐在梵高画下的巴黎咖啡馆里，两位来自中国解放区的女代表，热烈地动员他和他的中国同学们回去建设新中国。

而他原本打算永远留在巴黎的，巴黎是全世界画家心目中的麦加。但中国这个母体，却有着难以割

舍的情结。让他画圣诞节，他忍不住地要想端午节；让他表现耶稣，他却痴痴地念着屈原和鲁迅。他崇拜梵高、高更、塞尚！他更怀念自己的祖国。

“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你确乎应回到你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他带着导师苏佛尔皮教授的临别赠言，31岁的吴冠中跳上了归国的海轮。

1936年，吴冠中考进了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或许他原来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有一次他无意中走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一见钟情！那种用画笔在纸上、布上画画的生活让他激动不已。于是，吴冠中离开工业学校，又考进了杭州艺专。

抗战胜利后选送赴欧美的公费留学生，仅有两名的绘画名额，竟被吴冠中给考取了。那时他已是重庆大学建筑系的助教。凭着在杭州艺专六年师从潘天寿、林风眠、吴大羽、刘开渠等画坛前辈而学到的技

艺，他才有幸来到了全世界画家为之神往的艺术之都——巴黎。

吴冠中接受邀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脚下是第一个国庆日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他觉得：他的矮个儿被拔高了，他的黄脸发红光了，他将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台上向新中国的年轻画家们讲授西方美术了。

可是，这位从巴黎归来的教授，对“社会主义艺术”一窍不通，他甚至不知来宾是谁！更糟糕的是，他连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也画不好。用最熟悉的油画绘制人物，人家总说他是“丑化工农兵”。为这，他被调离美院，去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也因为这，他索性放弃已钻研多年的人物画，从此改画风景画了。

吴冠中挥泪走过他人生中的第三个十字路口。从前的两次是他在安排命运，而这一次，是命运在安排他。虽说后来又让他回到了艺术院校，但是他并没有回到人物画里。

于是，吴冠中给当代中国画廊

留下的，是一系列以自然景物为表现对象的风景画。画家几十年不倦地注视着奇伟的大自然。他背着沉重的油画箱，天南地北地浪迹江湖。他曾被小镇上的人当成是修雨伞的，也曾被乡下老太太当成是收鸡蛋的，他的画还被渔村顽童们毫不留情地撒上了一大把沙子！

在蚊蝇袭扰的小栈房，大巴山公路上，溅向画面的泥浆……他可以连续作画一整天而吃不喝，直到老年均是如此。对此，吴冠中自诩为：“此种生活能耐，是我几十年江湖生涯里忠心耿耿的后勤部长。”

大英博物馆的门口立着两块巨大的横标。左边是“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回顾展”。右边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家吴冠中个人画展”。大英博物馆首次展出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的作品。

这是他数十年来狂热地奔走于祖国的深山与僻壤中写生作画的一种报偿，数年来他的那些画已经在西方和东方多次公开展出。

吴冠中前几十年钻研西方绘画，后几十年一头扎进中国大地里，



吴冠中向本文作者介绍作画过程

谁能一口咬定中西艺术混血儿不是优良品种呢？不久前几位法国画家在云冈石窟发现，那质朴的北魏石刻竟与西欧中世纪罗曼式雕刻如出一辙；而在那巨大的中国群佛身上，所有的形象竟都统一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画家塞尚所追求的几何形构图里！混血儿竟早于吴冠中千百年出现了……

一枚法国最高文化勋位的勋

章，千里迢迢地于1993年的初秋戴在了吴冠中的衣襟上。勋章无言。吴冠中无言。老同窗们纷纷从海内外外寄语说：你当年从巴黎回国的选择是有胆有识之举。如今，他幸运地与前辈画家刘海粟、徐悲鸿、黄宾虹、林风眠等站在同一片屋顶之下。

他那幅《交河古城》的价位，已经在国际拍卖中达到255万港币。

（责任编辑：刘家驹）

《炎黄二帝》在广西柳州开机

由著名剧作家李准、李淑父子编剧，河南、许昌两家电视台联合拍摄的，二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摄制组上月底已进驻柳州，将以柳州为该剧主要的外景地进行拍摄。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几千年来已成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开拓、进取的化身和团结统一的象征。该剧通过炎帝、黄帝和蚩尤等艺术形象，再现了五千年前人类的创造、改革、斗争和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

刻的现实意义。在王光英、萧克、周谷城、程思远等各方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河南省委决定筹拍这部电视剧，以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该剧由河南电视台著名导演司玉生执导、总政话剧团李永贵任制片主任，剧组的主要演员都是由全国各地选聘的有经验的表演艺术家。目前，制作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五月五日在广西柳州正式开机拍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该剧题写了剧名。（王佳增）

《东周列国志》：

三百年磋磨成名著

● 罗静文

中央电视台即将在6月15日播放的大型历史巨片《东周列国志》，缘于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向正热衷于这一历史巨片的广大电视观众，介绍一下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的成书过程，以及作者的有关问题，一定是大家感兴趣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因为有关列国之间的故事世代相传。到了宋元时代，话本小说兴起，这些流传的故事，便成为话本小说作者猎取的最好题材。因此，在宋元的讲史话本中，就出现了《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

历史延续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正值历史小说创作的高潮时期，春秋战国这段恢宏的历史又成了历史小说创作者看好的题材。余邵鱼和冯梦龙先后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编写成书，又经清代蔡元放的修改、点评，形成了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一、余邵鱼始发轫

余邵鱼根据前代历史书籍的记述，并吸取前人话本的成果加工写成了《列国志传》，使列国故事初具规模。全书共226节，不计回数，每节随事立题。从商纣的妲己被魅写起，一直写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比较全面、生动地记载了列国历史，并摒弃了讲史话本中与史实严重不符的某些部分。在其中的若干章节里，余邵鱼把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穿插进去，如妲己被魅、临潼斗室、卞庄刺虎、秋胡戏妻等，增强了历史小说的文学色彩。《列国志传》虽然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小说中却充满了封建伦理道德和天命论的说教，给作品带来严重的损害。

二、冯梦龙再造辉煌

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经过一个世纪的民间流传，到了明末，引起了在历史上以“三言”（反映明代市民生活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的合称）而荣登白话短篇小说榜首的冯梦龙的极大关注。被称为“全能通俗文学家”的冯梦龙，毕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改编和增补工作，他编纂《新列国志》时，已是年近70岁的老人了。冯梦龙如此下大气力改编此书，其间既有当时的历史原因，也融进了他的通俗小说理论体系。

明中叶以后，大明帝国已走过了繁华的时期，由盛而衰所带来的一个历史上通有的现象——封建统治日益残暴，政治日趋腐败。敏感的文人们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下，已难以对社会现实畅所欲言，因而采取了历史上文人们通常所使用的表达观点的方法——借用历史题材来托古讽今，寄托理想。与此同时，一些既缺乏生活经验，又企图在小说创作上一举成名的文人们，也把目光盯在了历史题材上。而我国历史悠久，史籍浩繁，在客观上为文人们的历史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所以，明中叶以后出现了大量的以一朝一代兴亡为线索，融正史、野史、杂记、民间传说为一体，敷衍成篇的历史小说。

尽管如此,当时的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长期受到封建正统文人的歧视和贬斥,他们囿于传统的偏见,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邪宗”,不登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是,作为特立独行的哲学家李贽的追随者的冯梦龙,酷爱李贽的学说,他的文学思想深受李贽进步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比儒家经典还大,“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而且小说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比《孝经》、《论语》更能打动人的感情。他甚至提出小说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既可以教化人民,亦可当治国者的借鉴。这种把封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文学小说说成比儒家经典更具教育效用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反封建正统思想的进步意义。这些观点,都融汇在《新列国志》之中。

冯梦龙凭据史传,把《列国志传》改编为108回的《新列国志》,明末刊行。他以七古咏史诗一首作为“入话”,总挈全书。小说起于周宣王三十九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缩短了叙述年代,使中心史事的起迄,与东周列国名实相符,囊括其间五、六百年的大部分历史故事。篇幅也由《列国志传》的28万字扩展至76万字左右。在内容方面,作者“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凡列国大事,一一备载。把原书叙事颠倒、详略失宜、姓名身世谬误之处加以订正,进一步删除了《列国志传》中明显不符合史实的故事传说,补充了必要的内容。但“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在人物的刻画,细节的渲染,语言的运用,结构的安排等方面,也大大改变了《列国志传》简朴、粗陋的面貌。由于《新列国志》删汰了原书采撷的大量民间传说和某些艺术虚构的情节,过分依傍正史,使得有些部分几乎是正史材料的联缀和解释,近似通俗的历史读物。

三、蔡元放锦上添花

冯梦龙因其“通俗文学家”的固有地位,因而使《新列国志》广为流传。一个世纪以后,传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人蔡元放手中。

现今,我们对蔡元放的生平及其事迹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个颇喜欢对历史小说评点一番的人。当他读到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时,也照例评点了一番。只是这一评点,不但使《新列国志》更名为《东周列国志》。而且,以后二百年来广为流传。在流传过程中,余邵鱼和冯梦龙的著作权,也受到了侵犯,以至于至今有的出版社还把它当成了蔡元放的“原著”。

蔡元放评点、修订《东周列国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事。全书23卷108回,卷前有蔡元放的序文和《读法》,每回正文之前有回评,文中有夹批。蔡元放在《读法》中

提出了“记事”体小说的理论。他认为,“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对历史演义小说须“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他指出,《东周列国志》所描写的历史时间跨度长,事态的变故多,事绪纷纭,人物庞杂,不同于其他历史小说,可以“撮凑”,可以虚构,读者不必用艺术眼光去对待。但这种“记事”小说,“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来,却也是绝妙小说。”蔡元放在《读法》中还反复声明,他批评《东周列国志》,“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即借史事所发议论而“有益世道人心”。这是蔡元放在乾隆考据之学盛行的情况下,对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务为有用”的学风的继承。他说,《东周列国志》,经过他“稍为评鹭”之后,可以“豁读者之心目”,成为一部对读者进行多方面教育的历史百科全书。他还明确指出,“《列国志》是一部劝惩之书”。他是抱着借历史演义,“引为法戒”,以达到“善足以劝,恶足以戒”的劝惩目的,并且借作品中的情节、人物、事件,联系现实,通过评点,直接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蔡元放的“记事”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编纂的《东周列国志》之中。所以,他修改《新列国志》时,是靠《左传》作为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迁《史记》中的有关内容杂采补入,对书中每个与史书记载不同的细节都一一作了更正。正因如此,导致了《东周列国志》语言艺术不高,史传韵味过浓,人物性格不够鲜明,再加上头绪过于繁杂,大大影响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但他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与代表性的。

四、怎样看待这本书

《东周列国志》所展现的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广大观众已从电视剧中领略到了,我们对此毋须多说,现就小说的思想内涵略作交代。

小说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向读者表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创立霸业、统一天下的关键,是国君能否选拔贤士,排斥奸佞,改革政治。小说对那些改革内政,采取强国利民措施的圣君贤相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如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楚悼王任用吴起实行变法;秦穆公提拔奴仆百里奚等等,从而达到惩恶扬善之功效。

小说在称道英明的君主、贤达的将相的同时,对那些腐朽、丑恶和残暴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鞭挞和讽刺。如周幽王宠爱褒姒用烽火戏诸侯;宋襄公假行“仁义”,愚蠢自大;卫宣公筑台纳媳,齐襄公兄妹淫乱,荒淫无耻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和要求改革政治的愿望。

小说里有不少故事歌颂了那些舍生忘死、忍辱负重、刚正不屈、智勇双全的豪侠。(下转第72页)

庆祝炎黄春秋杂志
创刊五周年



炎黄一古有英雄德到齐
浩浩已 跃北在 山阴 大 金 鱼 休 耕 梦 瓦 醉
僧 书 炎 黄 春 秋 五 周 年 志 念
定 章 订 至 至 南 门 外

尊重事实
不随时趣

李 晋 谨 贺

炎黄春秋五周年大庆

SEA-GULL

海鸥表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 天津手表厂 敬贺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五周年



海鸥表

定制表
礼品表
纪念表
工艺钟
建筑钟

销售公司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松江路12号

电话：022-3317566

邮编：300041

北京办事处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31号

电话：010-67149306

邮编：100062

联系人：战兵、王福丽

炎黄春秋



1937年11月，朱德(右一)欢迎王明(中)等人返延安



出席坐床大典的国务院代表王康(右)与十一世班禅在一起

抗日劲旅十九路军的兴与亡

内蒙古·乌兰夫·周恩来

朱德和他的女儿朱敏

从文坛女将到总理秘书

十一世班禅大师

应化现身追记

傅崇碧谈“杨余傅事件”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00元